炎黄春秋

第 1 期
2016年

宪法应该为人民所掌握

刘英谈红军时代

胡启立：耀邦百年祭

王申西命运的思考

波兰转型面面观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目 录

访谈录

1 耀邦百年祭 …… 胡启立 口述 张宏遵 执笔

5 刘英谈红军时代 …… 何 方 采访 宋以敏 整理

14 束星北的性格与追求 …… 束美新 口述 许水涛 采访

20 参加理论务虚会的经过 …… 于浩成 口述 邢小群 采访

往事录

24 王申酉命运的思考 …… 钱理群

30 谁举荐的朱厚泽 …… 郑仲兵

35 1965年胡耀邦《电话通讯》产生前后 …… 白 磊

40 从47份救济申请表看1962年逃港风潮 …… 笑 蜀

沉思录

44 宪法应该为人民所掌握 …… 郭道晖

46 盲目铲除私有制的教训 …… 王宪斌

48 国耻背后 …… 张绪山

亲历记

51 选拔第三梯队的有关回忆 …… 李 锐

54 动乱年代的采访 …… 邓伟志

怀人篇

58 朱启平先生二三事 …… 张 刃

63 我的父亲马建民 …… 老 鬼

人物志

69 一个农民与人民公社的较量 …… 陈大斌

72 张春桥其人 …… 李海文

78 为民请命的李景福 …… 余习广

海外事

83 波兰转型面面观 …… 秦 晖 金 雁

90 共同富裕是怎么为法西斯所利用的 …… 蒋德海

顾　问（参加社委会）

杜润生　李　锐　何　方　郭道晖

江　平　陶斯亮　胡德华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王海光　方　宁　方　实

卢跃刚　冯其庸　曲润海　苏双碧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大同

李冰封　李步云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　吴　伟

吴　象　吴明瑜　沈志华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北英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陆　德　陈　敏　邵燕祥

金冲及　周瑞金　赵德润　胡冀燕

钟沛璋　保育钧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徐庆全（副召集人）　贾磊磊

钱理群　徐小岩　凌　云　高　放

高尚全　资中筠　展　江　萧蔚彬

章诒和　董　健　韩　钢　鲁　谆

雷　颐　蔡　霞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徐庆全（副主任）

李　晨　胡竞成

总 编 辑　杜导正

副总编辑　徐庆全（常务）

执行主编　王彦君　冯立三　丁　东

杜明明

网络主编　王海印

编辑室主任　赵凡响

社　　长　杜导正

副 社 长　徐庆全（常务）　李　晨

秘 书 长　杜明明

总经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行部主任　孔　屏

办公室主任　王海印

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l@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10元　全年定价　120元

终审　徐庆全　　执行主编　丁　东　　校对　柏　间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耀邦百年祭

○ 胡启立 口述 张宏遵 执笔

（一）

今年是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逝世26周年。

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追思、缅怀、纪念他。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不单单是一种礼仪，而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道义和期待。

（二）

认识和评价胡耀邦，可以有两个视角：一个是作为普通共产党人或者说普通公民的胡耀邦，一个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政治家的胡耀邦。

作为普通共产党人的胡耀邦，他的人格、操守、品德、修养，可以用纯洁、高尚来作评，足以堪称世人楷模。

作为政治家的胡耀邦，他的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识见、政治坚守，在共产党人的队伍里，也是出类拔萃、高树一帜的。他在长达60年的政治生涯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政治信念、博大的政治胸襟，光明的政治道德和坚毅的政治担当，集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道德家的优良素质于一身，为共产党人树立了一个卓越的榜样。

当耀邦同志远离我们26年之后，我清晰地感到，耀邦从来就没离开我们，他依然鲜活地生活在我们中间，随时随地和我们在一起，共忧患，同凉热。

（三）

对于一个共产党的执政者，其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是区分其是政治家还是政客，是公仆还是官僚的试金石。

耀邦同志14岁参加革命，15岁入团，18岁入党，他从青年时就确立了为普天下劳苦大众摆脱奴役、压榨和剥削，争取自由、平等和权利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从此矢志不渝，终生坚守，虽历经磨劫，屡遭苦难，也不曾稍有更移。

我生也有幸，先后两度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学习，时间长达30年之久。积30年的体察感悟，在耀邦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结构中，他有别于其他人，或者说，他独特的人生信仰和政治追求是什么？我想，如果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天。中国古训说："圣人无常心，以民心为心。"耀邦就是以民心为心的人。在他的人生辞典里，民心、民意、民生、民权，始终占据着最高位置。"中兴伟业，民心为上"，"心在人民，利归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话，对于耀邦，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践于行。纵观耀邦的一生，他全部的思想和实践，他终生的追求和坚守，一以贯之地充盈着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和人民至高至上的道德精神。可以说，这是他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和灵魂。

（四）

1982年，我调到中央工作。

耀邦同志对我的第一个教诲就是：你要想大事，抓大事。

耀邦的教诲，我欣然接受，但当时未解其中深意。后来亲身参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尤其是若干年后从高位上退下来，冷静思考、回味、梳理，回头再看当年那些事，才慢慢悟出一些道理来。

什么是耀邦心目中的大事？

耀邦当上总书记，第一个报告就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所谓全面，当然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所谓新局面，就是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富裕幸福。

怎样实现全面开创新局面？只能走改革开放之路。

改革改什么？要改观念、改思想、改体制。

1983年1月，胡耀邦作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提出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1982年8月，胡启立（右1）陪同胡耀邦在黑龙江考察

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呕心沥血，宵旰忧劳，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来。

改革从农村发端。在他指导下，连续五年颁发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1984年，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胡耀邦亲自主持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小平同志称之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985年3月，颁发《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5年5月，颁发《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些重大改革决定的发布，都渗透着胡耀邦的智慧和心血。

三个文件出台后，小平同志有个评价，说："从去年10月以来，中央相继做出了三项改革决定……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办了过去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党的认识能力有了新的提高，表明我们党已经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新问题。"

此后，耀邦同志又顺应改革趋势，谋篇布局，立志作一篇大文章，为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确立方向和路径。

1986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了耀邦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这个文件开头有一段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三者并列提出，强调三个"坚定不移"，并把三者的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作为中国改革的总体布局，这样一个战略构想、战略设计，使中国的全面改革建立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理性之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最高水平。

今天回过头来看，在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邓小平作为主帅，把舵定向；以耀邦同志为班长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历史的选择，顺乎潮流，应乎人心，合乎规律，明乎道义，致力于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力图构建一种新的制度，全力推动我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科学的光明大道，使改革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在时代大考面前所展示出来的道义禀赋和责任担当，至今令人感佩不已。

（五）

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

作为党的总书记，如何把党建设好，把党的风气搞好，是耀邦始终忧思于怀、牵绕于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他认定的大事。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党内和社会上贪污腐败现象突显出来，严重损害党的形象，破坏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议论，也引起了耀邦同志的高度警觉和重视。他率先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抓大案要案，端正党风，要从自己身边抓起，从中央机关抓起。1986年1月，他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共八千人的大会上作动员报告，题目就叫《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在抓党风建设过程中，一批高级干部和高干子女受到纪律处分或法律制裁。这件事震动之大，得罪人之多，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我当时都替耀邦捏一把冷汗，但耀邦是义无反顾。

我至今记得，八千人大会之后，一次陪耀邦在中南海散步，耀邦问及我八千人大会精神贯彻的情况和抓大案要案的进展。我向他作了简要汇报。耀邦对我说，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能否制止，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他一连用了三个"最"，说这件事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他说，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他还用一种凝重的口气对我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可以鱼肉人民啊！"当时，他的话像雷声在我头顶响过。今天，重温这番话，让人感慨万千！

（六）

一个人的襟怀、气度，是丈量他精神高度、人格魅力的重要尺度。作为政治家的胡耀邦在这方面表现了蓝天般的广阔和海洋般的深泓。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同志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了"两个凡是"。如果坚持"两个凡是"，国家就无法走出僵死的困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无法纠正，小平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和一大批老同志也就不可能出来工作。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胡耀邦旗帜鲜明，当仁不让，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率先组织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推翻"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继而又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果敢精神和坚定决心，毅然为千百万人落实政策，平凡冤假错案。这两项伟大壮举，拯万民于水火，解精神之枷锁，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掀开了历史的帷幕，立下了名垂青史的不朽功勋。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后来在对华国锋同志作组织处理的时候，胡耀邦却充分肯定他在粉碎"四人帮"这一历史事件中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力主把他继续留在党的领导核心里。并勇敢地为"华国锋是造反起家"的不实之词辩诬。公正立世，公道办事，公平待人，无一私己之杂念，没有博大的度量和胸襟是做不到的。

胡耀邦当了总书记之后，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村改革。1981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耀邦讲完话之后，多数地方党

1985年9月22日，胡耀邦（右）与胡启立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交谈

李斌油画《共产党人》

委书记都表态赞成。但当场有一位省委书记明确表示,他有不同意见。他在讲了一大堆理由之后,明显带有情绪地说: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谁愿搞谁搞,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位省委书记发言之后,会议气氛显得有些紧张。尽管耀邦当时非常急切地想要在全国推动农村改革,也希望在党内高层形成共识,但当时听完那位省委书记的意见之后,他平静地说:各位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见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嘛！还是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耀邦一席话,让会议的气氛顿时轻松下来。会议过后没多长时间,经过学习和实践,那位省委书记主动改变了原来的意见,在本省农村积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耀邦同志宅心仁厚,任何时候都真诚待人。他在政治风浪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一点也不圆滑世故。他几乎不知阴谋、权术、机巧、算计、出卖、诬陷为何物。即使自己被算计了,他也不失本性,不改一颗良善之心。就在他下狠心抓党风廉政建设、办大案要案的时候,因触及到一批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招惹了许多人。有人就不断到小平等老人那里告他的黑状,说了他许多坏话,甚至编造谣言对耀邦进行攻击。我听到了一些情况,为耀邦着急,就劝耀邦多到小平同志那里走走,作点必要的说明,免得背黑锅。谁知耀邦听了很不高兴,还严肃地批评我说:启立你怎么也信那些东西,搞低级趣味!

这就是耀邦。他像水晶一样纯净、透明。他内心始终充满了阳光。他用这阳光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就连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耀邦是个光明正大、品德高尚的人。很多人认为,搞政治天生就要搞阴谋,玩权术。耀邦却用他一生的实践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必须拥有高尚的品质和心灵。只有高尚的品质和心灵,才能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让公权力真正得到亿万民众的真心信赖和拥护。

(七)

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都会受到别人和社会的影响。在我80多年的人生旅程中,如果要问,什么人对你影响最大、最深?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我和耀邦同志一起共事30多年,他于我亦师亦友;我在他手下工作几十年,追其引领,随其履痕,受其教诲,得其滋养,深受厚泽。他的学问、知识、人格、道德、修养,对于我是一部终生受用的好书、大书。

他的思想、理论、实践、智慧,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他已经嵌入人心。他必将载入历史。

以此缅怀伟大的耀邦同志！■

2015年11月于耀邦百年诞辰之际

(张宏遵为《工人日报》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杜导正　杜明明)

刘英谈红军时代

○ 何 方 采访　宋以敏 整理

一、苏区时期

1932年冬天，共产国际派我回国。因为我是秘密学习无线电的，就叫我去中央苏区，不到别的苏区去。共产国际的命令，是谁也不能违抗的。一路上花了半年，才走到瑞金。到中央局后见到了管交通的邓大姐。她在总书记博古的办公室的外面办公，担任中央的秘书长。

罗迈（李维汉）原来是我的老上级，见到我很高兴。我向罗迈和博古提出不干无线电，他们两个同意了。凯丰当时是少共中央局书记，要我到他那里去工作。胡耀邦是秘书长。后来凯丰又派我到福建，当省少共书记，参加发展团员的工作。那时陈潭秋是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召开省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洛甫带着阿金（金维映）来参加。洛甫同我坐在一条板凳上，鼓励我发言。我那时也同李坚真熟了。她是劳动妇女，当省委妇女部长。洛甫以前就叫她当妇女部长，她那时还哭了，说当不了。文革时我和闻天在广东肇庆，李坚真正在广东工作。她想来看我们，但是当时省委不告诉她我们住在哪里。

瑞金1934年1月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又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罗迈说，老区又没有人来，就让我们少共中央列席。这时，凯丰就叫我留在瑞金，当少共中央宣传部长，做动员工作。胡耀邦是组织部长。我说，胡耀邦做宣传工作更合适，就同他对调了。陈潭秋也留下来当粮食部长。

少共中央在下霄村，临时中央在沙洲坝，离得很近。那里在一起的都是我在莫斯科时的老同学或者老师。我们有共同语言，自然结成一团，也不分是早还是晚去莫斯科的，是支部局的还是反支部局的。教条主义者不反对我们，我们年轻，又没有什么地位。那时，和邓小平、张爱萍这些人，常常一起散步，聊天，天南地北地乱吹一通。消遣嘛！别人看见我们就说，牛皮公司来了！

那时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博古、洛甫、周恩来和项英四个人。毛主席没有参加五中全会。他是托病抵制。博古讽刺挖苦说，“又请假了！”在中央苏区，听说洛甫和博古的关系不好，在很多问题上都发生摩擦，有分歧。博古有点跋扈。有一次我去中央局，就听见罗迈和博古议论，对洛甫有意见。

洛甫因为不满博古领导，被调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负责日常行政工作，几个部的工作都向他汇报、请示。洛甫担任这个职务后，就搬到政府所在的村庄，同林（伯渠）老等人在一起，只有开会时才来中央。有的说，这是博古为了把他排挤出中央采取的办法。也有人说，这是为了在那里监督毛主席。我也搞不清。

我和毛主席是老乡，常常去看看他，和他聊聊天。我和他气质相近，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能谈得来。另外还有一个历史原因：毛主席的同学周以栗是我的老师，我入党时影响过我。他对毛主席很崇敬，经常跟我讲毛主席的事。所以，我还没见到毛主席，就对他有了很好的印象。毛主席对我也很好。毛主席那时生着病，还正受到排挤，别人很少去看他。少共中央组织部长王盛荣还同我说：刘英，你要注意呢！我不管这些，去看他总可以揩点油，搞点面条什么吃的，肚子饿嘛！一次在我要走时，他还送我一片广柑。还有一次叫去他那里吃炒鸡块。那时候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反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同情。

王稼祥在围剿中挂了花。他当总政主任，实际上只是挂个名，这时也住在沙洲坝养病。他当时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反对他们的那些人是不太理他们的，他们孤独得很。毛主席和王稼祥

张闻天、刘英夫妇

住在一间独立房子里，就在我住的少共中央附近，我不用骑马就能走到他们那里。他们晚间散步常在一起，有时也散步到少共中央来，在我这里说说笑笑，写写诗，谈谈《红楼梦》。不是我去就是他们来。打乒乓球我又不打，在一起就是聊天。毛主席没有架子，什么都爱讲。王稼祥也把别人送给他的缴获的东西拿给我吃。

王稼祥在长征时抬着走，经常发冷，身子疼得好利害，瘦得皮包骨。后来还是去苏联治疗，看到骨头都黑了，刮去了一层，过了一年才治好的。他不能吃苏联人的饭，要给他单独弄点东西吃。后来他就给毛主席写信，被调了回来。王稼祥后来有心脏病，晚上睡不着，不能随便吃厉害的安眠药。吃了，晚上发病时就醒不来，不能把人叫到跟前来。他就是头天吃了药，第二天喊他喊不起来，才发现他已经死了，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死的(王稼祥1974年去世)。这是朱仲丽告诉我的。我和王稼祥的关系一直是蛮好的。

那时，我同毛主席的关系比同洛甫深。洛甫常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我也是很佩服的。我在地方工作队工作，洛甫也喜欢来我们住处看看。只是他很忙，来得少，不像毛主席和王稼祥在养病，有闲工夫。

邓小平挨了整，灰溜溜的，被调去办《红星报》。王稼祥同情邓小平，告诉我：说是邓小平犯了错误，右倾，害得他连老婆都给搞掉了；实际上他是很有才干的，报办得好。

阿金在上海的江苏省委工作时是李维汉的下级，两人那时就有感情。只是李维汉已经有了一个旧式夫人，是家庭妇女，小脚，为了掩护机关正同李维汉住在一起。所以阿金和李维汉两人那时没能结合。从上海到福建苏区的路上，阿金和邓小平是假夫妻，两人就到了一起。到苏区后不久，邓小平就因"邓毛谢古"案挨批。这时罗迈当组织部长，阿金又到了他手下当工作人员，于是同邓小平离婚而和罗迈结合。所以，他们的结合并不是罗迈乘人之危，而是他们两个在阿金同邓小平结合之前早已有了感情。

在苏区，我们这些人一般都称毛主席为"老毛"。他自称"大帅"或者"毛大帅"，博古也就这样叫他。一般人称他毛主席。叫他"主席"，那是整风以后的事，建国后就普遍化了。

二、"扩红"

在第五次"围剿"期间，因为前方死伤人太多，派了一大批干部分头下去"扩红"(扩大红军)。王首道、陆定一都是"扩红"突击队长。罗迈也派我去雩都当突击队长。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扩红"，那是在1934年5月。开始是高自力当队长。他是土地部长，一面搞粮，一面搞"扩红"，平均使用力量，没有着重"扩红"，队员找的又都是本地人，所以任务完成得不好。我带了十多人，连夜赶到雩都。

高自力另有任务，后来就到苏联去了。我是单打一。那时许多县都没有搞起来，完成任务的时间只剩下二十多天，我就很担心。我召集各区干部和赤卫队开会，还想了很多办法，安排妇女下田、编草鞋、由妇女慰问队在门口送草鞋，母送儿，妻子送郎，等等。这样，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由支部书记、党员和干部带头，按地区编连营，少先队员是整队整排地参加。结果超额完成任务，"扩红"三千多人。主要还是群众好。群众喊保卫苏区的口号，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军委动员部的滕代远奖给我们粮食、书和一条毛巾。

第一次"扩红"，我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表扬。见到邓小平，他说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讲这是项英说的。

苏区的"扩红"工作是很难做的。那时潘汉年在杨殷县当突击队长。那里是个边区，老百姓

一听说要“扩红”，就翻过山头跑到白区去。潘汉年因此挨了罗迈的批，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撤了他的职，还通报了他。潘汉年经过我那里的时候灰溜溜的，对我说：你可要小心啊！后来在长征中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大家讨论和提意见。潘汉年对在“扩红”中受到批评一直不满意，听了传达就高兴了。那时候在扎西搭了个台子，搁几张长板凳，洛甫做传达，说我们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传达完有几个人上去讲话，凯丰也讲了。潘汉年怂恿我上台讲话，揭发罗迈。我想，罗迈是顶头上司，不好讲，就讲了凯丰。因为凯丰也同博古一样，强调客观。等我一讲完，凯丰就上台做检讨了。

第一次“扩红”后没有过多久，到9月份，我又参加了一次“扩红”。是罗迈直接找我谈话，叫我再去的。我本来不想去，因为男的都没有了，走了的也是有去无回。他又叫我去，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我第二次来“扩红”，工作已经很难做下去，很多村子都只有妇女下田干活了。罗迈抓得很紧，要求每天报告“扩红”人数。那时我骑着马到处跑，天天算人数，三天就给罗迈发一次特快信。有一次三天没有写信，罗迈就写信来问为什么没有信。

这次来，毛主席已经在赣南省委。他公开讲是来“扩红”，秘密任务是来侦察地形，准备长征。

因为毛主席兼管“扩红”，我受到他的直接领导。我一方面向中央组织部汇报，一方面也向他汇报。他单独住在一间房子里，叫我每天都去向他汇报。我白天忙，都在晚上去。

毛主席在会昌时就强调肃反。他对雩都也有指示，强调肃反。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就杀。后来又打电话来，说在三天之内要破案，找出多少个反革命。于是县保安局就抓了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那时候，“扩红”搞不下去，就用竹竿子扯那些人，扯得他们哇哇叫：“我是贫雇农，分了土地，怎么会反对政府呢？我不反对‘扩红’啊，我是革命的，我不是反革命啊！”我是队长，中央派来的，全盘管这事。我和张震芳在那里看到了他们这样做。我就说：不能这个样子搞嘛，不是就算了，放了他们！我是觉得“左”了。

在雩都，邓发也很“左”。有好多人都是他指定要严刑拷打，搞逼供信的，我很有意见。

洛甫知道抓人的事以后，就以个人的名义写信给我和张震芳。他说，雩都扩大红军，胜利完成任务，工作成绩很好，但对于肃反要慎重，现在许多人把反对“扩红”当成反革命，这是不对的；不同意“扩红”有各种原因，不一定都是反革命，现在好多地方肃反肃得太宽了。我得了这封信，赶快找县保安局长。他就说：解放了，解放了！就把那些人都放了。

我向毛主席汇报，“扩红”困难。毛主席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把突击队长组长都叫来，和县区乡的干部一起开个会。我说开会不行，没有时间啊。毛主席说，你不要以为花这几天时间不合算，要看到思想不打通就动员不起来。我又说没有人去通知他们。他就叫来四个警卫人员，他口述如何通知。这些人都是农民，毛主席叫这些人复述一遍，他们就分头下去了。这就把人都叫了来。那时毛主席正在打摆子，要盖几床棉被。洛甫知道后派傅连暲去给他治病，傅连暲拿刚缴获来的金鸡纳霜给他吃。他吃了刚退烧，身体还很虚弱，就来参加会了。开会时我就按毛主席的意见对他们讲应该如何“扩红”。讲完后，大家一定要毛主席讲话。我想照顾他的身体，说他的病刚好，身体很弱，我刚才讲的就是毛主席要讲的意见。但是大家不断鼓掌，要他讲话。他就着重讲两个字——决心。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反复讲，任务严重，但是只要有决心就行。大家就知道了第五次“围剿”的严重形势。毛主席讲话大家最爱听。他常说：大家都是农民，讲深了他们不懂。博古很会讲，用很漂亮的语言讲，但是大家听不懂。结果开完会以后，大家就都很高兴地分头去办了。我从毛主席这次行动中得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思想工作第一。

这次“扩红”的任务是几百个，开了会，只完成了十多个。会后不久，毛主席来我住的地方，让我赶快回中央。我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不能走。毛主席叫我写一个文件，讲：凡是破坏“扩红”的，队长就有权处理。突击队有权枪毙人呢！他走出去一段路，又折回来对我讲，你一定要走，有特殊任务，他自己也走。我那时很幼稚，不了解形势，也不明白什么路线斗争，只知道干，服从领导，根本没有想到是要撤退。后来才

知道,那是毛主席为了照顾我。那时绝大多数干部是当地人,他考虑我是外来干部,又不会讲当地话,不能留下来。后来接到罗迈电话,也要我回瑞金,我这才走的。因为罗迈主管“扩红”工作,完不成任务要挨批。

我在回瑞金的半路上又见到毛主席。他后面还带着挑子。看到毛主席给王稼祥准备了马,还自己设计,制作了两副担架,就像四川的滑竿一样,上面用竹子编了个搭篷,人可以躺在里面。到瑞金后我去看毛主席,对他说,走的时候我问你,你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军事秘密啊!你不走,就把你丢下了。

撤退的决定是秘密的。我9月27日得到要转移的通知。罗迈指着我说,让这个小鬼走吧。妇女有3万人,只让30人走。凯丰先走,他给我留下一封信,里面有走的人名单。陈丕显那时十七八岁,想跟着队伍走,眼泪汪汪地找我。我找罗迈反映。罗迈是执行任务的,他把脸孔一板,说,这是“三人团”决定的,不能改!我只能向阿丕做工作,劝他留下来。陈丕显后来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开会席位排在前面,每次都要让我,说大姐是老领导。我说现在你是领导。

那时说的是上前方,讲上前方、留后方都是一样工作。那时大家的组织观念都很强,都服从组织决定。

周以栗是跟着瞿秋白一起走的。周以栗牺牲了,瞿秋白也牺牲了。周以栗是很好的,瞿秋白也是。瞿秋白当教育委员时,我在他下面搞中学部的工作。他做事认真极了,兢兢业业啊!他开会时累得吐血,我很佩服他。瞿秋白是不应该牺牲的。可以用担架抬博古,抬洛甫,抬毛主席,抬王稼祥,他们抬得,瞿秋白为什么抬不得?瞿秋白还不是完全走不得路。徐老(徐特立)也是走一阵抬一阵的嘛。他们都是有名的人,又不能改名改姓。瞿秋白向洛甫反映过,想跟着走。洛甫提了,但是博古不同意,周恩来没有讲话,罗迈是执行者。

“三人团”是最后转移的。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首先检讨。他一检讨,博古、李德就孤立了。博古还坚持了一阵,李德一直是顽固的。到延安以后也一直不承认错误,说都是党领导的,是你们执行得不对,不买账。所以他后来写书嘛!他同肖月华结婚,是少共中央促成的。肖月华嫁给李德,可以捞点吃的。后来李德又同李丽莲结婚,李德离开延安,李丽莲要跟他走,中央不同意。

三、长征

回到瑞金以后不久就开始长征。那时还不叫长征,叫“上前方”、“搬家”、“撤退”。

罗迈先是叫我当红军三纵队的巡视员,三纵队也叫红章纵队,后来又叫我到三梯队,也就是管后勤的后梯队,当政治部主任。开始撤退以后,后梯队很辛苦。机关的东西全都搬上了,每天行军走在后头,一到宿营地,部队又该出发了,觉都没有时间睡。吃的东西也没有,有点可吃的,又让前头的部队吃掉了,所以有时只能吃野草。我累得连饭都不想吃。

为了同李德、博古和周恩来这个最高“三人团”相区别,毛主席、王稼祥和洛甫这个“三人团”叫做“中央队三人团”。只要中央队靠近我们后梯队,我就向他们反映地方队的情况。我在雩都“扩红”时就受到毛主席的领导,长征开始后常到中央队去,有机会常能见到毛主席,向他反映一些情况。王稼祥也让我向毛主席谈谈情况。我讲,说是要保护资财,“资财比人重要”;后梯队一天才走五里路,很难找到挑夫;东西带得太多,连石印机都搬上了;再说人们也怕给红军办事,有危险嘛,就是给钱也没人愿意干;挑夫在泥泞小路上走,肩膀都磨烂了,没有草鞋就用布包脚;夜间还不能打火把,一不小心就落入万丈深渊;牺牲太大,遍地是尸体;我这政治工作没法子做。毛主席总是仔细听我讲,洛甫和王稼祥就在一旁添油加醋。毛主席说,怎么能这个样子搬家?我哪里知道他是在向我做调查呢。遵义会议时,陈云才主持把机器这些笨重物资埋掉。后梯队也缩小了编制,搞了个运输队,杨立三当队长,毛泽民当副队长。大机器是处理掉了,金银财宝、武器子弹、还有文件这些还都带着。队伍也还不小。

遵义会议后,我陪着毛主席走了一路。

遵义会议后不久,我就接邓小平的工作,被调到中央队当秘书长了。小平只比我大一岁,当时倒了霉,地位也不高。

中央队第一个秘书长是丁伯年(邓颖超是博古当总书记的时候当的秘书长)。邓小平可能是在湖南接的丁伯年。邓小平当中央队秘书长时还兼着《红星报》主编。有人说,邓小平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列席了遵义会议,这是不对的。他是以中央队秘书长的身份列席的。一共只有三四个人的《红星报》,主编怎么能参加会议呢?(改革开放后)在南宁开了第一次党史学术讨论会,胡绳、廖盖隆主持会议。我和王首道是历史学会的顾问,他们也把我们请了去。在会上,廖盖隆作报告,讲到遵义会议有谁谁参加,说邓小平是《红星报》的记者,列席了。我在下面和王首道商量:你记得吗?那时我们两个都在三梯队,邓小平明明当的是中央队秘书长,不是因为当了《红星报》的编辑就列席的。他当中央队秘书长已经好久了,是去做记录的嘛。王首道说:是这样的。我去跟廖盖隆讲,他还跟我争。我说:你问王首道去。后来他们纠正了,廖盖隆还跟我申明:搞错了,对不起。

1998年1月20日何方、宋以敏在刘英家

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在1935年4月被调走,由我接任中央队秘书长。过了草地后我又回到地方队,接我的是肖向荣,再后来是吴亮平。

调我离开地方队到中央队,是李富春写的一张条子:调刘英接替邓小平的工作。我对他说,不行不行,我的水平不如小平,那是要会写文章的。李富春说,怎么刘英谦虚起来了?不要紧,有人会帮助你的,洛甫他们可以帮助。后来才知道李富春让我到中央队是有意思的。其实是毛主席让我去的。毛主席很喜欢我的一条,是会做地方工作。

我到中央队报到的时候,洛甫不在,只有毛主席和王稼祥在。毛主席说,你知道是谁调你到这儿来的?我说是李富春。他说是我提议的,你这样下去,是要拖垮的,现在这个工作也没有什么事。王稼祥也说,你干得了,工作就是负责中央队几位领导的生活,做做会议记录,一般小会就不用做记录了。后来洛甫过来,也说事情不多,主要就是对部队做些思想工作。

中央队有个队长,有个伙夫。小平原来是秘书长,大家也就叫我秘书长。中央队实际上也就是中央局。中央队开会,朱德、周恩来都来,有时碰头会主要谈打仗,就不做记录。我做记录没有笔,洛甫有一支从白区带来的笔,就借给我用。我总是记得很详细。洛甫也看看我的记录,审查一下,记得不对的地方改一改。他告诉我,不用记得那么多。有时王稼祥也把记录要过去看一下。档案馆里现在还保存着我那时做的会议记录。

到中央队之后,毛主席就问我有没有爱人。他督促我同洛甫好,还对陈云说,你来当监督员。他和我讲洛甫,给我念过一首诗:“洛甫洛甫真英雄,不会骑马会摔跤”,是笑洛甫从马上滚下来,说他“四脚朝天”什么的。他常和我开玩笑,问我为什么不结婚。我说怕生孩子。

在长征路上,我原来的勤务员到前方去了,洛甫分了一个勤务员照顾我。我到中央队后,有一匹马,一个马夫。行军开始,我还在后梯队的时候,洛甫就常常和我走在一起。他常要到毛主席那里商量事情,我是不能离开部队的。我那时很尊重他,没想到要他当我的爱人。洛甫对我有意思,我也没有想到。洛甫看到彭老总的勤务员打个马灯,就说这个就是小流萤——小刘英。

二进遵义后,有一天我骑着马去找毛主席、王稼祥他们聊天,我同他们熟嘛!路上碰见邓小平,就和他一起逛老天街。到了毛主席他们的住处,毛主席去前线了,不在屋里,只有洛甫一个人在。这算是一次姻缘缘分。他向我做了表示。我说怕生孩子,又说天太晚,要回去了,明天还要

行军，罗迈管得很严格的。过了金沙江，他又向我做表示。

过了草地，中央队实际上就没有了，毛主席去前线了。只剩下张闻天一个人了。那个时候，领导都没有架子。周恩来在司令部，邓大姐在卫生部，到休息时就来看看丈夫。李伯钊到杨尚昆那儿去，因为怕挨彭德怀骂，总要拉着我一起去。彭德怀不喜欢女同志到他们那里去。他一见李伯钊就会苦着脸说，“不要老来看老公嘛！”

在长征路上，洛甫和毛主席常常在一起谈工作。平时住宿，要是有一间房子，就是毛主席、洛甫、王稼祥在一起住。有两间就是毛主席单住一间，洛甫住在隔壁。他们一年都不脱衣服睡觉。

长征时常常是大家先走，毛主席后走。毛主席那时候负责指挥军队，经常晚上不睡觉，看地图，研究作战问题。一到出发时间，总是躺在床上不起来，警卫员又不敢去叫。洛甫就骑马先走，叫留守部队等着他。留守部队不能留得很多，让刘伯承总是担心。在瑞金的时候，毛主席已经是晚上搞得很晚了。

四、参与争取张国焘的工作

谈张国焘问题时，中央的意见也是完全一致。张国焘在党内是老资格，那时四方面军实力强，要他们打先锋。毛主席说，打完再过草地。张国焘总是哼哼哈哈的。毛主席和洛甫到张国焘那里去，张国焘就请他们吃一顿，还送粗呢子做的衣服给他们，一人一套。毛主席耐心地做工作，同他磨来磨去熬到半夜。毛主席和张国焘斗争得那么厉害，但和他谈话还是开玩笑，很风趣的。有一次主要是为了缓和气氛，毛主席带我去张国焘那里做工作。毛主席对《红楼梦》很熟，所以一进屋就说，“我带水来了”。贾宝玉不是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吗？还说我是秤砣，因为汉不离婆，秤不离砣嘛！都是开玩笑的话。张国焘对遵义会议是不赞成的，他想当军委主席。毛主席说这个人有野心，不能让他当。洛甫说，总书记让给他做。毛主席说也不行，张国焘要的是抓军队。张国焘称自己是“主席”，用人用亲信。他要周纯全、许世友、傅钟、陈昌浩进政治局。这个，中央也不能答应。谈过多少次，总司令都去谈了，后来还是做了些妥协，张国焘总算满意了。可是到最后张国焘又变了。听陈赓他们说，张国焘骂中央队是右倾机会主义，要跑到苏联吃面包去。张国焘还造谣，说前方打仗流血，你们想溜。

毛主席为了掺“沙子”到四方面军去，组织了中央三队，准备分别插进四方面军各个部分，做政治思想工作，我也去了。他们的问题是严重的，到一个地方就从老百姓手里刮东西。不像我们，拿了东西就放钱，打了土豪就把东西分给老百姓。他们还枪毙人。那时廖承志、朱光都在张国焘的手下，两人一个会写，一个会说。张国焘使用他们，又不信任他们。肃反时，他们两个差点被杀掉。我们到四方面军后，四方面军已经在搞分裂。凯丰通知我们离开，李维汉催我们快走。我们半夜不打火把，跑出十里路。看到洛甫后，他说张国焘搞分裂，要清除中央红军，政治局决定，把你们撤出来。当时非常紧急，好多人因为没有接到通知还留在四方面军。杨尚昆和李伯钊都分开了。我问杨尚昆，为什么不通知李伯钊。他说，因为行动保密，他不能再回去通知了。那时傅连暲住在他们的村子里，也没能通知到。后来傅连暲、任弼时他们和四方面军的人也都到了中央这边。中央还是争取不要分裂，不要打。陈赓、宋任穷干部团在顶着他们。又派朱德、刘伯承去他那里。

中央的政策，是感化大多数人，争取了绝大多数，让他们认识到中央是正确的。经过大量工作，张国焘很孤立了。原来他很威风，现在也抬不起头了。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他：反中央，杀知识分子，强奸妇女……张国焘这个人好面子，他手下的何畏等一帮人就想组织逃跑。何畏跑到新疆，被盛世才杀了。他原本是想到苏联去的。还有一些人最后就逃跑到武汉投靠了蒋介石。当时中央很一致。没有那时的团结，我们就完了。

五、贺子珍

长征走到保安，我又回到中央了。那时秘书长是吴亮平，我没有名义，但做的还是那些工作。那时开会也没有那么严格，中央开会，我要参加就参加了。在吴起镇开会，我是参加了的。

贺子珍

卢沟桥事变后，同国际联系的路线已经打通，人员可以经过兰州、迪化、阿拉木图到莫斯科去。那时盛世才还支持我们。对要去莫斯科的人，共产国际提出的条件是老红军和高级干部子弟；被捕过、坐过牢的不要。第一批选出我、贺子珍、蔡树藩、钟赤兵四个人。以后又有张子意、蔡大姐等好多人去。1937年11月，我们到了兰州办事处。兰州办事处主任是谢(觉哉)老。谢老之后是伍修权。苏联公开是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暗地里同我们党联系。我们到莫斯科就是搭乘他们的军用运输机去的。飞机上没有座位，条件很差。

我去苏联是治肺病，养了一年多。我们到莫斯科后，王稼祥代表国际接待我们。那时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开始我们几个住在共产国际的康佐夫别墅区，住进王明原先住的“留克斯”里。这个房子原来是曼努伊尔斯基住的，和季米特洛夫住的别墅并排。这是一栋楼，中间有一间很大的房间。我和贺子珍一人住一间房。吃饭在餐厅，里面有一个长桌子，吃西餐。王稼祥一个星期来看我们一次，蛮辛苦的。他说，你们在这里长期住不方便，你们要看病，天下起雪来，这里路都走不通，要先把雪铲掉才能走车；我把你们弄到东方大学去住吧，那里有中国人。所以我们后来又搬了。看病是去皇宫医院，由共产国际派人带我们去。这个医院是沙皇留下来的，重要中央人物都到那里去看病。共产国际看我们是毛泽东夫人、张闻天夫人，还有两个将军，就让我们到那里去看病了。王稼祥还是常来看我们。

王明1937年11月回国以后，王稼祥在莫斯科没有什么地位。他是中共的代表，不是国际的书记，在那里只起点联络的作用。我们这批看病的走了，第二批看病的又来了。给这些人跑腿，没意思。他搞这些事不安心，想回去。他当时又没老婆。过去在苏联的好多人都娶了苏联工人老婆。他有个苏联老婆，也是个工人。他这次到莫斯科后，这个老婆想来看他，他不敢见。他一个人住在“留克斯”，一个星期来国际一两次。到1938年5月，任弼时来了。他也是利用机会来治病，就接替王稼祥当了中共驻国际的代表。季米特洛夫很尊重弼时。

我去莫斯科之前，毛主席专门托付我帮助贺子珍。贺子珍是井冈山一个商人的女儿。毛主席住在她家里的时候，住房隔壁就是她的卧室。

我了解贺子珍的情况。毛主席和贺子珍打架，有时就是为一些小事。毛主席爱吃炒鸡肉。他牙齿好，就愿意吃炒的。贺子珍是按老规矩，鸡要煮汤喝。就为这事，两人吵架。有时吵吵就动手打起来。他们打架，警卫员也不敢去拉架。有一次我生病躺在床上，毛主席来了。他不是来看我，是找张闻天。闻天不在，我就叫警卫员去找。毛主席坐在我的床上和我谈这个谈那个，我也天南地北地同他聊。毛主席这个人有个好处，很随和的。不像闻天，不会谈闲话，只谈工作，谈学习，很清高的。我讲：昨晚看戏，是江青演的“打渔杀家”，我很想去看，可是发烧了，没有办法去；戏演得怎么样啊？毛主席讲：不错，不错，演得好。我心里动了一下：老兄动心了。当时我也没有想得那么多，贺子珍还在嘛！

贺子珍要去苏联的时候，毛主席又来了。当时林老(林伯渠)是西安办事处主任，贺子珍住在那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林老打电话来说：刘英，你们几个人第一批去莫斯科，贺子珍也想去，林老的意见是同意她去，毛主席同意就回个电报给莫斯科。当时电报什么都是闻天管的，毛主席就来请示闻天。闻天讲：可以，你同意她去，就让她去。

毛主席和人不大讲心里话，同我可以讲心里

2002年4月23日何方、萧扬、宋以敏在刘英家(这是最后一张合影)

话。他觉得我是支持他的。毛主席说:贺子珍在西安办事处老不回来,影响不好,我同意让她去苏联。贺子珍同你一起去苏联,我放心。希望你多帮助她。如果她能学习,就在那里学两年。你是了解我的,她政治上落后。在井冈山,她光是走路了,没做什么事,孩子又生多了。她生孩子多,我有责任。我要她工作,让她学习蔡(畅)大姐、康(克清)大姐和你。女同志不能老靠男人嘛,她很反感。她没有革命热情。在井冈山时,有一次打仗,古柏受了伤,伤得不太厉害,那时也没有医药,我让她给他洗一洗伤口。她嫌脏,扭头就走。想让她进步,送她去抗大学习,去听听课,她不安心学习,三天两头回来。为什么回来,不放心嘛!她是不放心我。我这里来了人,她总要追问我是干什么来的,我也不能什么都对她讲呀。她总是和我吵架,其实我和她吵的都不是原则问题。史沫特莱有个翻译,很年轻很漂亮的,有次送我一束花。我是领袖,人家来找我,她都看作男女关系。我说送花是礼貌,她认为送花是爱情。我说不是爱情,是尊重我。

洛甫懂英文,可以同外国人讲话。毛主席不能,必须有翻译。这个翻译崇拜毛主席崇拜得不得了,她把毛主席的相片包了一层又一层,还拿给我看过。贺子珍不相信毛主席说的这些。认为叫她提高政治,要她工作和学习,就是要甩掉她!结果吵了一架。贺子珍还和史沫特莱打了一架。有一次史沫特莱派翻译送东西来了,贺子珍见到气得很,说:“你又来了!”啪的一声打了她一个耳光。翻译回去后,史沫特莱也很生气,跑过来也打了贺子珍一个耳光。毛主席非常尴尬。

我也跟贺子珍讲,这个翻译就是崇拜领袖嘛!贺子珍不知道献花是外国人的习惯,很普通的事。当时史沫特莱给斯诺写过信,告诉他毛主席的夫人不讲理,打了她的翻译吴光伟一个耳光。

所以毛主席叫我帮贺子珍,我就同意了,说可以帮帮忙。毛主席说,劝劝她,要她学习,提高一点。

贺子珍人已经在西安办事处。我到西安办事处就见到了她。在去兰州办事处的路上,我一直给她做工作,劝她以后不要再为一些小事吵架。贺子珍说是毛主席不好,没有温情,就连我生孩子,他也不来照顾我。

到了莫斯科,我们帮她找了个人,教她俄文,让她参加一点学习,学点政治经济学。可是她早上喊都喊不起来。我说,老师来了,有钟点的,你不起来,时间就过去了。她讲,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我说,你晚上又不熬夜,又不看电报,为什么不早点睡?她说,我同老毛搞惯了,早睡睡不着。她生活散漫,18岁结婚,学习没兴趣,文化又低,后来又生了个孩子,就带孩子,更不学习了。俄文学了半天学不懂一句普通的话,连吃饭这些很简单的话都不会说。她在苏联不肯学俄文,我在的时候还有我给她当翻译;我一走,她又不会说俄文,也够苦的。

1939年初,任弼时交给我一份电报:是洛甫打来的,叫刘英和蔡树藩回延安,贺子珍、钟赤兵留在苏联学习。这时任弼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我那时不知道毛主席和江青的事,就劝贺子珍和我一起回去。我说一年多了,该回去了,毛主席身边需要人照顾。她说:我才不回去呢!在井冈山,我吃苦吃够了,我要在这儿享受享受,五年不回去。在莫斯科吃得好嘛!是吃西餐嘛!我分析,贺子珍是精神上受了刺激。她到苏联前已经怀孕,到了以后生下一个男孩,只活到六个月大就死了。当时她把孩子抱在怀里不肯下葬。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又问她,带个信给毛主席吧!她说:你看洛甫给你写信,一写那么长;老毛写,就是几句话,就是要我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老一套;现在还不来信了,我不给他写信。到

苏联后，贺子珍是给毛主席写过信，把照的相片寄给他看，也收到过毛主席的回信。贺子珍嫌信写得太简单，给我看了信，信上写：“贺子珍同志，寄的相片收到。身体尚好。望好好学习。勿念。”贺子珍从此不再给毛主席写信了。后来苏德战争一打起来，她也回不来了。所以毛主席不要她，贺子珍是有责任的。

任弼时后来告诉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了。为了照顾她的情绪，把姣姣（李敏）送到她那里陪伴她。解放沈阳后，贺子珍带着姣姣，想去看毛主席。毛主席怕和她见面吵架，没有见她，贺子珍就带姣姣去上海了。

我头天刚从莫斯科回来，不了解情况，第二天就去找毛主席。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我是同情他的。我跟毛主席讲：你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贺子珍扶不起来了，她也不想回来：你身边应该有个人，好照顾你。我不了解江青，只觉得她是文化人，演戏演得不错，又年轻又有文化，由她照顾一下毛主席也好。毛主席一听好高兴，说：你才是真正了解我的；好多老同志都反对我，说不应该同江青结婚；你要替我宣传宣传。他也不讲是洛甫反对。我说，为什么要反对？江青听我讲了这些，也竭力巴结我，拿东西来请我吃。我回家告诉洛甫我和毛主席谈的这些。他讲：这个事你不要管，王世英来信，反映江青在外面名声不好，浪漫，还拿来白区的出版物；好多老同志也反对。他又讲，我有这个责任告诉毛主席。洛甫给毛主席写了信，写得很简单：建议如果同贺子珍不和，可以另找个老党员，把你照顾好；同江青结婚不合适，老同志有意见，她的桃色新闻比较多，为了党的利益，不要同江青结婚。毛主席见了信，当着江青的面拍桌子说，老子就要结婚，明天就结婚！他把洛甫的信扔到地上。这是通讯员回来告诉洛甫的。过了几天，毛主席同江青果然结婚了。他请了两桌客，就是不请洛甫。洛甫说，就是接到通知，他也不去。

陈云当时是组织部长，找江青谈过话，说毛主席已经有老婆，要江青注意点。毛主席知道后生了气，说你这个组织部长怎么还管起我的家事来了。后来有人说，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时中央对江青有个约法三章。这是无稽之谈。那时毛主席已经大权在握，谁能拦得住他结婚？

从此，毛主席对闻天就记恨了。杨尚昆也认为是这样，和我谈到过：洛甫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这件事，是使毛主席最恼火的。杨尚昆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他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瑞卿就给杨尚昆看了。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给他的，就是洛甫。洛甫信里的那个态度是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后来他们两个的关系就越来越僵了。

所以，毛主席后来有些事，他心里有些事，就和我讲。他可以和我谈心，同闻天从来不谈心。毛主席来我们处同我聊天，他也不搭白。他到毛主席那里去，要我同去。我说我去做什么？他说，我讲完了事情，就没有话说了。■

（刘英系张闻天夫人，曾任中纪委委员；何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宋以敏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是何方1999年对刘英访谈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　丁　东）

有奖征集民间抗战实物档案

为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更好地保护散存于民间的抗战档案，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专门新建了民间抗战档案纪念馆，并决定面向全国征集有关抗战的实物档案，包括抗战时期的书信、日记、文件、书籍、照片、奖章、证书以及其他实物等。

我局实行有偿有奖征集。对凡征集入馆的抗战实物档案捐献人均给予一定的征集费，并颁发证书；组织专家对征集到的抗战档案进行评奖，并给予奖励；对征集到的实物档案分类结集编印成书公开出版。

联系方式：023-68863589
张先生、王女士
13996376236　高先生

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

束星北的性格与追求

○ 束美新 口述 许水涛 采访

一、爱国情怀

许水涛（以下简称“许”）：刘海军先生的《束星北档案》出版以来，束星北的坎坷人生成为人们解读历次政治运动危害性的鲜活样本，受到广泛关注。家人更能完整地了解他的心路历程，比档案记载具有更加鲜活的力量。

束美新（以下简称“束”）：20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收集父亲的资料。父亲在世时经常会说到家乡扬州，我于2014年进行了一次寻根之旅，看了他的故居和读书的学堂，感到非常亲切。父亲出生望族，祖父束曰璐是江南陆师学堂优等毕业生，清末官至参领，民国时期任全国水利局主事，后为张謇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南通有自己的企业。祖父为人豪爽、热心，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祖父有二房，父亲和叔叔束佺保均为长房所生，叔叔上世纪40年代曾任英文刊物《自由论坛》的主编。父亲秉承了祖父豪爽、乐于助人的性格。

少年时代，父亲偶然间读到一部关于四度空间的科幻小说，开始迷恋于物理世界的神奇，并确定献身物理科学的人生志向。

许：父亲和您说过国外求学的经历吗？

束：父亲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基本上不用家里的钱，在码头打工扛包，礼拜天还到教堂蹭饭。在美求学时，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外国人的歧视。他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情结很浓，认为一个人背后没有国家的支撑是不行的，会被人家瞧不起的。记得1980年在海洋一所工作时，他的一个学生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太满意，发牢骚，父亲听见后就说：“你们不要动不动就发牢骚，发牢骚也是没有用的。邓小平能把一个走下坡的中国扭转过来开始走上坡了，就非常不容易，让你当主席，你该怎么办？你能一下子把中国变富吗？”父亲对我说：“你们年轻人没有在国外呆过，光感觉国外好，但你们不了解，如果一个国家不强大，国人是多么受气啊！当年在美国，有一个黑人骂我‘黄狗’，他骂我，我可以和他对打。有一次，到饭馆里吃饭，桌上坐了一个白人，我在他旁边坐下后，他抬起屁股就走了，表现出不屑于和中国人一起吃饭的样子。那时受到的侮辱，我永生都不会忘记。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超过白种人，为中国人争光！”

头桥《束氏族谱》所载“家训”二十条，其中最为独特之处便是“共御外侮”条，这条祖训对父亲一生的影响很大。他常常说中国落后国外太远了，早在留学的时候就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念，终其一生未曾动摇过。抗战时期，看到日本飞机轰炸，他就有刻骨铭心的仇恨，要报名参军，并于1945年春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以防范日本飞机空袭。他和王淦昌一起把家里的金子绑在裤子里，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捐给国家。1979年，我哥哥出国留学，他希望哥哥学成后一定要回国效力。

二、天才情结

许：他的科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束：他是理论物理学家，作为我国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先行者，上世纪30至50年代，对相对论和统一场论做出过创造性的研究。同时在电磁学、热力学、气象学、海洋学、航天航空等研究方面，均有建树。他的学术论文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30年代留学期间，发表了一些学术文章。第二个阶段是40年代，尤其是在湄潭浙江大学的时候，达到了一生当中的最高点，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有两

篇文章是在《Nature》上发表的。第三个阶段是肃反和反右之间的一年多时间，连续在气象研究方面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在国内引起较大的反响。他认为中国的降水是从印度洋来的，纠正了从西伯利亚来的传统说法，对苏联专家的这一结论提出质疑，不久因为受到政治迫害，无法继续从事科学研究。1965年，他在长年教学科研的基础上完成《狭义相对论》的写作。晚年在海洋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

束星北

假如没有内战和那么多的政治运动，父亲肯定会取得更多的科学成就。李政道先生认为自己的物理基础和成就，都是受父亲之益。程开甲先生说："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群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或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但现实生活中没有假如，现实是残酷和令人无奈的。

许：他自己有天才情结吗？

束：他说，在科学研究上出成果，要兼具天赋和勤奋，两者缺一不可。李政道之所以成功，天赋的因素可能偏大一些，而程开甲更勤奋一些。但李的一生也很勤奋，到现在还在做学问，实际上都是天赋加勤奋。父亲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如此，他是具有天才情结的。他晚年提出要捐献遗体，解剖他的大脑，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自己的大脑比别人重一些。他是很有自信心的。

三、做事是活下去的理由

许：1954年到1955年，他从事气象研究，认为能够改善农民的生活，这一段时间比较顺，但好景不长。

束：父亲在山东大学工作的初期，因在物理系工作受阻，便转攻气象。我后来与青岛海洋大学王彬华教授关系很好，一直拿他当父亲一样，经常去看他。他谈到，我父亲认为研究相对论有点高深，意识到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还需要靠天吃饭，最大的问题是要解决5亿人的吃饭问题，就决定以自己的数理功底研究气象学，搞长期天气预报。为此，他和王彬华夫妇一拍即合，王彬华夫妇实践经验丰富，我父亲长于理论研究。他觉得和王彬华夫妇合作，一起进行气象研究相得益彰。1954年，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设有气象研究室，是竺可桢先生和涂长望先生直接支持和领导的。那段时期，父亲几乎是一月一篇论文，到1955年，事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由于1944至1945年父亲曾被借调到重庆军令部研制雷达之事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研究工作只持续了一年多就中断了。王彬华挨斗，他被停职，却仍然惦念着气象研究事业，1955年10月13日写信给青岛市委：

我曾于7月28日、8月6日两次奉上材料，请予参考。自8月13日山大开"斗争反革命分子束星北"大会已有两个月。我向学校借的图书已被全部收回，我主持的气象研究室已被封锁，一切科学研究工作全部被迫停顿……对我个人来讲，我薪水照拿，而且我深信"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迟早总要去掉的，我并不顶着急，不过因此耽误了科学研究的进行实是一件不易补偿的损失，尤其气象研究室全停顿下来，无事可做对国家也是损失……

许：他的第一封检讨材料是反右后期写的，就是在您大哥从部队回来后，我觉得这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妥协。夹杂着辩解成分的长篇检讨尽管没有交上去，却是他矛盾心迹的流露，标志着他人生的重大转变，是什么力量导致他写这样的检讨？

束：很简单，之所以检讨就是为了能够工作。我看了父亲的档案和笔记本上写的检查。人家批斗他，谁给他提的什么意见，他都记。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觉得自己确实错了，为什

么？正因为他一直抗争，说得难听点，就是犟嘴，犟到最后你什么事都不用干了。他是个科学家，应该把他的才能和本事奉献给民族和国家，但不幸却消耗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了。

许：他多次表达了不能工作的痛苦，不能出来工作让他特别纠结。

束：对，那是最大的痛苦。1960年，父亲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的门卫室，打扫学校的公共厕所，继续管制劳动。在没有线路图的情况下，他主动申请并修好了一个废弃多年的脑电图机，使这台从丹麦引进的世界尖端医疗器械起死回生，并顺手做了一个改装，使它的寿命延长了三倍，引起全院轰动。此后，学院通知减免父亲打扫厕所等劳动，专心备课辅导青年教师，为此他尽心尽力地讲授电动力学、傅里叶级数、普通物理学、微分方程、矩阵、医学生物统计等课程。十几年间，他修好了山东省所有地方和部队的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保温箱、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等，不但解决了工作的急需，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当时是领着束义新到处给人修，不过他认为这是雕虫小技。1972年，他完成了中国科学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委托的冲击力对金属胶粘结的破坏因素研究。他是搞理论物理的，但他的技术折服了所有人。

许：一技之长保护了他。

束：是的。他做具体工作的时候，就把外面的烦恼都淡化了。在青岛医学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打扫厕所，即使如此，他依然心系教育，不忘科研。他根据学校教学现状和需要，计划写理论物理丛书和电子丛书，并已详细列出提纲。他真的是争取一切机会发挥特长，为国家效力。

父亲告诉我们，做一个实验，只从一种方法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准确，要从几种方法得到同样的结论，结论才能立得住。在科学研究上，他常常对学生讲，你们写文章，必须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要东抄西抄。

在海洋一所工作期间，他与中国科学院声学所汪德昭所长共同倡导，组建了由他领导的海洋内波研究组。他深知海洋内波在动力海洋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对潜艇安全潜航构成的威胁，组织开展了以实测为基础的海洋内波研究。在组织学生出海回来后，他根据实验数据预测内波的方向，利用学生提出的问题，加以启发，指导学生进行研究。

从“动力海洋学进修班”到内波研究组，他规定，没有他的同意，谁都不准擅自发表论文。这样规定是为了让学员专心学习，不要分神。在研究阶段，主要强调研究论文必须有感而发，要讲究原创性。但是总不发表文章，来自外界的压力就大了。当时所内就有人讥讽说，内波组理论水平高，怎么就写不出文章呢？那时的学术风气是严谨的，进修班的学生要评职称，需要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但因为父亲的严格就难以达到。所以进修班结束后，大家就找我父亲搞内部课题，通过出海实验，拿到数据，大功告成，才可以发表文章。他自己也是不轻易发表文章的，五年中也只写了两篇论文。

他做学问达到忘我的程度。灾荒那年，母亲上街买菜，让他照看炉子，嘱咐他搅和锅，他就一边看书一边搅，待我母亲回来时还在搅。一看炉火早灭了，锅也煳了。

父亲一直主张，对科学研究，疑则灵，对人，诚则灵。上世纪80年代初，特异功能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我记得特别清楚，父亲写了十几封信，提出质疑，有给报纸的，有给科学家的，叫我抄好，分别寄出去，问人家这个实验是你在场亲眼看到的吗？即便有，对人体真正有多大的作用和意义？在这个问题上，他表达了冷静和理性的立场。

许：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父亲的表现是不是让您感到意外？

束：是。我是在秋收劳动回来的路上听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回到家后，父亲起先高兴地拿出酒喝，随后竟嚎啕大哭起来，全家人为之愕然，他边哭边喊王淦昌、程开甲的名字，一位是他的挚友，一位是他一手带起来的学生，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两个人参与研制原子弹了，并为不能亲自参加这么重要的工作感到痛苦。

我们感到奇怪，不大理解，只知道他难过，想工作，为什么老是检查？他曾经表示，最怕的不是政治压力，而是不让做事情，对他来说，做事情才是活下去的理由，不让做事情的痛苦是难以想像的，这种情绪是他刻骨铭心的一种感受。后来我到北京见到程开甲的时候，他说，1941年，束先生和王淦昌带领他一起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

华 岗

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也是这样建议的，实际上我们当时的研究和爱因斯坦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父亲认为应当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国家做贡献，就因为被打成极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而无法发挥。哪怕检讨，哪怕做农机改造，哪怕做修修补补的事情，他都愿意干，能做的一定做，就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实现人生的价值，喊口号是没有用的。

许：1949年，面临人生重大选择，他是如何应对的？

束：我叔叔是《自由论坛》主编，婶子是“国大代表”、宋美龄的秘书，都是搞政治的。叔叔动员他到台湾，他说国民党已经腐败透顶了，人各有志，新中国成立也需要物理。他觉得自己是科学家，在哪里都能生活，干嘛到台湾？再就是他相信已是共产党员的李文铸了，说李文铸是个非常厚道的好人，对李文铸的信任甚至超过他的亲弟弟。

四、追求真理的代价

许：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是浙江大学唯一没有写“忏悔书”、抗拒运动的高级知识分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束：我也一样，我是我们班唯一没有写入团申请书的。父亲之所以不写，是因为他自认为历史清白，不需要什么忏悔。据浙江大学原副校长李文铸回忆，刚解放时，就有人以父亲曾在国民政府军令部工作为由，将父亲列入镇反名单。但在浙江大学，有李文铸、许良英等一批了解父亲的共产党员学生据理力争，保护他过关，才使他得以解脱。后来到山东大学，就缺这么一块。

父亲个性很强，从小就喜欢读武侠小说，遇到事情总爱打抱不平，在浙江大学的师生中有“束大炮”的绰号。三反五反期间，苏步青仅由于用了几把公家的椅子以及一些其他琐碎的事，要被当成贪污犯批斗，曾想以死抗争。是父亲闯到了浙江省军管会，说：“你们是要一个数学家，还是要几把椅子？”以理相争，从而解救了苏先生。

许：从浙江大学到山东大学，他是怎么考虑的？

束：当时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浙江大学由综合性大学变成工科大学，王淦昌、贝时璋、竺可桢等调到中国科学院。父亲认为科学院人才很多，就不去凑热闹了。还有一些人调到复旦大学，如谈家桢、苏步青等。父亲到山东大学是华岗校长派专人到浙江大学请的。当时，厦门大学的卢嘉锡也派人请他，父亲一开始在犹豫，后来可能觉得厦门的空气太潮湿了。王淦昌和谈家桢的爱人等都说青岛干净漂亮，他就选择了青岛。刚到青岛时，父亲得到了很好的安排，山大第一公舍里最好的一座楼房由原物理系主任郭毅诚腾出给我家住，父亲的工资待遇在山大也是最高的。

父亲终身追求真理，这个风格与他在浙江大学的经历有关。浙江大学的精神是求是，老师与学生打擂台是很平常的事情。学生可以挑战老师，能够给老师挑错，在学术争论上是平起平坐的。在学问面前没有权威，那个年代浙江大学为什么能出那么多大师？与浓厚的学术风气有很大关系。1938到1945年，为躲避日本军队的侵略和蹂躏，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从杭州一路西迁到贵州遵义附近的湄潭，坚持流动办学，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播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苏步青、谈家桢、王淦昌等和我提起那段艰苦的岁月，都感到非常自豪。此外，他在美国、英国跟随一些名师求学，这些经历养成了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竺可桢刚到浙江大学任校长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苏步青和我父亲等教授的认可，他们认为竺可桢是靠关系进来的。在湄潭期间，王淦昌先生一度染上肺病，理学院院

长胡刚复请我父亲担任物理系主任，程开甲代表物理系领取科研实验材料，没想到总务处长却故意刁难，程开甲只好将此情况向父亲汇报，因责任所系，父亲亲自去总务处交涉，但仍然受到刁难。父亲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出拳打了对方。杨竹亭回忆："教授打人当然不对，但全校师生多称赞他，认为该打。"此事闹到了竺可桢校长那里，竺校长亲自到湄潭处理，虽然总务处长是竺校长的亲戚，但竺校长还是公平地处理了此事，他认为总务处影响教学，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束教授的批评是应该的，但打人也不对。竺可桢就这样以坦荡公正、宽容大度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我父亲。

许：但在山东大学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和华岗校长的争论曾在山东大学和全国许多高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束：华岗认为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父亲却坚持自然科学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华岗反复强调辩证唯物论是具体的真理，是一切科学的科学。父亲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哲学说到底就是白马非马，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不能解决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很具体的，是要解决客观世界的各种问题的。两人越争论越厉害，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起真来。华岗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父亲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谁也管不着谁。1954年下半年山东大学决定对他展开公开批判。罪名是"公开地反对辩证唯物论，公开叫嚷：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第二；公开地反对并抵制'全面学苏'"，说明他不管形势怎样，只服从真理。他去过苏联，认为苏联的科技发展水平比英美德差得多，对当时全国高校一律采用苏联的教材很反感，因此受到了批判。

父亲与华岗的关系富有戏剧性。1955年8月父亲写信给王淦昌，有一段是关于华岗的："……这件事的原因是1953年学习辩证唯物论时，我不同意华岗校长所标榜的'哲学一定要管科学'（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一定要管物理、化学'……我敢向华校长直接提出大逆不道，犯君之怒，罪该万死了。死虽死，真理终究要战胜的！"由于双方争执不下，陈毅受周总理委托曾两次在北京召开专门会议解决束星北的问题，父亲最终得到了平反。我认为，华岗作为校长在公开场合、在酒席上赔礼道歉，很不错的，但父亲却不依不饶，要通过召开全校大会的方式赔礼道歉。1956年10月，山东大学党委在大众礼堂宣布父亲的平反结论并当面向他道歉。他就觉得，你在哪个范围给我造成影响，你就得在哪个范围给我赔礼道歉，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对华岗一点没留情面。

但历史开了个大玩笑。事隔不久，华岗因反革命罪被逮捕，从他家里抄出了美元，说是特务活动经费。父亲听说后，坚决地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即使有美元，也一定是他在香港所得的稿费。"

1982年，华岗已去世多年了，父亲带着我到青岛市大连路9号去看望华岗先生的夫人谈宾若。他认为，华岗是个好人，观点不一致是正常的，两人的争论，只是政治观点和学术上的重大分歧，但他从未怀疑过华岗的品质和人格，同时也后悔对华岗采取顶撞的态度。

1952年底，在山东大学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著名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王竹溪30年代初就在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论，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学术报告进行近50分钟时，父亲走上讲台，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父亲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40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让他坐下来，他都没有。校领导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父亲谈话，父亲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父亲的质疑让一些人接受不了。但我父亲从来不把学术上的争论分为人的高低。

许：这样的做法在讲究中庸的文化环境里，是很容易产生冲突的。

束：这件事情，山东大学很多人都知道。母亲对父亲说，不管怎么样，你这样就等于得罪了北大，得罪了周培源。父亲说这没有什么，学术

讨论都是这样的。父亲习惯甚至喜欢这种争论方式，错了就是错了，错了不丢人，不认错才丢人，这是他一贯的观点。他年纪大的时候，问我有关编程序的事，我说我就是一个小助工，你问我不掉价啊？他说不懂就要问，不懂装懂的才掉价，我问你怎么就掉价了？

父亲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抗上，对上面顶，我们全家都批评他。你抗上，带着我们都有点抗上，我就有。越是领导，越不买账。

束星北和女儿束美新在一起

许：他对着搜查人员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现出强烈的法治意识。

束：“肃反”运动开始后，1955年的一天半夜，我们突然被母亲叫醒，看见家里闯进来好几个陌生人，他们翻东西、砸墙，看看有没有电台。我们怕极了，母亲将我们挡在身后。当时父亲手里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公民住宅不得侵犯。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们家失去了平静。

许：1957年5月，他在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是他人生的亮点，比同时代知识分子看得更高一些。

束：这次发言所造成的影响太大了，20多次被掌声打断。发言中对党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实事求是地说，“即使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发言后，领导上多次派人来，明确表示，让他做个检查，事情就算过去了，但他就是不承认有错。后来领导上又表态，哪怕是口头上有个表示，说发言欠考虑，也就能过关了，但父亲仍不肯。用母亲的气话说，是他“逼”得人家把他打成极右派分子。

父亲担心歌颂“人”，不歌颂“宪法”，“人治”而不是“法治”，将很危险，毅然表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人民宪法，两者皆可抛”，认为国家的命运如果掌握在某个领导人的好坏上，就很可悲。他认为，即使给党提意见也是出于帮助党整风，是为了党好。用他自己的原话说：“你让人提意见，如果认为不对，不听就是了。”但在当时，这却成为大逆不道的罪名。他问人家，你当时为什么把我打成右派？那个人说，我怎么看你都像右派。这哪有法治可言？一个国家的命运绝不能决定于某个领导人身上，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这是民主的精神。我认为，他之所以有以上言行，是因为他从根上很少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不大计较个人的得失。他毕竟不是小市民，首先是科学家。

许：被批判还不断辩解和抗议，他意识到要为此付出代价吗？

束：没有意识到。他认为他是教授、学者，就直率地讲了。父亲奉行实事求是的理念，我认为，他最大的错误在哪里？他是学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拿数理的逻辑和思维方式来推敲和看待社会，走不通的。

许：他一辈子都是如此吗？

束：他的思想一直没改变。在父亲的档案中查到一封信，那是1955年8月29日写给王淦昌的。信中写到：“淦昌兄……山大在肃反运动中对我所采取的方法，我本不想告诉你，现在你既然来问，大约也听到一些，我就告诉你吧。自7月20日起山大就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来斗争我……淦昌，记得我最佩服的人是Galileo（伽利略）吗？我想决不会给朋友丢脸，我不会给中国人丢脸，屈服于恶势力之下。”

我写过一首小诗，表达对父亲一生的理解：“求是笃行傲骨身，当之无愧胡杨魂。赤诚报国从无悔，留得身后满园春。”■

（许水涛为全国政协文史馆副馆长）

（责任编辑　丁　东）

参加理论务虚会的经过

○ 于浩成 口述 邢小群 采访

参加会议的经过

据说叶帅提出,在党内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耀邦当时主持中宣部,就由耀邦来召集。这个会,事前通知我参加。后来,我才知道是于光远提的名。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王仲方同志跟我很熟,他在群众出版社的时候,是我的老上级。那会儿,他是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任群众出版社的副社长。理论务虚会开会时他任中宣部秘书长。会后,王仲方有一次跟我说:“别人说你是我提的名,不对,是于光远给你提的名。其实,咱们在很多事情上意见并不一致。”我说:“那太荣幸了。”因为我对光远非常敬重。事后我就想,为什么于光远提名我呢?那会儿开了很多讨论会,批判四人帮,批判“公安六条”。大概我的发言给于光远留下了印象,所以提名。当时,赵苍璧任公安部长。据说,他还给中宣部打电话,说:“你们怎么让于浩成去参加呢?我们的意见是让陆石去参加。”陆石当时是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结果答复他说:“这个会不是由各部派人参加,是由中央来指定。不过,开一个阶段以后要扩大,各省再来一些人,这时候可以考虑请陆石参加。”

这次会议分几个组。我在周扬这个组,是第三组。政法部门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高检的王桂五同志。在理论上,我是初出茅庐,水平是比较低的。可是我很高兴能有机会,跟很多著名的理论家坐在一起谈,听他们的议论,确实是一次很珍贵的学习机会。我在会上发言不多。大家情绪很高,畅所欲言,好像都讲不完似的。

会议一开始,主题就是批“凡是派”。在前一年,也就是1978年,曾经有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凡是派”,发言的人很多了。王若水谈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教训是个人迷信;李洪林说领袖与人民,不是人民应该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该忠于人民。现在这些观点很平常,当时可非常新鲜。严家其提出,应该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过去这是没有人提过的。我在发言中表示拥护。

有一次,中午吃完饭闲谈的时候,周扬也在。我说:“中国这些事情,恐怕跟毛主席从来没有出过国有很大的关系。他就是去过苏联,所以对外部世界很少知道。”周扬非常赞成,他说:“你说得好。”对周扬,我个人是非常尊重的。虽然他过去那么“左”,文革中,自个儿也挨整了;后来他转变了,好像变了一个人。看得出来,他这个变化不是假装的,他是很真诚的。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在理论务虚会上,听说有个李一哲大字报。习仲勋、杨尚昆主持广东工作时,给李一哲大字报平反了,同时省委宣传部也发了一些东西。我就把李一哲大字报和省委宣传部的文章放在一起,编了一个小册子。公安部副部长凌云陪着小平到美国访问回来,我跟他讲,要出这本书。不是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吗?在理论上应该可以作为参考吧。凌云第二天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个小册子不能出。我说内部发行吧。他又来电话了,内部发行也不行。我讲,书已经付印了,是不是不作为内部发行,就作为资料印一些存起来,让有些研究理论的人看一看。他说可以。

我记得,会议分成两个阶段。原来是在科学会堂开,后来休会过春节,又在京西宾馆开,我住在京西宾馆。原来是跟《红旗》的马仲扬住一屋,后一阶段又跟郭罗基在一个屋。我觉得这次会议的讨论非常好。别的小组的会,有记录,发简报,我们可以知道其他组的一些发言。当时感

1988年11月14日于浩成在家中写作

觉，这是党内从来没有过的完全放开、自由的发言，是一次说什么都可以的会议。

我的发言内容

因为我是在公安部系统工作，所以我自己的发言主要是谈平反冤假错案和民主与法制。老实讲，当时的公安部长对平反冤假错案并不是很积极。后来，我从部里边得知，耀邦提出来的平反冤假错案，被抵制得很厉害。

我认为，平反冤假错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公安部来说，非常重要。我以公安部为例，提出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我认为，谢富治搞的那个“公安六条”，一直在起作用，直到1977年还发生王申酉、李九莲等冤案。什么叫“恶毒攻击”罪，恶毒攻击怎么和批评、反对以及讽刺分开？去年春天，还有人因为贴大字报被抓起来，原因是提出要警惕克格勃的影响，被认为是影射攻击。

我还着重讲了民主与法制的问题。我认为，政治不公开，是妨碍发扬民主的一个因素。以前，党的八大发言都在报纸上公布，后来开党代会都秘密进行，突然发个公报就算开过了。执政党是否需要这样做：传达会议文件严格规定范围，当然必要的规定也需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几个同志的检讨，只传达到部党组，省委常委，八届八中全会朱老总的检讨都发到县团级。现在，彭德怀同志已经平反了，朱老总怎么办？“两个凡是”出笼以来，很多消息都是靠小道得到的，不然什么都不知道，小道消息是对没有大道消息的一个惩罚。现在内部发行的书、电影太多，是否必要？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也值得研究。立法，应该是人大常委会来管，结果是中央政法小组出面搞立法，然后由人大常委会盖章、发布，这样做是不好的，不利于发扬民主。中央5号文件关于摘掉地富帽子，是以中央名义发的，是否应由人大常委会正式公布较好。我还提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否合法的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不超过半数，不超过半数能有效吗？党的八大以来，破坏民主集中制太严重了。罢免刘少奇也没有取得合法手续，不了了之。这些做法不应再重复了。

我当时的日记

我从1978年起，就有日记，1979年也记了。下面说几段和理论务虚会有关的：

1月19日，星期五，吃早点后，7时三刻即开车到友谊宾馆科学会堂参加理论务虚会小组会。与会者很少，经济所董辅礽未来，王惠德、邢贲思主持，李初梨来了。周扬因参加一个追悼会迟到，王惠德则讲了他们六个人，曾涛、胡绩伟、杨西光、华楠等，将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论争经过详加叙述。朱穆之参加本组，但早走，李初梨讲的不少，公开说老子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下午党员回到部里，在一起学习。听赵部长讲话，吞吞吐吐，遮遮盖盖，含含糊糊，对对付付。有些人不满意，大家意见甚多，晚饭后去看刘复之，不在，王秀莲正陪张君秋夫妇。去看席国光，亦不在。

1月20日，参加理论务虚会小组会，由郭罗基，安徽，辽宁，上海同志发言。

1月24日，上午王桂五发言，在宾馆吃午饭，下午未讨论。留在会议室看简报，孟凡给马仲扬和我传达中宣部领导人谈的一些问题。上午去友谊宾馆参加理论务虚会，中途返家吃饭，下午乘部里汽车去政协礼堂参加廖鲁言、徐子荣他们

几个人的追悼会。

1月26日，未再开会，仅召集人汇报。听说黄镇对郑伯农所提的意见，关于电影审查委员会，十分激动，自称大老粗，不能领导文化。生气了。下午，余在小组会上发言。

2月3日，小组会发言。一人在室看文件，我们都没回家，孟凡送社会风气一稿，给余，让我帮助他修改。下午开会。

2月4日，谈民主问题，12时乘车返家。

2月5日，上午早点后去刘复之家取回李一哲大字报，去京西宾馆将《福尔摩斯探案》和溥仪的《我的前半生》送王仲方。上午会上王惠德长篇发言，下午去11楼参加于光远发起的沙龙讨论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问题。十分开脑筋。

2月6日，上午到宾馆，董辅礽等发言，下午看简报等等。晚上看电影《风流女窃》和《猛龙》，台湾出品的，那明星最后累死了。

2月7日，上午发言多是谈阶级斗争问题。

2月8日，上午讨论民主和法制，因耀邦批来上海市委电报，余发言讲了几点意见。

2月9日，卢之超继续发言，前后谈几封电报，关于上海、杭州、江西等地知青请愿的情况。下午返机关，李一哲大字报交杨怡发稿。

2月10日，早起乘小尹的车去京西宾馆吃早点，今日是最后一次小组会，以后按专题分组。至15日，第一阶段结束，18日后为第二阶段，王殊来，是第一次到会。午睡后返部。

2月12日，上午去京西宾馆仍开小组会，传达昨日耀邦指示，第二阶段会延长至3月5日，就是中断了。王桂五发言讲法制，余接着讲了一些意见，大家插话十分活跃。下午去友谊宾馆听周扬给青年作家讲话。

2月13日，上午继续开小组会，王桂五同余发言，昨天王殊第二次发言，众人批评。下午参加于光远发起的关于民主的座谈会，胡绩伟、林涧青、李洪林、郭罗基、徐才等参加，晚饭后返家。

2月14日，去京西宾馆，讨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问题。

2月15日，上午开最后一次小组会，王惠德传达，到会均为个人资格，不作为单位代表，没有传达任务，联络员通知有两份简报要求退回。周扬谈了谈，中午吃饭时，与孙冶方、王若水同桌，周扬吃过来谈，又说，陆定一在出版会上说右比“左”好。我想，恐怕是一时偏激之谈，周甚欣赏此语。周说，主席均好心办错事。余说文化大革命恐不能这样讲。孙冶方对余此意甚为同意。下午参加范若愚、吴江、孟凡、马仲扬等讨论康生的会，这也是一个小会。沙龙式的。

2月16日，到家里了，同孙仲义谈工作，张鸿义打过电话来，要理论务虚会简报，余加以拒绝。

3月17日，上班后接通知到南大楼，又去五号楼。赵部长、凌副部长、李广祥副部长、姚艮主任，戴文殿、李基晨副主任，还有北京市局焦昆同志参加会议。邓昨日讲话，反应强烈。戴说务虚会说过了头，陆石说越开会，思想越乱。余当即驳斥：不能这样讲。陆又谈神化不行，丑化也不行。报刊宣传有问题，《光明日报》把毛同斯大林联系起来了。余想，这一切都很有趣。但傅月华，经研究，不能公开审讯。会上布置耀邦指示办一公开刊物之事。会后戴马上表示由调研处搞。

3月26号，接电话通知，理论务虚会复会，明日报到。后日听小平同志报告，讨论到4月2日，不再扩大召开。

3月28日，上午去友谊宾馆，下午开小组会，王惠德、洪禹传达上午在京西宾馆开召集人会议的情况。于反映傅月华不能公审一事已报小平同志。

3月30日，下午同孙仲毅步行去大会堂。余同解放军政治学院坐一起。小平同志报告长达两小时，散会后返家。

3月31日，上班后乘小车到友谊宾馆，上午看文件，下午小组会讨论。王惠德去京西宾馆参加召集人会议。

4月1日，早点后同邢贲思、马仲扬、郭罗基散步。上午开小组会，午睡后返家，晚上去看凌云不在，到陆石家，争辩收容是否合法。刘复之又叫去谈务虚会情况。

4月2日，上午到友谊宾馆开会。一开始余谈北京市通告关于收容问题，许多同志都说逮捕拘留条例才公布不久，违反宪法原则的做法不妥。

4月3日，上午去友谊宾馆参加最后一次小

2014年9月5日，李洪林、于浩成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理论风云

组会。下午3时出发乘大轿车到京西宾馆听胡耀邦同志给理论务虚会作结束语。

会议之后

3月16日以后，我回到部里，就听到有人讲，这个理论务虚会是错误的。但是部里还是让我讲一讲理论务虚会的内容和精神，公安学院也专门找我去讲了一次。我还是完全按自己的理解讲。又有人说，理论务虚会是非毛化，这些话都是有针对性的。当时，我们在会下搞一些小沙龙，代表们的意见都是比较尖锐的。像毛的纪念堂存在与否，都提到了。大家认为，对毛的批判，不止是他的晚年。毛在1957年以后犯了“左”的错误。很多人都说，事实上他从建国之初，就把他自己提的新民主主义推翻了。毛说，从1949年起中国就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了，从中央到地方都觉得很突然。

关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不止是在理论务虚会期间了。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说社会主义是个早产儿：“那会儿，毛批刘少奇巩固资本主义秩序，认为刘少奇跟天津资本家的谈话是不对的，用的是剥削理论。实际上，刘少奇讲的是对的。”

那会儿，大家已经看清楚了，光有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的8月18日，邓小平讲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讲得非常好，这是他的高峰。波兰瓦文萨团结工会出来了，胡乔木马上写信给陈云、小平和耀邦，政治改革就刹车了，说如果搞不好，我们就要重蹈匈牙利事件的覆辙。

理论务虚会以后，中宣部还有一个双周座谈会，是耀邦领导的，规模小多了。记得当时出版界除了曾彦修以外，还有人民出版社的党委书记陈茂仪，然后就是我。其实，群众出版社原来在出版界是不出名的。双周座谈会，胡耀邦让李洪林主持。1979年12月3日那天，他刚一来就说：“洪林，今天谈什么呀？”这时，胡乔木说：“小平同志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可是我们报刊很少宣传。”胡绩伟反问：“怎么没宣传啊，我们登了李洪林的几篇东西，就是谈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我把李洪林这几篇文章放在一起，出了个小册子：《我们坚持什么》。后来上头派人让我检查。我说，我不检查。这几篇文章都是《人民日报》登的，《人民日报》是我们的党报，作者是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的副局长，要有什么错，你找他们去吧。我们认为写得非常好。■

（于浩成曾任群众出版社社长，2015年11月14日逝世，享年91岁。邢小群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丁　东）

本刊启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结合我刊的实际情况，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作者将作品的数字化处理权、网络传播权、电子发行权、无线增值业务权授予本刊，同意本刊将以上权利转授予与本刊合作的第三方使用，稿件采用后即自动获得上述授权。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酬。如作者对上述处理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中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炎黄春秋杂志社

王申酉命运的思考

○ 钱理群

一、王申酉的思想来源和发展过程

王申酉是工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他的父亲是上海闸北工商联勤杂工人，母亲是火柴厂的女工。1962年秋，17岁的王申酉高分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这是他家祖祖辈辈和所有亲戚中第一个大学生。他在入学不久的日记里，就表示："我非常崇拜'个人奋斗'的科学家，我最崇拜在刻苦的环境，在污泥中自拔，永远谦虚、勤奋中培养出天才的科学家，而我将在这方面永恒的奋斗"，而在他的理解里，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注1]在1965年8月31日日记里，他又这样写道："永远记着我21岁的第一天许下的誓言：永远为穷人的翻身而努力！因为我是穷人。"[注2]这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而且他还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习惯，有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怀疑精神，这都是科学创造最重要的精神素质；这都表明，王申酉确实是一个创新型的科学研究人才的好苗子。但他却生不逢时：就在他考入大学的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1964年又作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的"教学改革"的部署。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氛围下，王申酉"凡事有自己见解"的特性，就引起了高度警惕。住在同一寝室的班长趁王申酉不在时偷看了他的日记，发现了他的那些不满意现状的片言只语，上纲上线为"反革命言论"。从此，王申酉成为党组织认定的"反动学生"，一直作为监控、打击对象。1965年因为不肯交出全部日记，而拒绝他入团。1966年王申酉和全校同学一起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临出发时，他和几个资产阶级子弟一起被赶出队伍，押回上海。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王申酉被隔离审讯、抄家，惨遭毒打，最后送进上海第一看守所，关了一年零三个月。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中，王申酉因为同情一位被批判的同学，又在"思想小结"里反复表达了自己想学习一点知识的愿望，又被工宣队横加"猖狂攻击文化大革命"、"破坏一打三反运动"的罪名，由上海革委会文教组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不戴帽子，留校监督劳动"，因此大学毕业而不予分配工作。11月，就被送江苏大丰县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达一年七个月之久。1976年"四人帮"垮台以后，王申酉依然处于待分配状态，并受到严密监视。1976年9月10日，王申酉正在给女友写信，表白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受命监视他的工人突然冲进来，并再次将其逮捕入狱。在审讯时，王申酉根据办案人员的要求，重写这封没有写完的"情书"，作为"供词"，长达6万多字，这实际上是他留给后人的"政治遗嘱"。而当局也就根据这份情书（供词），由当时的上海师大党组上报，普陀区法院党组、区公安局分党委联席会议决定，由上海市委常委会最后批准：判决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历史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王申酉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被枪杀，时间是：1977年4月27日。[注3]

可以说，王申酉是一个纯粹的"思想犯"，他之有罪，就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不同于执政者和舆论的独立思想；他的全部罪证，就是他的并没有公开的私人日记和书信。而且他还是一个自觉的"思想犯"。他很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思想、言论自由的国家。文革一开始，他就在一篇日记里写道："看来'兴文字狱'还算是好的。现在拼命在'兴话语狱'，凡说错话的都可以揭发批判，平时话多的也就更倒霉"。[注4]早就有人劝他"不要写日记，否则要丧失一生的"，王申酉说："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写"，因为"一个人不能坦率

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甚至偏要逆自己的观点去写东西发表，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了”。注5他在给女友的信中这样说：“我自信自己是为了追求超越于个人范围内的人世间中像知识、真理、正义等等一切美好事物自愿作出牺牲的。我现在的命运实在是我原来想象中的最佳命运了。我对自己的命运从来不抱悲伤的心情”。注6他深信，“我的价值正好在于这些被宣判的‘罪行’上”。注7

王申酉

仔细读王申酉的《供词》，可以发现，王申酉的思想有一发展过程。开始，他的怀疑、批判都是对现实的即时反应，虽不乏锋利与深刻，但都是零星、片段的，而且他自己也还处于矛盾与惶惑之中。

在1964年9月19日的一篇日记里，他一方面对中国式的集权体制作了一针见血的揭示：“举国上下只能存在一个思想，一个政体，一个力量”，“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人的脑袋”，“要求全心全意、一心一意、一个思想、一个目的地抛弃自己一切而忘我工作”，“六亿人民完全必须受到空前的思想及行动上的压抑，要不顾一切地拼命立起来。六亿五千万人民身上凡是可以抽出的有价值的东西都须被并几乎已经被集中起来了。人除了获得最低的生活条件以外，一切剩余价值都被点滴地集中积累着，以便将这些点滴的东西汇合成大量的资金，从而通过最合理最有效的途径去使用，获得更多更大的物质基础材料。用来建设，用来保卫自己”。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王申酉承认，“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掌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但他同时又设法为之辩护，强调“这是巩固政权的、不至于崩溃的极其必要的步骤”，中国人民必须为了“建设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新型国家”而“忍受精神与物质上的窒息”。注8这样的“为国牺牲论”显然和王申酉的个体独立、自由的思想不相容，他要说服自己也并不容易。

在1970年11月到1972年2月，他在大丰干校期间，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他如饥似渴地读了两遍《资本论》，还阅读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剩余价值学说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等，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他读了大约有几千万字，写了一百多万字笔记，还抄了27万字的《世界通史》和厚厚一本《马克思传》。王申酉后来说：“在现代化大工厂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中工作的工人，最接近、最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注9作为工人的后代，他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自然有一种难言的亲切感；更重要的是，他是带着文革中积累的无数问题去读的，他迫切地希望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中国与世界。他现在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找到了“透彻地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方法和立场”。他后来在《供词》里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别人运用马列主义词句，自己也在大字报中运用马列著作的词句，总当作工具看待，根本没有意识到它是一门科学”；只有在阅读了马列经典原著以后，才“慢慢产生了真正的兴趣，逐步发觉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门人类来理解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科学”，“从此我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在《供词》里集中呈现的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对文革的许多批判，就不再停留在感性现象形态，而具有更强的理论性，更加全面系统，也更深刻：这都是他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来观察、思考、分析现实社会问题的成果。王申酉也有充分理由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可以）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了，那实在是我人生真正的转折点”，“我从三卷《资本论》中获得了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巨大的精神享受。我惊叹人类会创造出

这样美好的精神食粮——可惜绝大多数人不理解这一点。从此，我对整个人类社会，一切社会现象换了一种看法。马克思完全把我带进了另一个精神世界。我第一次相信它会把人带到真正崇高的境界”。注10

正是这样的信念、信仰，使命感，以及底气，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王申酉说，自己“从来对一切横逆持藐视甚至讥笑的态度，对一切攻击污蔑若一种微风，毫不所动，最多像蛛网一样抹去，从来也没有让其阻挡我，反而是推动我探索知识的真理，努力造就自己的步伐”。注11他公开宣称：“对于人类社会中最强暴野蛮的精神统治，我是一头坚强如钢的雄狮”。注12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我的精神世界多少超越同时代的青年人”。注13

王申酉还意味深长地说：“我是属于历史的人”，并作了这样的阐释：“正是从全人类的命运及整个历史的广泛角度来观察一切，才使我们的生命具有历史的性质。我们较少关心注意我们在现存坏境中的个人处境，即使关心也只是为了使我们有较好的条件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及其历史。显然，我的意识形态很难与我生存其中的具有短暂历史性的、属于地球偏僻的一角的地方相适应”。虽然也“深切地感到我所经受的一切个人牺牲还是有价值的，还是被有思想的人们所理解的”，注14但真正要得到认识与承认，还需要留待历史的检验。他在给女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对我的人生价值的评价，让历史去判断吧”。注15他还说：“我的历史是会有真正见证人的！！！关于我是怎样一个人，唯一可靠的就是那三个‘历史结论’（按，指他的三大罪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吹捧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攻击反右运动、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会永远保留在我的历史档案上。我并不认为有罪，有思想的人认为这是我的价值所在”。注16

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信仰坚定，具有创造历史的自觉意识，精神力量强大的“新人”。这正是由革命所造就的：在王申酉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俄国革命、苏联革命与中国革命对他的影响。他对女友特意谈到俄国革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希望她能够“理解和欣赏拉赫美托夫这样一种人。许多革命家曾从他身上的优秀品质中得到借鉴”。拉赫美托夫为磨练革命意志，每天睡带有钢钉的床，这就给愿意献身革命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王申酉也是他的后续者中的一个，他在给女友的信中就说到，“我感到我一生要吃苦，得磨练意志。我整年用冷水洗澡，三九寒天也咬着牙用冰水沐浴洗澡。劳动时尽量光脚，以磨练意志”。注17王申酉在1959年14岁时的日记里，就郑重抄录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作为人生座右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注18，看来王申酉是坚守了这样的诺言的。这样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气质，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此后的时代很难复制，而且也必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对后人的启示作用也不可否认：这是一份不可忽视的精神财富。

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思想资源，是文革时期民间思想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如当时我们那个民间思想村落的一位朋友所说：“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这一代的意识形态襁褓，是每一个喜欢理性思辨的人都无法舍弃的精神资源”，“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成了新一代思想者共有的精神起跑线”。注19而王申酉则更为自觉，执着，信仰也更坚定。这样，王申酉的命运就具有了“在文革中成长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命运的典型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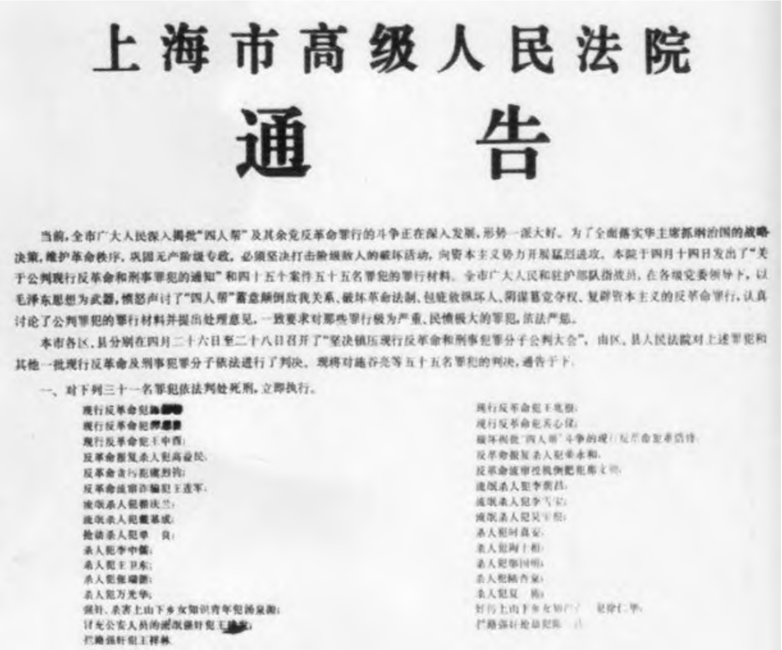
王申酉于1977年4月27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让很多人感到震惊。震惊之处有二。

其一，王申酉是工人子弟，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身体力行者，在宣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理应成为依靠对象和接班人，为什么却被无端枪杀？

这就涉及到两个根本问题：我们所实行的，是怎样的“工人阶级领导”？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

在工人阶级领导问题上，列宁主义是有明确的理论说明的：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只会引向工团主义；工人运动要由自发走向自觉，就必须有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灌输与组织领导。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要党来代表的，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作用

是要通过党的领导来体现的，而党的领导也是通过党的最高领袖来体现的。而且，这样的领导是不可质疑的。王申酉对党的领袖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提出批评，就构成“反党罪”，而反党就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党”的王申酉被处以极刑，就是工人阶级的叛徒应得的惩罚：他的工人子弟的身份只会加重他的罪恶，党的阶级路线从来是“重在政治表现”的。这就是说，在“党领导一切，用党的思想统一一切”的铁的逻辑下，王申酉这样的不受党的思想限制独立思考的青年，就会被视为“党的敌人”，只能有这样的“下场”。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通　　告

当前，全市广大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反革命罪行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形势一派大好。为了全面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维护革命秩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向资本主义势力开展猛烈进攻。本院于四月十四日发出了“关于公判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罪犯的通知”和四十五个案件五十五名罪犯的罪行材料。全市广大人民和驻沪部队指战员，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愤怒声讨了“四人帮”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破坏革命法制、包庇纵容坏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认真讨论了公判罪犯的罪行材料并提出处理意见，一致要求对那些罪行极为严重、民愤极大的罪犯，依法严惩。

本市各区、县分别在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了“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公判大会”，由区、县人民法院对上述罪犯和其他一批现行反革命及刑事犯罪分子依法进行了判决。现将对[illegible]等五十五名罪犯的判决，通告于下：

一、对下列三十一名罪犯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现行反革命犯[redacted]；
现行反革命犯[redacted]；
现行反革命犯王申酉；
反革命报复杀人犯[illegible]；
反革命贪污犯[illegible]；
反革命流窜诈骗犯王连军；
流氓杀人犯[illegible]；
流氓杀人犯[illegible]；
抢劫杀人犯[illegible]；
杀人犯[illegible]；
杀人犯王卫东；
杀人犯[illegible]；
杀人犯万光华；
强奸、杀害上山下乡女知识青年犯[illegible]；
冒充公安人员的流氓强奸犯王[redacted]；
拦路强奸犯王祥林。

现行反革命犯王[illegible]；
现行反革命犯[illegible]；
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犯[illegible]；
反革命报复杀人犯[illegible]；
反革命流窜投机倒把犯[illegible]；
流氓杀人犯[illegible]；
流氓杀人犯[illegible]；
流氓杀人犯[illegible]；
杀人犯[illegible]；
杀人犯[illegible]；
杀人犯[illegible]；
杀人犯[illegible]；
杀人犯[illegible]；
奸污上山下乡女知识青年犯[illegible]；
拦路强奸抢劫犯[illegible]。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王申酉等人死刑的通告(局部)

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也自有潜规则。这就是林彪在文革中宣示的两句话：“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也就是说，在中国，真正作为指导思想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即正在执政的党的领袖的思想，在建国以后至文革期间，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中，党的领袖的思想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且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与发展权，都仅属于党的最高领导。因此，在任何时候，都要99%地学习最高领导的著作或论述，100%地执行最高领导的指示，实践最高领导的思想。做到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没有做到，或者还要质疑，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以这样的实际发生作用的潜规则来看，王申酉那么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读了两遍《资本论》，本身就是大逆不道。在批斗会上人们质问王申酉：“毛主席著作和规定的六本马列著作你为什么不看，要去看《资本论》?”还给他戴上一顶大帽子：“王申酉学习马列著作是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复辟的规律和理论”，[注20]依据的就是这样的潜规则。王申酉犯的是三重罪：一是越过党的最高领导的小册子，直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于党的最高领导的自己的理解；三是还要批判党的最高领导曲解了马克思主义，这就真的罪不可赦了。这也是一个警示：在宣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是不给有独立见解、具有批判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容身之地的。

王申酉被枪杀，另一个令人震惊之处，是他死在1977年4月，即四人帮打倒以后，王申酉和全国人民“心中产生了希望”[注21]的时候。正像在王申酉被枪杀以后，有机会读到他的《供词》的一些理论界人士所说的，“他所提出的看法和主张，正是现在我们的看法和主张，正是我们已经开始实行或尚待实行的政策”。[注22]也就是说，历史转折刚刚开始，它的先驱者却成为第一个受难者。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起因是1977年初，中央传来指示：“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凡是恶毒攻击……必须严厉镇压决不手软。对极少数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根子就在“阶级斗争”思维与路线；王申酉案，是由上海师大党委上报，普陀区法院党组、公安局分党委联席会议判决死刑，上海市法院党组批准，上海市委常委讨论核定——整个过程都是党的组织决定，法院执行；最初判决的是“死缓”，但高级法院党

组书记怕上级批评自己“右倾”而改为“死刑，立即执行”注23——所谓党的决定其实就是第一把手决定，考虑的又是上级的意志，在党的意志面前，个人的生命（或生或死）是微不足道的。可见，决定王申酉命运的，是整个体制，只要仍然坚持阶级斗争，有“恶毒攻击罪”，坚持党大于法，坚持党的意志高于人的生命价值，王申酉这样的冤案就不可避免。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金凤在1981年写完了《血写的嘱托——王申酉和他的〈供词〉》的长篇报道以后提出：“假如他今天还活着……”注24现在是2015年，又过去了34年，我们要追问的，也还是这个问题。

应该说，从1977年王申酉这样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被枪杀，到现在近四十年，王申酉当年批判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四大问题，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一直被置于中心位置，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空想社会主义”被彻底摒弃，王申酉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某些规律”，如商品交换、货币经济、利润、价值规律等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与发挥；王申酉深感忧虑的闭关自守的局面被完全打破，中国融入了世界市场，并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精神上与世隔绝的时代也已经结束，思想文化向世界开放与吸取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可以说，王申酉的主要诉求已经得到基本实现，王申酉期待的历史结论已经作出：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的批判者；他当年的“罪名”确如他所料，都成了他的历史功绩：王申酉无愧于改革开放时代的先驱者。王申酉如果地下有知，他应该感到欣慰。

但也有王申酉预想不到的另一方面的发展：经济发展变成“经济决定一切”、“发展就是一切”，在这样的新形式的“唯生产力论”的影响下，生产分配的公平性被严重忽略，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就导致第二个方面更为严重的问题。

当初王申酉们“深入地研究和考察（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固有规律和矛盾，尽可能地充分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并减轻它的祸害，缩短它的寿命，限制它的一切破坏作用，创造一切条件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注25的设想，同样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只谈发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而根本无视“它的祸害”，更不用说“限制它的破坏作用”，结果就发展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实际是“权贵资本主义”，并造成了两大后果。一是出现两极分化：一方面形成权贵资本阶层，权力与资本的结合，造成掌握了不受限制与监督的权力的党的肌体的积重难返的全面腐败；另一面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权利全面受损，形成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新的贫困阶层，王申酉最为痛心的“苦的永远是劳动人民”注26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变，甚至变本加厉了。其实，当年他就已经提出过警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借助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性质，采取各种措施不使生产者与管理者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由于分工而造成的差别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的那种尖锐的阶级对立，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问题”，注27而现在不幸而言中，“尖锐的阶级对立”的重新出现，正是说明王申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最为重视的“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性质”出了问题。

权贵资本主义带来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思想的腐朽方面的全面泛滥。拜金主义盛行，物质欲望就是一切，中国迅速从“精神至上”发展为“物质至上”：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歪曲。同时出现的是极端利己主义，实利主义，以及实用主义，不择手段地获取个人物质利益，任意越过道德底线，中国出现了全面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这样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泛滥，是与对资本主义所积淀的人类普世价值的拒绝同时发生的，又与封建主义的“权力就是一切”的专制主义，社会主义的高度集权结合在一切，结果就形成了“最坏的资本主义”与“最坏的社会主义”的恶性嫁接。

这就必然导致当年王申酉就深恶痛绝的“最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依然存在，而且有恶性的发展。王申酉曾经谈到，像他这样的“青年毛泽东的崇拜者”最感困惑的是，“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地与禁锢着他的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为我们这一代青年戴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注28

而今天的青年，尽管生活在全球化的开放时代，却依然受到“更严厉的精神桎梏”。如前文提到的对资本主义文化中所积淀的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的拒绝，王申酉多次表示无法忍受的对人民，特别是不同意见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的“最严密的监视”，人民“失去最小的思想、言论、行动自由”的状况，越演越烈[注29]等等。

以上四个方面：“经济决定一切”，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改革严重滞后；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者利益受损，形成新的两极分化；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泛滥；更为严厉的精神桎梏：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原则的新的扭曲和背离，也是和王申酉的理想相背离的。他如果活到现在，也一定会和他当年批判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四大问题一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里讨论的四大新问题和其他问题，做出他的批判。

王申酉“如果活到今天……”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今天中国的命运”问题。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王申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奉者，还是有的，对马克思主义怀有尊重与理解的，更是大有人在。但必须承认，他们的处境是空前艰难的。在我看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需要应对的是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虚无主义思潮。本来，接受各种不同思想理论的批判与挑战，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问题是今天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不是学理的，而是出于一种敌意，是情绪化的发泄，但却受到相当部分因为对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感而归罪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普通群众的支持。因此，今天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很难被理解，会遭遇孤独的命运。

其次，是执政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将其置于不可批评的地位，这其实是从一个根本方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全发展的，是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取的。他们依然如王申酉批评的那样，坚持领导人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发展权。这样，今天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逃脱不了王申酉那样的成为“思想犯”的命运。

其三，当今中国出现了一批“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依然如王申酉批评的那样，根本不读或很少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以研读、阐释党的最高领导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为己任，不过是“宣传”与“做戏”而已。更重要的是，也是和王申酉这样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不是一种信念与信仰，而是可以谋求个人利益的工具。不管口头上喊得如何响亮，他们和理想主义是不相干、不相容的，最多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的恐怕还是低俗的利己主义的庸俗之辈。但他们却掌握着宣传大权，经常以“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的名义，围剿王申酉这样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横加罪名，置之于死地，一如当年王申酉的批判者。

最后，还有一个自身如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有过一个经典的论述：“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的革命性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批判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最根本的品质，就是坚持彻底的批判性。而在我看来，批判是否彻底，是真批判还是假批判，就要看在批判外部世界的同时，是否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自身，确认马克思主义也并非“绝对”与“唯一”，而且是需要在不断质疑与批判中发展的。因此，我最感兴趣的是，王申酉如果活到今天，他在随着中国走出封闭状态，有机会接触到更广泛的世界文化以后，对他当年所作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人类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的论断[注30]，是否会有所修正？当然，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王申酉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大大变化了的新的世界与中国的现实，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将在自我批判与发展的开放格局中获得新的活力，这或许是可以期待的。■

注释：本文注释详见本刊网站。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丁　东）

谁举荐的朱厚泽

○ 郑仲兵

1985年7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朱厚泽为中宣部部长，1987年1月28日离任。

朱厚泽主政中宣部只一年六个月。但是他留下的口碑，超过到现在为止除胡耀邦以外的所有中宣部长，他的“三宽部长”美名，可与胡耀邦的“思想建设部”、“思想解放部”部长媲美。

是谁举荐朱厚泽任中宣部长？

一、众说纷纭

有说是邓力群，有说是宋任穷，有说是乔石，有说是习仲勋；还有说是胡启立，是李锐，是胡耀邦。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问过朱厚泽，他也说不出来。现将有关情况，并朱厚泽和他们曾经的关系，简述如下。

1.邓力群的说法

在朱厚泽任中宣部长期间，我一直认为让朱厚泽任中宣部长的最先提议和举荐者是邓力群。我记得很清楚，在朱上任不久，邓力群曾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说，朱厚泽是他“发现”的，并加意赞扬朱厚泽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的两篇论文。一篇是1981年在中央党校写的毕业论文《怎样培养新一代接班人》，1983年他代表贵州省委在遵义开的中央党校哲学年会上的讲话《培养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新一代领导干部》，就是在这篇论文基础上修订的。另一篇是1984年在贵州省委全会上的讲话《统一认识，自觉推进全面改革的发展》。朱厚泽根据贵州的社会历史特点和自然条件，提出“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思路。当时，我对邓力群用“发现”一词非常在意，心想：被他发现的会是好文章？

据我所知，朱厚泽和邓力群本是南辕北辙，素昧平生。1985年4月23日至6月8日，邓力群赴四川、贵州、湖北三省考察，在贵阳才初次与已是省委书记的朱厚泽接触。邓力群后来回忆说：“这个人反右时(郑按：应是四清时)受过打击，但没有因此消沉，而是读了许多书。当时对他的印象不错。”(《十二个春秋》352页)关于邓力群说他推荐朱厚泽当中宣部长，我还接触过两个线索：一是朱厚泽和我说过，1985年7月下旬他到北戴河参加中央会议的当天下午4时，邓力群在下榻楼里约见他，并和他共进晚餐，邓力群虽然也讲了些中宣部的情况，但主要是在说他的好话，特别赞扬了他的两篇论文，并向他表露是自己推荐他当中宣部长的。还有一个是，当年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工作、代理过朱厚泽秘书的孙方明，在纪念朱厚泽逝世一周年写的《忆睿智宽厚长者》中也提到，1985年秋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期间，邓力群也曾对他说：“朱厚泽到中央工作是我推荐的。”

2.宋任穷的提名

但是，后来邓力群的口气变了。他在2005年出版的《十二个春秋》中就说是宋任穷提名的。书中写道：“大概从四川、贵州回来以后，我正式向胡耀邦、胡启立提出自己不想当宣传部长了。他们也乐得我不当，故而答应得非常爽快，说积极物色人选。用了一个月时间，先是宋任穷提了一个名单，选了几个对象，偏重于朱厚泽。胡启立又专门到贵州去做了一些调查。回来后就确定了，由朱厚泽接任中宣部长。”

这里，邓力群是有意掩盖了因“清污”而名声扫地的事实，强调自己是主动提出让位，而且把中央物色新的中宣部长和宋任穷考察朱厚泽的时间故意放晚，但所说宋任穷提名朱厚泽的情况基本属实。

事实是，1985年5月，仍为中央分管组织和干部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宋任穷，为了选择新的中

宣部长到了贵州，邀请时任贵州省委书记（一把手）的朱厚泽——他的重点考察对象，一起去安顺、遵义等地考察，一边看一边谈话。这次考察后中宣部长的人选基本上就锁定为朱厚泽了。但宋任穷为什么提朱厚泽，或是谁向他推荐的？仍然待考。在此顺便一表宋朱过从的历史情况：

一是，说来也巧了，宋任穷在1950年代初期任中共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曾到贵州考察工业并到了贵阳烟厂；当年才二十出头的朱厚泽是贵阳市烟草公司的党委书记、经理，是他接待并陪同了宋任穷。

朱厚泽

二是，约三十年后，1982年底，贵州省委选定朱厚泽进常委会并报中央，又是宋任穷代表中央给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打电话。宋问：朱厚泽任省委书记行不行？池答：行。又问：把他位子往前挪一挪名列第二行不行？池是个明智又开明的老同志，明白中央有意让朱过渡接班，实现新老交替，便回答：当然可以，还可以把他排在我的前面。（参看刘学洙《我眼中的朱厚泽》上，《贵阳文史》2008年第6期。朱厚泽在回忆池必卿时，也和我说过这段往事。）

对于罕有到领导家造访的朱厚泽，到京不久还登门拜访了宋任穷。朱厚泽对我回忆说："因为到贵州时（按指1985年宋到贵州）我陪着他看，看了之后我说，有些情况将来再给你汇报。所以到京之后就到他家里去汇报。"朱厚泽说："从年轻时开始，他在我们心目中就是老爷子，很大的老爷子嘛。他对我们这些小家伙是既亲切又随便的。他刚吃了晚饭。他有个习惯，晚上要弄一盆热水烫脚，当时他一边招呼人打水烫脚，一边和我叙谈。"我印象中，厚泽不止一次流露出对宋任穷的真切情感。

3.习仲勋乔石胡启立推荐说

我曾问朱厚泽："除了宋任穷提名外，还可能有谁？"

他回答："谁推荐我，我不知道。说由宋任穷提出来也好，由习仲勋提出来也好，这都有可能。因为他两个人当时在中央管干部嘛。但是谁出的主意，这我就不知道了，没有谁对我说过。"这里，朱厚泽用这样的语气提出习仲勋提名的可能性，应非随意之猜度。朱厚泽到中宣部一年之后，8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朱厚泽"三宽"讲话摘要，标题是《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习仲勋看后，极为赞赏，即邀朱厚泽到他住所（当时他们都在北戴河办公）吃西瓜，还让夫人齐心将当日报纸送给邓小平看。可以看出习仲勋对厚泽的器重和欣赏。

我又对厚泽说："听吴明瑜（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是厚泽和我的好朋友）讲，可能是乔石提的名，当时乔石还在中组部长任内。"

厚泽听后笑道："吴明瑜曾告诉我一个传说：有人攻击胡耀邦拉团派，还拿朱厚泽做例子。因为我原来做过青年团工作嘛，不过那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还是冯文彬。当时乔石就说：朱厚泽怎么是胡耀邦拉的团派呢？朱厚泽是我建议来做中宣部长的嘛。"

厚泽还说，之前他和乔石没有多少接触，只是到京汇报贵州班子时，乔石在场。我说："1985年8月19日你正式到中宣部报到、亮相，恰是乔石代表中央书记处送你去的，而且还讲了话。虽然当时他的身份已是中央政法委书记了。这不也说明你任中宣部长似乎和他有什么特别关系吗？"朱厚泽只是笑笑，没有再作解释。我还知道，1986年秋，中央有权威人士对厚泽的"三宽"讲话有非议，是乔石提醒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下去了"。朱厚泽非常感激乔石对他的关照和爱护。

至于胡启立推荐朱厚泽之说，就更不鲜见了。1982年开十二大时，朱厚泽和胡启立就有了

接触。

1984年胡启立随耀邦到贵州，他和厚泽接触交谈就更多了。特别是胡启立继习仲勋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后，对厚泽的思想倾向和工作能力自然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朱厚泽自己也说，在他任中宣部长之前，和中央领导人接触最多，谈得最多的当属胡启立。

1985年6月上旬中央书记处会议基本确定朱厚泽任新中宣部长后，派胡启立于6月26日赴贵州找朱厚泽谈话落实。朱厚泽曾和我谈起那段情节。

胡："中央要让你做宣传部长，我们将来要共事，我得先来找你聊一聊呀。"

朱："你们从历史上数一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哪有像我这样的人当中宣部长啊？要么是老革命，经验丰富，老资格的，要么是学问很高的。"

胡："你怎么这样看问题呢？现在新老交替，老同志要退下去，年龄大的要退下来，这是自然规律。另外，中宣部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部门，不能光叫搞意识形态的人来当，不能光是从原来写文章、搞理论、管报纸刊物这样人当中来选择，要找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才行。"

朱："这样的人有的嘛，任仲夷同志不是现成的摆在那里，他是老革命，非常有经验，而且思想理论水平又那么高，那不是很好吗？"

胡："任仲夷同志年岁大了嘛，你又不是不知道。"

朱："年纪轻的也有嘛，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就很合适。"

胡启立不说话，朱厚泽不知其故。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有人要倒胡耀邦，就借晋江假药案来整肃项南，陈云已批示以中纪委的名义处分项南。胡启立知道情况，只不便向朱说出。

最后，朱厚泽恳请胡启立向中央报告自己难就此任的意见。

胡启立表示："我一定按你的原话向中央报告，但你要做好准备，你跑不掉，已经定了，就这样。"

"那么，你来兼部长，我来当副部长。"朱厚泽接茬道。

"副部长还跑到这里来找你！"胡启立坚决地回绝道。

1985年7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下文免去邓力群中宣部长职务，任命朱厚泽任中宣部长。

二、任中宣部长前的朱厚泽与胡耀邦

朱厚泽多次说道："我当中宣部长，从一开始到耀邦去世，从来没有听耀邦说过是他提的名。"但事实证明，胡耀邦是一直看重朱厚泽的，认为这个中宣部长是选对了的。因此不管是不是胡耀邦点的将，人们有理由认为：朱厚泽接替邓力群任中宣部长，反映了胡耀邦的意志。

1.李锐推荐朱厚泽

公开明确说自己推荐朱厚泽任中宣部长的，李锐当属第一人。在朱厚泽病重期间，有一次李锐老和我说，是他向胡耀邦推荐朱厚泽当中宣部长的。他说，在这之前他没向任何人透露过。

李锐在厚泽去世的当天，在他写的悼文《铁肩道义更忧先》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同厚泽相识，是1982年3月，到中组部建青干局时，他正在中央党校青年干部班学习。我的二姐李英华(已去世)当时是在这个班任实际负责的副主任，她同我谈到朱厚泽是班上最优秀的，排第一位。厚泽是贵州人，抗战后期，二姐曾在贵州地下党长期'隐蔽'过，很了解贵州情况。同厚泽有了来往，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曾下放十多年，吃苦不少。但借此时机，他读了许多书，尤其自学了自然科学，深深认识到没有科学知识办不好事……正是一致的观点，使我们很快成为至交。1982年下半年，我曾请耀邦同志到这个班讲过两次话，他认识了许多学员，也认识了厚泽。他对厚泽还说过这样的话：事情都有两重性，十多年不工作，是荒废了，但是意志的锻炼，思想的开放，也是丰收的十年。"

李锐说："十二大后，厚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贵州担任过二把手和一把手。耀邦到贵州广泛考察时，大讲经济开放，要藏富于民。于是厚泽在《贵州日报》上，用整版篇幅连续宣传耀邦这一主张。由于曾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过，我是一直关心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和邓力群长期掌管意识形态，影响改革开放，我是很不安的。于是向耀邦推荐厚泽担任中宣部长，耀邦早就看重这个人才。"

李锐所言，当然可信，1984年正值李锐在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任上。

2.“第一次没有见面的接触”

朱厚泽和胡耀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与朱厚泽平反复出有关。

1978年冬，朱厚泽与伍嘉谟（原贵阳市委第一书记、省委常委）、夏页文（原贵阳市委第二书记、负责常务工作）到北京找中组部，要求解决贵州四清冤案。当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他们没有找到中组部长胡耀邦，找到原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希望帮助解决平反和工作问题。李井泉经历了文革的生聚教训，对他们非常理解。谈话间，就给胡耀邦打了电话，报告了朱厚泽等人反映的问题。耀邦对贵州四清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对四清的错误及给干部带来的冤案是心中有数的。因为他本人四清期间在陕西就曾遭整肃。耀邦让李井泉转告朱厚泽等人不要着急，说会议结束后通通解决。李井泉还向耀邦建议：因四清时，曾派了两千人到贵州夺权，这些人后来大部还留在贵州。为了避免隔阂，是否考虑把四清中被整肃调出贵州的干部安排工作。耀邦表示可以考虑。于是，李井泉择日把贵州省委书记马力叫到家里。厚泽等人把情况汇报后，李井泉讲了自己的意见，又转达了耀邦的意见。马力完全改变了之前拖着不办的态度，不仅表示要解决问题，而且还提出让大部分人回贵州。1979年春节后，厚泽回到了贵州，恢复了党籍，安排了工作，任市委秘书长，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这件事实属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方针、举措的落实。朱厚泽称这是他和胡耀邦“第一次没有见面的接触”。

3.在青干班和十二大

1981年冬至1982年夏，朱厚泽到中央党校第二期中青班学习。当时，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正在考虑干部新老交替的问题，所以对中青班尤为关注。耀邦两次在中南海给他们做报告，而且把他们叫到中南海和玉泉山进行个别谈话。朱厚泽回忆说：谈话时，耀邦没有讲什么话，主要是问家庭情况、个人经历，以及对一些问题，特别是形势和改革开放问题的看法。朱厚泽当时对胡耀邦的看法是：“这个人非常真诚、非常热情，下级可以和他讨论问题，能够与青年人交换意见，没有传统领导干部的那种架子。思想解放，很多问题看得很开，大家与他谈话没有什么顾虑。”

1982年夏，朱厚泽被贵州省推举为党代表，参加中共十二大，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朱厚泽参加了由胡耀邦组织的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与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邓颖超以及老帅们的见面会。胡耀邦把这些年轻人一一介绍给老同志。回省后，12月底，中央通知朱厚泽任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名列第一书记池必卿之后。

4.耀邦几次视察西南

朱厚泽说：“与胡耀邦真正接触得多，是耀邦到西南视察，包括耀邦到贵州和我到云南。”这都是1983年以后的事。

1984年元旦，耀邦发着高烧，冒着风雪驱车来到贵阳。1月8日之前，厚泽和池必卿一直陪同胡耀邦，也使他们有了更多近距离的接触。

在贵州期间，耀邦约来西南各省市主要负责人到贵阳共商四省五方（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开发、发展、协作大计。1月4日，在发展战略讨论会上，耀邦问：“像你们贵州这样，能源这么丰富，有色、黑色金属资源这么丰富，全国有哪些地方可以比？”没有人起来回答。朱厚泽见状，从容不迫地回答道：“贵州的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金属匹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耀邦听后高兴地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面。要提请中央注意这个特点。”

1月5日，耀邦同志在会上提出要把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开发提到全国战略高度。朱厚泽有一段插话：

“青藏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云贵川处在它们的中间阶梯。云贵川对平原是能源资源的支撑。再往上阶梯开发，云贵川又是立足点。把这个中间阶梯放在战略要点上，非常重要。从生态讲，也要抓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保护。最近二三十年，长江总流量下降近一半。干流、支流都要开发，应先开发支流。干流开发了，而支流生态没有解决，不能保护干流。先开发支流，资金也可以少些。要从支撑华东、中南着眼考虑云贵

川问题。”厚泽把这个观点概括为“治理支流，屏障干流，开发支流，促进干流”。

厚泽话音一落，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表示赞同，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也发表了相同的观点。耀邦当即予以肯定。

以上内容是贵州日报社社长刘学洙的现场记录，他在回忆文章《我眼中的朱厚泽》中赞叹道：“朱厚泽真是一个想大问题、出大思想的人！”这也应是耀邦和中央一些同志看重他，选择他当中宣部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1月7日下午，胡耀邦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讲话。耀邦提出：“党的一切政策归根到底都是富民政策。”朱厚泽后来回忆说：“耀邦同志响亮地提出：什么是我们的总政策？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富民政策’。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否尽快地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是党内评论是非一条重要标准。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不要老害‘红眼病’。”

胡耀邦在那天干部大会上，冲着朱厚泽说道：“你吃苦头了，朱厚泽四清吃苦头了。”特别讲了四清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1月9日，厚泽和池必卿把耀邦从铜仁送到湖南凤凰岭。接着贵州省委立即召开电话会议，朱厚泽代表省委，按照耀邦讲话的精神，重新布置工作，并把耀邦讲话精神传达到各级党委。强调要坚持胡耀邦提出的“富民政策”，全心全意使人民群众尽快富裕起来。1月15日，《贵州日报》详细报导了厚泽讲话的内容，其中许多话就是耀邦的原话。从厚泽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和耀邦的心心相印，与之后胡乔木、邓力群对耀邦“富民政策”的抨击，形成鲜明对比。

1985年春节期间，胡耀邦又一次到云南考察，讨论云南工作，朱厚泽和云南周边各省领导也被邀参加。2月24日，耀邦在云南省干部会上讲话，当讲到新老交替问题时，突然点了厚泽的名字。耀邦说：贵州省下一步的工作，由朱厚泽主持。并让朱厚泽站起来。厚泽只好站起来，向会上的云南各级干部鞠躬致意。厚泽后来向我讲这段往事时还笑道：“所以云南人知道我要在贵州主持工作比贵州人还要早。”耀邦此举不难让人看出他对厚泽的器重和钟爱。

三、朱厚泽个人条件和素质

总之，朱厚泽当中宣部长究竟是谁的举荐似难以结论。但可以看出，朱厚泽在当时可以算是领导层普遍可以接受的人，大家普遍地看好他，这自然与他个人的条件和素质有关。

第一，他有年龄优势，是所谓“年轻的老干部”，解放前就参加共产党，领导过学生运动，50出头已就任省委第一把手。

第二，他不仅能写能说，有较高理论和知识素养，有驾驭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工作的能力，而且他有很强的实际工作、行政管理工作的能力，从基层经济工作开始，做过厂长、经理、党委书记、工业管理局长、经济委员会主任、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直至省委书记，这些条件和素养，完全符合干部新老交替的条件，符合中央在新时期选任中宣部长的要求。

第三，他不仅能力和见识过人，而且为人宽厚、谦恭、严谨、踏实、清正、朴实、勤奋、好学，和他接触过的中央领导，对他都会有好感，加上他在四清中因正确主张受到极左势力的整肃之后并没有颓废，而且利用这个机会读了大量书，包括大量自然科学的书，深入了解了许多社会和民间情况和问题。因此，更增添了人们对他的同情和尊重。

1985年7月上旬，朱厚泽在贵州就接到中央任命中宣部长的通知。不日，新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到任，朱厚泽用自己的方式和他进行交接——和他沿贵州省界线贫困山区转，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下面汇报、一边议论，帮助他了解情况。还没有转完，走了十几个县，即接中央电话，让他速去北京，参加北戴河会议。从此朱厚泽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求学于斯、工作于斯、遭难于斯五十年的贵州。命运又一次让他到北京——这个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去扮演一个悲剧角色。■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

（责任编辑　冯立三）

1965年胡耀邦《电话通讯》产生前后

○ 白 磊

胡耀邦1965年2月赴陕南安康等七个县调研，针对当时的社教运动，起草《电话通讯》，提出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受到全省欢迎。我的外公白瑞生时任陕西省委副秘书长，陪同胡耀邦调研，经历了此事的全过程。现根据外公晚年的回忆、当时的笔记和相关资料，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作一梳理。

胡耀邦赴陕背景

文革后主持陕西工作的王任重曾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陕西省“左”的程度和恶果超过全国其他省份。1964年，陕西省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开除公职的干部和教师1450余人，开除党籍的党员3200余人，是1949年以来开除党员党籍最多的一年。西北局主要负责人亲自坐镇指挥陕西省长安县社教工作点，抽调中央局、省委、市委三级干部16400余名，发动群众清查漏划地主、富农，深挖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夺权斗争。在随后开展的四清运动中，号召基层干部坦白、检举、揭发，通过清理账目、财务、粮食及进行外调，清查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及其他违法乱纪行为，对四不清干部，发动群众反复批判、斗争，责令退赔，根据坦白和退赔情况，定性处理，在此基础之上，整顿领导班子。长安县社教工作团还独创了“围攻根子”的做法，即把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放在群众中揭发和批斗，揭发不出问题又经得起批斗考验的，才能成为可以依靠的“根子”。1964年第4季度，长安县区级干部受处分的占45%，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则占到76.2%，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共清查出应退赔现金813万元，平均每个农村基层干部应退赔183元，比陕西省当年人均国民收入122元还多出61元。三个社教试点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

陕西省委成立了“思想战线指挥部”，下设“清理反党党史小组”、“文艺批判小组”和理论学习班，清查所有关于中共党史和陕西党史的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和相关文艺作品，批判本地“毒草”作品和其作者，如长诗《刘志丹》、电影《桃花扇》、戏剧《游西湖》、《赵氏孤儿》、《卧虎镇》、《破宁国》以及反党画、反党歌曲等。全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戏曲剧院院长马健翎在批判中自杀身亡，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分会主席柯仲平在受到清查时猝死。著名画家石鲁被整肃得精神失常。党政机关内部的政治空气也愈发紧张。西北局发出党政干部的十条规定，要求党政干部清查阶级成分和阶级立场，清理住在党政机关的干部家属中的地、富、反、坏分子，将他们遣返回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陕西省委某些领导人在1964年冬季对所有省委机关干部进行清查排队，结果为省级各部、委、厅、局和各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班子烂了和有严重问题的占干部总数的46%，后再次清查排队，比例上升到60%以上。

1950年代，陕西省的生产建设在全国属于中间偏上，而八届十中全会后，由于比其他省更“左”，恢复“大跃进”创伤进展缓慢。

1964年11月，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重，中央委任胡耀邦代理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北局第二书记。11月30日，胡耀邦由北京抵达西安，12月14日返京参加全国人大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他走马到职13天期间，除了参加了4天的西北局社教工作汇报会，其余的全部时间，分别同省委书记处同志、省级各部委厅局负责同志和四个地委书记交谈情况，交换意见，另外，他还

派了两名助手到临潼行者公社两个生产大队摸情况，目的是同湖南和河北两省的基层工作情况做对比，搞清楚“陕西的农业生产为什么上不去”。

12月3日，胡耀邦第一次主持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陕西农业上不去的原因时，他讲了几点看法：(1)陕西省在“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刮得不大，生产受到的破坏比较小，但是，农田基本建设也上得不快，在三年调整时期，工业下马过了头，特别是基础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以至于经济恢复的物质条件不如其他先进省份。(2)主观原因，领导生产因循保守，小手小脚。“有一股保守势力，压制新鲜事物”“陕西的公购粮负担过重，你们陕西人老实，不会向中央叫喊”；(3)“社教”问题，捕人多了一些，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多了一些，面上夺权斗争打击面宽了一些。在这次省委书记处会议的讨论中，胡耀邦提议陕西省委和省人委要做出以下几项规定：(1)捕人暂停，但要继续打击现行破坏活动和清理积案。(2)双开暂停，待到运动后期处理。(3)面上夺权暂停，等重新部署后再行动。(4)省、地、县三级干部下到农村基层，参加生产，领导生产。(5)向国务院申请，将1965年陕西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少为14亿斤。(6)向国务院申请，在陕西建设第一批年产7.5万吨的小化肥厂五个。(7)向国务院主管部门申请，1965年为陕西增拨3万吨化肥。会后，胡耀邦提出的前四条很快就实行，后三条也很快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陕西广大干部和农民普遍支持，他们把解放干部、减少公购粮、增加化肥和派出大批干部下乡称为“四喜临门”。

陕南调研

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1965年春节后，书记处书记都下到农村基层，参加地、县多级干部会议，宣讲和落实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根据分工，胡耀邦去陕南。

1965年2月6日，是农历正月初五，胡耀邦与省委副秘书长白瑞生、省公安厅警卫处长艾蕴药及省委办公厅速记员郭步越分乘两辆吉普车，赴陕南调研。

之前胡耀邦在省民政厅的报告中看到，1964年陕西省夏季成灾地区的人口有1059万人，秋季成灾地区的人口有745万人，灾情较为严重的县有33个，其中以安康、宝鸡、商洛三个专区的部分县比较严重。安康灾区每人每月平均口粮在20斤以下的共有132万人，占全区人口的73%，部分灾区已经发生缺粮、断炊、外流、乞讨、浮肿和病饿死亡等现象。据安康专区1964年12月20日统计，断粮人口达到36000多人，安康县有浮肿、干瘦病人120多人。紫阳、安康、汉阴三县还发生自杀、病饿死亡事件11起，平利县西河公社在11月下旬至12月下旬的一个月，因生活困难发生自杀事件5起。人命关天，胡耀邦下乡调研的第一站就选在安康地区。

2月7日下午，胡耀邦一行抵达宁陕县，时任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也赶来宁陕，陪同调研。车子翻过秦岭时。胡耀邦盯着延绵起伏的群山若有所思，当天晚饭后，在宁陕县、部、局长会议上，他提出第一要抓粮食，第二要抓山货土特产。并在汇报中多次插话，讲“林业和农业要分开”，“宁陕要大力发展林业，国家缺乏的是木材，不是缺粮食”。指示当地有关部门“做个统计，把山货和林业加起来，这个收入肯定会大大超过农业生产的。”他还批评当地商业工作不懂得政策，压价压级，使得山货土特产、药材收不上来。

2月7日上午，胡耀邦抵达石泉县，下午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谈了学习“二十三条”的问题，当晚驱车赶到汉阴县。2月8日上午，在汉阴县委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讲到学习“二十三条”，要共同肯定“社教”成绩，共同克服缺点，不要说你是错误的我是正确的，意为勿独断专行，要听得进去不同意见。下午乘车赴安康，未进城，换乘小轮船顺汉江而下到了旬阳县，当晚在旬阳县委扩大会议上，胡耀邦提出了“两手抓，双丰收”的农业生产方针，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2月9日晚，胡耀邦抵达白河县，第二天上午在县级党员干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你们在两三年里已经洗过四次澡了，在此次五级干部会上，对一般问题可以不洗了。下午启程去平利县，2月11日上午抵达平利县，胡耀邦一行在县城关农村视察，下午在平利县委扩大会议上讲了

1965年3月2日，胡耀邦在陕西省做报告

学习贯彻“二十三条”，搞好生产，晚上驱车到安康。12日上午在安康县委扩大会议上同干部座谈，下午在安康专区机关17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提出“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开一些，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在经济政策方面搞得更活一些”。13日上午，胡耀邦在安康专区和安康县机关干部大会上讲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形势，下午在安康四级干部大会上讲学习贯彻“二十三条”及搞好生产。

据外公回忆，胡耀邦在陕西工作期间，经常讲“干部就要干，战士就要战”。而他自己正是一个实干家和改革者。他工作很勤奋，每天早晨6点起床，晚上12点休息，中午不午休，跟着他下乡，极少有休息的时间，每到一处，不是先休息、先吃饭，而是先谈工作，了解情况。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当机立断，说了就干，要干就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讲求实效。

在陕南安康的调研过程中，胡耀邦8天走了7个县，他不仅对社教运动“左”的方法和后果认识更为深刻，而且对生产凋敝、经济萧条、民生困苦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在同县、社两级干部座谈时，它开门见山提出问题，征求意见，一个一个问题排队，一件一件事情解决。对于一些明显抓错了的人和处理错误的案件，胡耀邦说：要开一个省、地、县、社四级书记会议，四级都认为搞错的，立即纠正，立刻放人，这样做似乎不太符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但原先那些案件都没经过必要的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而且很多没有定案，采取果断的手法纠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处理的冤案、错案，有什么不可以呢？

《电话通讯》的产生

2月13日吃过晚饭后，胡耀邦推掉了安康地委和专署的所有安排，在驻地院子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散步思考。他找来白瑞生，说要起草个文件。白瑞生按照一般的公文格式起草好后，拿给胡耀邦审阅。他觉得文字较平淡，未能达到预想，于是由他口述，白瑞生记录，记录完后，白与速记员郭步越核对过文字，交付胡耀邦再审阅，胡找来了几位随行的干部征询意见。大家表示无意见，胡耀邦签字，写下“1965年2月14日2时于安康”。《电话通讯》当天由白瑞生打电话给陕西省委办公厅，由办公厅会议科科长杨庚泉记录，再逐字逐句核对，确认无误，征求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意见和建议，由陕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室印发。这份《电话通讯》全文如下：

守一、基平、克伦、章泽、舒同、启明、肖纯诸同志，省委派去各地、县参加多级干部会议的诸同志，并地委、县委诸同志：

我进入安康时，察觉一些县的负责同志，不敢认真按“二十三条”办事，缩手缩脚，顾虑重重，因此，我采用了日夜加班的办法，同韦明海等同志，在八天中走了七个县，同这些县的公社书记以上同志开座谈会，提出问题，征求意见，一个一个问题排队，一件一件事情落实。据地委同志这几天反映，多数县的领导，思想已经进一步解放，到会干部情绪逐渐高涨而活跃。

今天，听到一些专区和县开会的情况，据说有的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开得冷冷清清，讲解和议论“二十三条”时，照本宣科，不联系实际，不敢大胆解决问题。因此，到会干部情绪低，心不在焉，对省委这次工作会议决定的一些问题有所怀疑。

多县的多级干部会议都只剩下几天了。我认为现在是个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不采取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那么，今年的生产计划就要落空，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为了把会议开好，根据安康地区的经验，我认为要着重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省委和地委派到各县参加会议的同志，必须立即同县委一起，共同负责对县的社教工作做出肯定的估价，说清楚哪些问题做对了，哪些问题有缺点，并明确向大会宣布，以便统一思想。只要大多数同志同意，即使将来证明某些问题说得不尽恰当，也一概不追究责任。

（二）为了正确地贯彻“二十三条”中关于干部问题的政策，应该向到会同志明确宣布：(1)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做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2)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做结论。(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咎既往。(4)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只要我们掌握了这四条，我们就不会犯什么“左”的错误，也不会犯什么右的错误。

（三）学习和讨论“二十三条”要抓住精神实质，要明确和解决几个主要思想问题，不要咬文嚼字，不要搞烦琐哲学。要告诉大家，“二十三条”不可能一次学透，要继续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今年冬季开多级干部会议时还要学，明年还要学，要学多少年。因此. 学习和讨论到一定时候就要停下来，转到讨论今年的生产问题上去。

（四）中央减轻了我省今年的粮食征购任务，这对搞好今年的生产是一件大事。要明确告诉大家，中央之所以减轻我们的征购任务，是为了使我省农民有充裕的口粮，有充沛的干劲从事生产，并且使多种经营更好地发展起来。这个任务不会变。至于我们把工作搞好了，今年大丰收了，征购任务也不再增加，而是采取：(1)由各大队、生产队自己搞储备粮；(2)由各大队、生产队自己用来扩大发展集体的饲养业；(3)由省上考虑采取议价收购的办法收购一部分。同时，各县同志必须按省委、地委分配的征购数字，向大会宣布，并经过大会讨论后一道落实到大队，县上、公社和大队都不许再行追加。大队干部回去后，也要向群众宣布本大队的征购任务，以便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

（五）今年我省农业的增产方针应该是：“两手抓，双丰收。”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关中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陕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的发展；陕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和畜牧业。我省山地荒坡面积大过耕地几倍、十几倍，各县同志一定要用算账的办法，鼓舞大家树雄心，立大志，从今年大搞基本建设着手，为几年后从山地荒坡上大大增加收入打基础。“过一年算一年”的思想完全错误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同一些社员和基层干部在认识上可能有矛盾，他们看不远，想不深，我们一定要向他们反复地做说服教育工作。不要因为他们不积极，我们也就畏难起来。

（六）要把大会开活。开活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要选择一批增了产的典型公社、典型大队，请他们在大会上做报告，大大介绍他们的增产经验，省、地委参加会议的同志，县上的同志，都要细心地听取他们的介绍，并且大大表扬他们。还要明确宣布，他们就是当地的活“大寨”，是其他社、队学习的榜样。一切领导增产的干部，特别是在困难条件下领导增了产的干部，就是好干部，就是真正过得硬的好干部。要使大家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请报社的同志，大量报道这次各县多级干部会议上选择出来的增产典型，推广他们的经验，鼓舞广大干部的革命干劲。

（七）我们沿路看到一些城镇冷冷清清，手工业不兴旺，没有就业的人不少。不知其他各县是否存在这种情况，如果存在，必须认真加以解决。解决的主要办法是：(1)活跃集市贸易；(2)发展人力畜力的短途运输；(3)切实解决手工业的原料供应；(4)改进产业部门的经营管理。关于集市贸易问题，要明确告诉大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不可能完全代替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集市贸易。农民相互之间为买而卖的小额交易，不是什么投机倒把。农民

多余的农副产品，我们的供销社不可能全部收购回来，如果我们对集市贸易管得过死，就会影响农副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手工业也还可能萎缩，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不利的。

（八）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算大账，抓关键，向前看。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不开阔，在政治思想方面抠得过碎，在领导生产方面想得过窄。他们不是高瞻远瞩，大刀阔斧，而是顾虑重重，小手小脚。应该号召大家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放得大一些，在领导生产方面想得宽一些。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主要是：(1)不要着重历史问题，而要着重现在的表现；(2)不是着重“洗手洗澡”中已经交代出的问题，而要着重今后的问题，着重“将功补过”；(3)不是着重枝节问题，而是着重注意大的关键问题，注意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

白瑞生（前排右一）上世纪60年代与家人合影

在领导生产上想得宽一些，大体有五方面内容：(1)不仅要抓粮食，而且要抓副业和山货土特产；(2)不仅要搞好今年的生产，而且要为今后的生产大发展积极创造条件；(3)不仅要认真注意现在的经验，而且要汲取和创造新的经验；(4)不仅要注意增加生产，还要注意为生产服务的商业、交通、财政等问题；(5)不仅要有具体措施，而且要有广泛的、持久的、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总之，要引导大家努力往前奔，朝气蓬勃地去干工作。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意见。因为各县的情况不同，只能作为你们的参考。如果你们觉得和你们的情况不符，可以不传；如果你们觉得还有一些问题必须注意，就请你们补充。长安、西乡、延安三个点上的工作，请你们和社教工作团的负责同志另行研究和安排。

总之，我的意见是，各县的多级干部会议是今年增产的一个关键会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按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开好。

你们的会议情况和问题，望及时向省委书记处通气。

2月14日吃过早餐，胡耀邦一行乘车经七里沟，向汉中进发，抵达石泉县。在石泉他再次提出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宽一些，即不要着重于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弄清楚，要重在表现；不要着重于已经交代过的错误问题，要着重于今后的将功补过；不要着重于枝节问题，要看重大的关键问题，即党的政策、方针问题。他同时提到“今天省委有一个电话记录稿，接到后要很快研究一下”。就在当天，外公白瑞生接到省委通知，要求立即赶回西安，省委另指定副秘书长林牧来石泉，陪同胡耀邦继续调研。

这份《电话通讯》，是胡耀邦在陕西超前改革的小试牛刀，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产，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但在现代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阶级斗争屡屡扩大，每次运动都产生大量的冤假错案，人的思想也常常受到专制主义的禁锢，所以，解放思想、解放人就成为最关键的先决条件。胡耀邦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具有远见卓识，他在中央苏区肃反中受过伤害，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也受过批判，但他始终保持尊重个人，同情、爱护、助人而不整人的善良天性，具有无私无畏、敢作敢为的献身精神，1965年如此，1978年以后更是如此。■

（作者为陕西省政协工作人员）

（责任编辑　丁　东）

从47份救济申请表看1962年逃港风潮

○ 笑 蜀

一、逃港者概况

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引发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大规模的逃港潮。逃港潮爆发伊始，台湾“救总”即介入救援。“救总”全称中华救助总会，成立于1950年，最早叫“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以“胞爱发扬民族精神”“救济、团结反共力量”为宗旨。除了有社会救助的性质外，还负有政治宣传的使命，并解决大陆流亡人士问题。包括救济大陆逃港者、接运流亡海外的内地人到台安置。1962年4月粤、闽逃港潮发生后，台湾除了拨大米1000吨捐赠，还多次派出轮船赴港接纳偷渡者，每人发给救济金70港元，赠送服装一套。

笔者访学台湾，偶然机会，购得“大陆逃港难胞救济申请表”原件共47份。每张A4纸大小，左上角皆有铭印“港九救委会审核之章”，并有5位数的统一编号。据此可知台湾“救总”救济的大陆逃港难胞约为数万人规模。

救济申请的核准时间分两批，一批是1962年8月20日，共34份。一批是8月30日，共13份。填表时间从6月29日到7月25日不等，主要集中于7月3日（14份）和7月4日（14份）两天。据此推算，从申请到核准，大致需要一个多月时间。

47份申请表共涉56人，有3份表属于一家一表，即是举家逃亡，每家皆四口之众。56人中，男47人，女9人。年龄最大的61岁；未成年7人，年龄分别为4岁、5岁、6岁、7岁、9岁、13岁、14岁。平均约24岁，显然青壮年居多。56人中，仅1人来自福建，55人来自广东。广东之中海丰13人，惠阳7人，东莞6人，汕尾、梅县各5人，台山3人，宝安、中山、南海、罗定各2人，番禺、花县、潮州、潮阳、普宁、揭阳、阳江、博罗各1人。

从文化程度看，大专3人，高中毕业或在读者9人，其余44人都在初中程度或以下。至于职业，则包括在校学生、瓷器工人、手工业工人、医护人员、小商人、纺织工人、家庭妇女、无业人员、建筑工人、机械工人、教师及代课教师，比例最大的是农民，共9人。

政治面貌以“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居多。6人曾被劳改或劳教：3人因偷渡，1人因偷渡兼“伪保长”身份，1人因家庭历史牵连，1人因民国时期就读中央警校被判“历史反革命”获刑5年。还有1人被处10余年管制，因其民国时期就读广州警校。出身地主、富农家庭被清算者最多，共10人。家人死于狱中或自杀者亦不乏其人。

至于宗教背景，佛教最多，有5人；基督教2人；道教1人；还有2人自称信仰孔教。有宗教背景者总计10人，约占总人数的18%。

二、从逃港者经历看文革前的政治生态

这批申请表从一个侧面，折射了那个时代的人权状况尤其是政治生态。反右之后，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这场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当然需要对立面，即阶级敌人。以“地富反坏右”为主体的所谓“黑五类”应运而生。如前所述，56个逃港者中，有17人不仅属于生计意义上的难民，更属于政治难民即所谓“黑五类”群体，占比为30%，远超过后来所谓阶级敌人占总人口5%的比例。

从他们的简要回顾中，可知迫害之深。

14岁的惠阳少年李树英说自己出身地主家庭，“12岁小学毕业，考上初中，读了一年初中即

被赶回耕田”。

21岁的海丰农民叶仲纯说：“自土改后，被评为地主成分，遭受了清算斗争。追迫余粮，献金支前，已成困危状态。”

23岁的东莞教师郑易新说：“我父亲一向做生意，并有一些田产。土改时被评为工商地主。经过清算斗争，家庭经济已彻底破产。以后被管制，直到1959年硬说我父亲造谣破坏，判劳动改造二年。因老弱经不起摧残，一年后在狱中死亡。至此，我家里已到家破人亡不可收拾的境地。”

1962年的香港

21岁的广州学生陈小友说：“在家乡，是有人类以来人们所未生活过的。就广州来说，每个劳动力每月只有24.5斤米，鱼半斤，糖三市两，肥皂半件。那边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无法形容。我因父亲过去在广东省府做过省级官职而被判8年徒刑。我家庭又配所谓犯人家属称号，受歧视和虐待，生活十分困苦。”

24岁的台山学生陈自诚说：“我在广东省台山县海晏乡村出生，家庭环境向称富裕，拥有颇多田产。但被列为地主阶级，所有财产全部被夺去，而且受到诸多凌辱迫害，致骨肉分离，诚千古未有之惨烈。”

30岁的广州工人黄元良说：“家庭地主，全部破产，家散人亡。后逃亡到广州，10年来在广州附近之县做泥工建筑，挨尽了人间辛酸困苦，受尽了几许饥寒折磨，消磨了大好青春时光，得不到一点家庭温暖。”

21岁的宝安工人梁耀全说，他自幼父母双亡，跟随长姊生活。1952年长姊全家被清算没收田地，他17岁即被征做工，调赴东北做煤矿工人，“数年来眼看被折磨因病致死者数十人”。

40岁的海丰小商人苏娘意说：“我原是海丰县汕尾镇一个商人，向来生活安定。可是后来我成为一个罪人，不但财产全部被没收，我胞弟自杀，受尽折磨。在压迫之下，为求生存，全家只得走向参加劳动队伍，半饥不饱暂时维持生命。”

20岁的医务人员李连辉说：“我出身商人兼被指为恶霸地主的家庭。在我的家族中，所有的兄弟、叔伯都被划为地主恶霸。其中一位李锡(伯父)被指为中山县最大的地主(因为在中山县田地最多的是他，现在在香港)，故此我家族的人最受仇恨。本来我在学期间，向来成绩优良，自从1958年指‘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后，我便和很多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子弟一样被列入没有资格读大学之列。我便由此失学。当时父亲被指为坏人及偷渡头子之莫须有罪名入狱，狱中受尽人间最惨之折磨，出狱后不久，便死于家中。”1959年，他终于考入广东省卫生学校，毕业分配被分往偏远的海南山区。他因拒绝前往而被发落到老家种田。

29岁的海丰无业人士黄岩说：“我过去在本县警察局任办事员，汕尾警察所督察员。后来在广州警校学习，但是我在乡下以‘反革命分子’身份被管制10余年。在家乡受尽有史以来未有的虐待和迫害。”

三、从逃港者的生活看大饥荒

逃港者救济申请表有“今后志愿”一栏，此栏盖有一印：“愿否去台湾”，显然是台湾“救总”所为。此栏实际是政治表态栏。结果只有5人的表态可理解为愿意赴台，余者一般不表态，更有多达19人明确说不去，只希望留在香港找工

作。14岁的李树英表态想暂时留港读书。可见对他们吸引力最大的还是香港，台湾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则低很多。这也跟当时香港市民的普遍心态吻合，香港市民总体上一直比较轻视台湾和内地，这一心态只是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变。不过即使如此，据媒体报道，当时仍有数万人最终移民台湾，约为逃港者总数的1%，这跟我收藏的救济申请表中7人愿意赴台的比例，大致吻合。

17个政治和生计双重难民而外，其他就都是生计难民了。他们对逃港原因的陈述，是对大饥荒的控诉。

58岁的惠阳渔民钟冯喜说："在那边，没有一点好处，只有做多，吃得不饱，受尽了说不出的辛苦。"

48岁的海丰渔民吕淑用3句话概括自己逃港前的状态：食不果腹，苦不胜言，近更粮荒。

38岁的手工业工人张林说他"日吃米四两，终日工作，未得温饱"。

24岁的罗定无线电工梁民远说他"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困苦"。

18岁的惠阳高中生古汉林描述最具体："人无食，无穿，在农村中每人一个月吃几斤谷、半两糠油，一年只发一尺半的布票，市场一片混乱，到处是偷和抢。"

20岁的东莞纺织女工李全顺说："有工做，没的食。人如没的食是不能生活的，为了生命，才会偷渡的。"

20岁的惠阳农民陈永星说："那边有的做，无的食，我们饥寒交迫，一般大米和生油等等，都不能供应。"

28岁的小商人蓝英说：他在那边，每人每月只供应粮食10多斤，生油5钱，每人一年只发布票2尺1寸，不够买一条毛巾。他并用3个不自由概括他的状态："行动不自由，生产不自由，讲话不自由。"

18岁的汕尾手工业工人江振强说：他在大陆无吃饱，做手工业又无材料。总之是"无法生活"。

30岁的广州瓷器工人朱源鑫说："生活不能维持，吃穿都成问题，一人劳动，不能养活妻子小孩。从1958年大跃进以后，更惨不堪言。"

23岁的广州代课教师何鸿策说："开会的时间甚多，工薪少，每天工作做得稍有错就要受批评。加上日常生活必需品没有供给，有钱都没的买，油、粮甚少，每月只20斤粮食，长此以往，走投无路。"

22岁的东莞农民张俊杰说他在大陆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每餐三两米，半饥不饱，只好用杂粮野菜充饥，形成严重水肿病"。

61岁的袁映雪和38岁的雷天粦遭遇最为悲惨，所述也最为沉痛。袁映雪说："我一家住在东莞故乡，耕锄田园，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先人遗教，可以度日。予的儿女，达到成年。不料三反五反，田园全无，弄到摧残殆尽，两餐缺乏，以致丈夫饿毙。"

雷天粦是印尼华侨，"原本是一个有温暖家庭的人。"但因1960年印尼排华，被迫回国，安置到海南岛华侨农场工作。"因被评为思想不好，曾被公安局拘禁两次。因此我感到在农场难住，而申请回原乡。不料我在原乡的口粮每人每月只配

1962年的香港贫民区

6斤谷。"以致太太因"缺乏营养而死亡"。遗下两子一女,皆未及学龄,嗷嗷待哺。

逃港难胞虽如前述以一般底层居多,但也不乏主流社会人士。笔者曾把逃港者李连辉的申请表拍成照片上传微信朋友圈,即引出中山大学一位校友的惊呼。她中学就读于中山纪念中学,那是广东名校。李连辉居然是她学长,早年也毕业于中山纪念中学。照片上的李连辉,大分头,白衬衣,看上去文静秀气,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难胞杨维汉就读的厦门集美中学,则是福建名校,毕业后一度做代课老师。照片上不仅大分头,而且西装笔挺,当年极罕见。难胞徐庆春,更曾在四川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受训,结业后到驻陕西65军187师炮兵连任观测员。服役期满转业到广州做机械工人,仍属于当时的"领导阶级"。但连他们都自身不保,"零落成泥碾作尘",那个时代何等滚滚洪流,就不难想见了。

四、曲折逃港路

最后一个问题:他们是怎么逃往香港的?

他们都属于"六二逃港潮"的一部分。时间约在1962年5月5日到22日。分陆路和水路两种途径。56人中,有24人走陆路,其余的走水路。

少年李树英只身出逃:"由惠阳经过淡水、横岗、深圳、莲塘,在莲塘冲过英界,在山上躲了两天,由当地的人把我带到九龙城。"

知识分子李连辉一路坎坷:"5月20日偕同同乡8人,一齐沿广九铁路步行,至5月22日晚到达深圳,即晚越境,曾两度被捉,第三次才侥幸越界。25日到达上水镇,26日由亲人接到九龙。本次同行8人越境,7人被捉回,只我1人到此。"

福建人杨维汉和广州代课教师何鸿策,都屡败屡战历尽坎坷。何鸿策"几次越境失败,最后在4月18日成功"。杨维汉则4次入粉岭集中营,"最后一次即5月21日才终于到达九龙"。

61岁的袁映雪,也在他们的队伍中,"于本年5月15日,天晓的时候,跟随大队饥民,沿广九铁路经深圳半夜渡河,抵达河边;越过大小几座山岭,到达粉岭"。

相比之下,临时工叶旋最为幸运:"在广州做临时工期间,得悉边界大开放,因而即与姑母从广州坐火车到平湖,再步行至深圳。"居然得到"边防民兵指引带路,而于晚上穿过铁丝网直至老鼠岭,迅速跑到粉岭后,才由人带到锦田叔父家"。

走水路的又分4种情形。一是搭船。如海丰小商人苏娘意:"当年4月25日,由汕尾搭小船,经海路至香港上岸。"

一是劫船。如海丰吴彦:"本年5月间,邀集同心逃难者多人,在本乡白沙湖劫夺盐驳小船来港,于5月22日抵达坪洲登岸。"

一是租船,如海丰学生余德彩:"我们数人租一小船仔,由汕尾落水,经过几天航程,一路未受到骚扰,于5月1日终到港。"

也有偷船,如中山梁华兴:"经过几个月暗中联系,才于本年4月22日晚,与同乡12人偷得公社一艘舢板,偷渡到澳,在澳门逗留一天又偷渡来港。"

还有至少4人,凭着一身好水性,干脆泅渡到港。如宝安梁耀全:"5月20日晚8时左右,约同4人在宝安县白石洲海边下水游泳横过长远的海,游至天明,抵达元朗海滩,翌日即21日晨,由济园农民收留救济,即通知我叔与姑父到元朗见面,小住20余天,6月23日来九龙。"东莞张林也是同样路径:"由东莞马鞍山,经宝安县公平墟乌石岩南头附近的白石洲泅渡到港。"

脱离原籍,到达香港,两个世界对比之鲜明,令人震撼。广州临时工叶旋的以下概括,颇具代表性:

"到港后很直接地有4种感觉:

"1. 摆脱了没饭食和食不饱的痛苦。

"2. 脱离了被仇敌对待,而能安心谋生了。

"3. 买任何东西都不受限制任由选择,任由需求了。

"4. 到港后就觉得像是出笼之鸟,并无顾虑,也不受限制。没像在那边时那种压制和恐怖了。"

这4点要求实在再平常不过,但对当时的人却是一生难求的梦想,唯有冒死偷渡,穿越重重边关,到了一线之隔的自由社会,这梦想才会变成现实。而有此幸运的,不过区区数十万人。■

(责任编辑　王彦君)

宪法应该为人民所掌握

○ 郭道晖

中共中央党校杜光教授最近把近几年写的有关宪法、宪政、法治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要我为它写一篇序言。他自谦“没有法学功底”，“文章里可能有些不当或不足之处”，希望我提出。其实，杜光1949年前在北大念书时学的就是文法科，后来又在中央党校从事社科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学家。他对原汁原味的马克思理论、包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国家学说，曾经下过狠功夫，通读马恩的全集，对此有专深的研究和剖析。近年他对在中国实行宪政的诸多问题更有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守望在思想和理论战线上，对阻碍宪政实施的各种动向，立时地、直言不讳地发出警示，不畏权势，厉声呐喊。我读过他发表的许多政论文章，深为这位非法学家的法学造诣和为人为学的科学与战斗精神所叹服。应当说，他的一些有关宪法和法治的见解，超越了某些固守教条的科班宪法学家和政治家。

杜光教授是我多年的朋友，是同龄人，经历也类似：1949年前，我在清华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同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革命活动，1957年同遭厄难。改革开放后我年届50，被调到全国人大法工委，由一个工科出身的教师、基层干部，改行为法治和法学工作者。所以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法学家，只是“老年出家”的“后学”，而且主要是从参加立法和法治实践中“自学”的。因此，我并无法学上的先天优势，不便冒昧对他的宪政思想和理论观点加以点赞或批评，这方面自有读者的公论。

我想从略读杜著后得到的一些启发，借序言这个平台，谈谈近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种值得期待的新苗头，这就是：中国的宪法学理论虽然尚属幼稚，中国的宪政运动虽然仍然步履维艰，但是，毕竟宪法、宪政和法治已经开始走下神坛和政坛，开始逐步普及于人民大众，日益成为广大人民的政治常识和维权诉求，而不只是法学者在课堂上的高谈阔论或纸上谈兵。须知近现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已有百多年的历史，虽然时进时退、不断折腾——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固然失败，蒋介石的行宪只是逢场作戏、过眼云烟，毛泽东喊出的“新民主主义宪政”在黑暗的旧中国曾经石破天惊，终究只是一句台词；新政权建立以来，一次立宪三次修宪，创下中国宪政运动的新纪录，仍然流于“有宪法无宪政”的跛足局面……但从历史的长河观察，总还是处于渐进的途程中，客观上也在民众中传播了宪法的知识和宪政的理念和种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党内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家李锐老率先呼吁“何时宪政大开张”，到谢韬发表雄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都非法学家或宪法学家。前年刮起的一阵反宪政喧嚣，也再度唤醒了广大知识界的良知，群起而攻之，客观上也促成一次宪法知识的普及和对宪政的追求。

值得一提的是，首先起而驳斥反宪政思潮的，也并非只是宪法学、法学界的专家，而是像近代史家杨天石，他率先一连发表了三四篇批驳文章。政治学家杜光也就此连续发表“三评”。他在本书的前言中说，他也只是“作为普通的公民和共产党员在毕生经历的积累和反思基础上提出的见解”。杜光这本小册子，也正是他进行宪政启蒙的佳作。这表明，宣讲宪法、追求行宪，已不限于法学专家的职责，而成为广大知识界、理论界和各行各业维权百姓的诉求。街谈巷议、引车卖浆的凡夫俗子，也开始把他们的权利诉求提升到宪法与宪政的高度。这都是值得关注和支持的可喜动向，也是杜光收入本书的那篇《凝聚民间力量，推进宪政改革》的主旨。本书中许多

政论、短评，也大都是把对个案的分析上升到保障公民宪法权利和遏制滥用国家权力的宪法案例高度，发人猛省。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刚调到全国人大法工委不久，适逢启动制定82宪法的工作，草案初步形成后，法工委办公室负责人要我尝试草拟一个关于新宪法草案的精神要点，供彭真向全国人大作报告时参酌。我勉力写了洋洋数千言，后来只有一句话得到首肯和赞赏，就是："要让宪法为十亿人民所掌握"。这确实是一个重要命题，后来也引入了彭真委员长给全国人大会议的讲话。可惜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上这一点并未做到。

近年执政党的中央领导人和中央的有关决定一再强调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还首次规定了"宪法日"，得到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期待。但是，如果只是在上者倡导，没有社会力量的支持，那也会受到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而落空。何况在上者的真心和决心如何，人们还在"观其言，察其行"。

这也涉及人们对宪法性质的认识问题。在我国，宪法一向被称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即把宪法只当成是"国家法"或"国家的法"，是执政者治理国家的工具，而没有关注到宪法首先是、主要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社会主体——人民对国家既授权又限权、既支持又防卫的"约法"（社会对国家的政治契约）。

宪法的社会性，概言之，指宪法的原始来源是社会，是由社会主体——全民（在我国是通过全国人大）所通过、所运用的，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其主旨是社会主体（人民大众）用以保护自己权利和防范国家权力的自卫武器，是人民的大法，亦即"社会的法"。社会主义是以"社会至上"为"主义"，而不是"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应当摒弃国家主义的宪法观，树立社会主义的宪政观，并使宪法大众化，成为能为人民大众掌握和运用的准则和工具。

基于宪法的社会性、全民性，宪法也应是能融入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为人民所掌握、所运用的工具和行为准则。它不应是供奉在神龛上的圣物，而应是人民大众的随身护符。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大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人们开始懂得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没有法律时，就束手无策了。公民的许多宪法权利与自由至今尚未立法；司法机关也往往借口无法可依，而推卸公民的正当诉求。这时公民与社会组织又不能启动其宪法权利，直接诉诸宪法；现实中许多违宪行为，也没有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制度可借以干预。迄今宪法的实施，主要体现为国家权力行为，即国家机关在立法和制定法规时，在依法行政和依法司法中，要以宪法为根据。至于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宪法还只是一个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及、虽神圣却不亲切的大法。修宪、行宪、护宪还没有成为社会真正参与的行为，即宪法还没有由单纯的国家的法，转变为社会与国家的约法或社会的大法。要改变我国宪法"只是一张写着公民权利的纸"的命运，必须使宪法逐步实现社会化与大众化。也只有在宪法大众化和真正落实了人民主权与实行宪政的原则之后，宪法的权威才会在社会上、在人民心中真正树立起来。

宪法的大众化，要求关注人民生活中活的宪法问题。宪法问题不只是那些事关"指导思想"、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等等党和国家大事。人民大众、普通老百姓在追求比较有限的政治经济目标以及私人生活中的权益时，也往往有严重的宪法意义，期待政府的关注、解决，也有待社会精英们、政法学者们去发掘和提升为宪法问题，并提出宪政对策，从而完善宪法的内容与保证宪政的实施，提高人们对宪法的信仰和参与宪政活动的积极性。人民有理由、更有权利为其实现而努力！■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　冯立三）

严 正 声 明

近期发现网上流传着一些《炎黄春秋》Word格式的电子版，该行为系盗用我社的名义，且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篡改并恶意传播，严重侵犯了炎黄春秋杂志社及作者的合法权益。我社将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炎黄春秋杂志社

盲目铲除私有制的教训

○　王宪斌

毛泽东时代认为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必欲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他从来没有认识到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还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建国60多年的历史证明,只要放宽政策,让私有制有所发展,多难的中国就可以转危为安。

1962年1月11日至2月8日中共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就三年饥荒的原因发生了分歧。刘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七分人祸”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三面红旗”带来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特别是“共产风”,危害最烈。这样空前的大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毛泽东不要批判“小脚女人”邓子恢,不通过“反反冒进”整周恩来,不在庐山会议上把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就不会出现那样的大悲剧。如果不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不大办公共食堂,不上收农民的生活资料和自留地,让农民适当搞点家庭副业和养殖业,中国也不会发生那样的大悲剧。

毛泽东坚信,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造成一切罪恶的根源,他的奋斗目标就是让私有制绝迹,让产生私有制土壤的小生产者绝迹。

七千人大会后,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持下,刹住了“共产风”,纠正了各个领域的极“左”政策,特别是农村的经济政策。“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变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共食堂解散了,生活资料可以私有了。农民有了自留地,还可以在房前屋后刨点小块地,可以喂一头猪、几只羊,也可以养几只鸡和鸭。集市贸易也开放了,农民可以在集市上出售自己的产品。私有制得到了有限度的发展,这就带来了生产力一定程度的解放。于是社会商品增加了,人民生活有所提高,饿死人的现象很少出现了。有限度的私有制挽救了百姓的生命,挽救了濒于崩溃的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

1962年以后,全国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但好景不长,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消灭私有制、肃清私有观念的风暴更加猛烈。农村通过“农业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些乡村用大队核算代替了生产队核算,自留地取消了,小块地没收了,农村集市贸易关闭了,小商小贩又成了打击对象。在许多旱区(如山西的壶关县和平顺县),连农民自挖的旱井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被归公,结果旱井倒塌,只好派拖拉机、汽车拉水,让农民花钱买水喝。城市里的经济更是清一色,私人经济难见踪影,企业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知识分子被诬为“臭老九”,发明创造被当作“只专不红”加以批判,更谈不上保护知识产权,社会基本处于停滞和倒退状态。在意识形态领域左得出奇,兴无灭资、斗私批修是主流意识,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是社会时尚,“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是思想改造的最强音。总之,在那时私有制罪恶滔天,私有观念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样做的结果是:生产力受到破坏,物资严重紧缺,职工收入长期处于低水平,人民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张批极左。邓小平1975年主政后,大搞全面整顿,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但真正全面好转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中央连续发出几个一号文件,推动了农村私有经济的发展。其他各个领域也进行了全面改革,从单一的、僵化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扩展到私人所有制、股份制、中外合资制等等。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占据了相当大的经济舞台,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提供的就业岗位和上缴国家的税收越来越多,有些地方甚至占据了半壁江山。国民经济总产值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同时还出现了许多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煤炭、水泥产量世界第一,发电设备、造船和家电生产世界第一,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也是电话、手机、电脑和彩电的最大生产和消费国。这些成绩除了让国人感到自豪外,难道不值得我们从所有制的改变中得到一些启示吗?

回顾1949年以后的60多年,历史雄辩地告诉我们:以"左"祸国,以右转危。毛泽东时代总是不停地反右、批右,没有搞过一次批"左"运动。在不断的反右、批右过程中,把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和一切非公有经济看成是私有制的产物,严加排斥和打压。那时,什么都要搞清楚姓"公"还是姓"私",把"公"看成是社会主义,把"私"看成是资本主义,"公"是天堂,"私"是地狱,说"公"就光荣,说"私"就可耻。即使经营单位只亏不盈,其成员也充满了自豪感。难道公有制就那么完美无缺吗?其实无论国有、集体所有,都不知道究竟是谁所有,很多是那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所有。因此有人说公有制实质上是官有制,是有一定道理的。公有制的权力缺乏监督,政企不分,效率低下,领导成员的公开收入多出普通职工好几倍,灰色和黑色的收入难以计数,其腐败程度比私有制严重得多。

当然,私人企业良莠不齐,私企老板也有行为不端的,也有见利忘义、损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假冒伪劣、贿赂走私、缺乏诚信等问题。这些弊端只要加以监督、管理,就可以抑制、减少。无论公有私有,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毛泽东时代的问题是:只看到公有制善的一面,甚至把它神圣化,而无视其恶的一面;对私有制则只看到恶的一面,甚至把它妖魔化,而无视其善的一面。毛泽东也知道,自留地的产量就是比集体地的高,自家的自行车就是比公家的自行车保养得好,但他还是强调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从来不讲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也有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面。一位哲人说:即使是真理,如果强调到了极端,也会变成谬误。毛泽东违背了辩证法和两点论,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从道德化的平等观念去责备私有制,就否定了人的生存权。人的生存权,是天赋人权。人总是希望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人生的一切活动也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还要发展,还要活得有尊严。要干净彻底消灭人的生存权是完全违背客观规律和人性的,是大逆不道的。不准人有私心,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收入靠贡献,岗位靠竞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能使社会有序稳健地前进。

但至今还有一些人否认私有制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事实。特别是少数先生一提起毛泽东,就认为他是公有制的代表、社会主义的代表、马列主义的代表,崇敬无比;一提起邓小平,就认为他是私有制的代表、资本主义的代表、修正主义的代表,恨之入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做到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就相当不容易了,毛泽东要求人人都大公无私,连"私"字一闪念也在批判之列,既不合情理也不合人性。硬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推动公有制的实现,结果是越推越乱,越推越穷。按照"大公无私"才算圣人这个标准,连尊为圣人的孔夫子也不够格,倡导共产主义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也不够格,然而共产主义社会必须靠一大批大公无私的人来造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假大空。企图靠公有制全面取代私有制,用铲除私有观念实现人类大同,通过暴力和无情打击强迫所有人步调一致进入"共产主义",其行为本身就是背道而行,必然产生邪恶。柬共波尔布特的所作作为就是邪恶,其结果只能是造就一个共同贫穷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我在大学时阅读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后,深感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剥削之残酷,从此埋下了对资本家和私有制的仇恨。参加工作以后,又受到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理论的长期灌输,更对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深恶痛绝。那时的社会风气是:如果有人说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阶级觉悟高;如果有人说私有制是促进劳动力发展的动力,就是反革命言论。在这种思维指导下,本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编写了许多大批判文章。"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成为选稿、写稿的指南,兴无灭资、斗私批修是新闻的主旋律,上纲上线、小题大做屡见不鲜。现在一看见自己编写的这些报道,不仅惭愧,而且有负罪感。写出此文,自己内心轻松了许多,有一种精神解脱之感。■

(作者为山西日报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丁 东)

国耻背后

○ 张绪山

一部中国近代史，几乎每一页都写满了“国耻”二字，浸透了国人的血泪。仅以后起的倭寇强加于我族的国耻日，就有1月14日（1895年日本窃取钓鱼岛列屿）、4月17日（1895年《马关条约》）、5月9日（被迫接受“二十一条”）、9月18日（九一八事变）、7月7日（七七事变）、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开始）等国耻日。而在此前，这类国耻日更是不胜枚举。

我国领导人多次重复过一个警句：落后就要挨打。挨打的原因是落后，这是简单的事实。如果我们无法改变外族的贪婪与强暴，那么需要改变的就只有自身之羸弱。于是，研究国耻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楚，是什么造成中国的落后？

内政不修是近代中国蒙受国耻之根源

实际上，近代以前的入侵者，在文化上都远远落后于中原王朝，所以，凭借着文化优势，外族入侵中原造成的生灵涂炭，都以入侵者的最终被同化得到补偿。这大概就是前人所持“以夏变夷”理念的历史依据。然而，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与此前外族入侵完全不同。在西方列强面前，中国已全面丧失了优势。中国的落后，不仅是器物与技术的落后，更是文化与制度的落后，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经隐隐感觉到了这场冲突的独特性——中国相较于西方，已是全面的落后。

与近代列强的图强变革相比，晚清朝廷的守旧与顽固，以及由此造成的“内政不修”已经非常明显。如果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各国的封闭状态中，其后果还不甚严重，那么，在与近代西方列强的冲突中，则影响可谓至为显明。

晚清中国社会已是积贫积弱、沉疴难除。吏治腐败已经不可救药：官府压榨、欺压百姓肆无忌惮，社会正义荡然无存；百姓穷困潦倒，社会两极分化；清廷之官员目光短浅、贪婪昏聩，无知无能集于一身。而对我虎视眈眈之列强，其超迈中夏之优势已不可以道里计，“天朝上国”意识下的清廷对外部大势茫然无知，对即将降临的危机毫无知觉，更谈不上根本的应对之策。

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弊端的了解，最清楚的莫过于久已怀有觊觎之心的日本。辛亥革命以后，共和体制在习惯于皇权制度的国度难以有效运转，中国社会处于失控状态，以丛林法则为特点的武人政治成为中国政治的常态。“九一八事变”和“满蒙独立”的主谋石原莞尔在武汉期间，为了收集情报，经常化装成苦力，在码头上与中国苦工一起劳作。他在亲眼目睹了官府的腐败与警察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之后断言，这个国家的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所谓的“爱国学生”其实是乱哄哄的闹事者，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转身走掉，一句话，这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日本人对中国晚清到民初吏治腐败与社会朽烂的了解程度之深，甚至在今天看来都令中国人为之汗颜。

外国有识之士对中国社会的痼疾可谓洞若观火。中国弊政常常成为他们劝诫国民警惕的显例。就在中国甲午战争惨败，中国割让台湾、赔付巨款之际，美国总统罗斯福警告美国人民：“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在罗斯福看

来，由于全面的堕落，中国已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废人，不可避免被列强吞噬的命运。

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中国社会的内政不修，已经造就了家国蒙辱的条件，一旦外族觊觎并发动战争，绝无幸免之可能。外族入侵与内政不修互为关联，外族入侵之发生，外族势力在华夏大地之横行无忌，其根源尽在中国内政之腐败、朽烂。

权力集团无视世界潮流造成内政不修

孙中山先生曾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近代中国之所以沦落到几乎亡国灭种的地步，最直接的原因是权力集团罔顾世界大势潮流，不能及时实现现代性转变。

清廷对于世界潮流的麻木与无知，由一事可见。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眼望世界的先驱之作，梁启超称之为“不龟手之药”。1851年《海国图志》被翻译成日文传入日本，日本人惊为天书，成为日本人了解西方优长、奋发图强的指南之一，对吉田松荫等明治时期的政治改革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明治维新运动。然而，在清廷及士人中，影响却微乎其微。清廷对“国之重宝”呕心沥血的警世之作所表现出的漠然，让日本人感到困惑，盐谷世弘在《翻刊海国图志序》中哀叹：“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其君不用，反而资之他邦，吾固不独为默深（魏源字默深——引者）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

近代世界大势是民族国家的建立，体现出三个重要特点：首先，在经济层面上，实现由封闭的小农经济向开放的商品市场经济的转变；其次，在政治制度层面上，与商品市场经济相适应，实现由封闭垄断权力体系向开放权力体系的转变，即民主政治的建立；再次，在思想层面上，与商品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适应，实现由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的转变，即理性科学思维的建立。后两个层面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一个民族与国家如果不想灭亡，就不能无视、拒绝这三个方面的转变。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权力集团一直昧于世界潮流，拒绝实现这种转变。

魏源与《海国图志》

一向以“天朝上国”自视的中华帝国是从来不愿承认外族的优点的。明末清初杨光先（1597—1669）厌恶洋人，留下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传世“名言”。鸦片战争以后，在洋人的坚船利炮面前，承认器物的落后已是无可避免，“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了无可奈何的选择，然而清帝国的大学士倭仁竟然以学习西洋蛮夷为耻，声言“闻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洋务运动在重重阻力中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号召，艰难地推行改革，取得一点可喜成就，然而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终于认识到制度也不如人。于是再探索制度改革，百日维新，预备立宪，最终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告终。但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使人认识到制度运转不灵的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存在问题，于是才有了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响亮口号“伦理之改造”，民主与科学才在思想上获得足够的认识。然而，民主与科学在认识上所获得尊严是一回事，在现实中建立起尊严是另一回事。近年来，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竟然被一些人认为是虚伪、骗人的东西；市场经济似乎可以脱离民主制度，权贵市场经济却被视为“中国模式”而大行其道。

近代以来中国走向现代性改造的过程让人看到的，是权力当局对世界潮流感知的迟钝与被动。康有为《上皇帝书》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可以说，以“天朝上国”自诩的帝制中国，即使面临世界潮流的激荡，也是得过且过，苟且偷安，只要不直接危及

自身的欲望享受，就会今朝有酒今朝醉，继续维持其醉生梦死的生活；如果不是列强兵临城下，则定然还会继续耽于威福，躺在帝制特权建造的骄奢淫逸的安乐窝里继续享受下去。

“私利当先”使权力集团无视世界潮流、拒斥变革

鲁迅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在中国历史上，变革维新在根本上意味着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这使得任何改革都变得万分艰难。

一部中国近代历史，让人们看到，即使是外族兵临城下形势下的维新改革，一旦损害个人与集团利益，妨碍他们继续享受威福，则必然陷于困境，或者半途而废，或者被引向对自身利益损害最小的方向，即使以损害国家、民族利益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洋务运动的最终破产，当下市场经济与权力结合形成的权贵商品经济怪胎，都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无法实现对权力有效制约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1904年，陈独秀作《亡国篇》，把“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列为亡国的首因：“我们中国，家族的制度，在各国之中算完备的了。所以中国人最重的是家，每家有家谱，有族长，有户尊，有房长，有祠堂……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做官原来是办国家的事体，但是现在中国的官，无非是想弄几文钱，回家去阔气。至于国家怎样才能够兴旺，怎样才可以比世界各国还要强盛，怎样才可以为民除害，怎样才可以为国兴利，这些事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53页）

与中国的家族制度相适应的，是以“家天下”为特征的皇权制度。皇权制度所展现的是赤裸裸的人性之私：皇帝享有权欲、物欲、性欲的至上垄断权；皇室家族享有锦衣玉食、世卿世禄的家族特权；权力集团享有荣华富贵、刑不上身的特权。这种以特权享受为特征的制度，是天下最符合人性之私的制度。其结果是，控制权力者无不以专权制度乃天下最美妙的制度而极力捍卫之。

皇权制度“家天下”的权力垄断，造成当权者反对任何妨碍其欲望享受的改革，同时也造成国民对国家事务的冷漠。道理很简单：无权享受国民权利的国民，如何指望他们与作威作福的权力集团同心同德？如何能让他们去拼了命捍卫特权阶级的国家？

2012年卢沟桥事变75周年纪念日之际，媒体刊发了一则新闻，令人五味杂陈：《北京宛平办事处原主任贪污受贿超3000万被判死缓》。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宛平城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8年水深火热的民族苦难的开始。在一个承载着如此痛苦记忆的地方，一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时常以“勿忘国耻”口号教育民众的官员，竟然在2008年至2011年短短几年间将3400万人民血汗钱无耻地纳入私囊！至于不久前出现的小科长贪污超亿元，则是贪官中的“后起之秀”。呜呼，勿忘国耻，勿忘国耻！近代以来的令亿万中国人丧失身家性命的“国耻”，在号称“人民公仆”的官员的物欲面前，竟然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2012年8月为抗议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的倒行逆施，中国各地发生大规模反日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一幅醒目的标语：“给我三千城管兵，一定收回钓鱼岛；给我五百贪腐官，保证吃垮小日本”。在人民心目中，强悍威猛、出手凶狠的城管与饕餮民脂民膏、脑满肠肥的贪官，竟可用来“以毒攻毒”，消除外患，这是怎样的讽刺！

至此，近百年“国耻”背后的耻辱是什么，似乎就无需多说了。一言以蔽之，中国社会至今尚不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完善的制度遏制掌权者权欲、物欲、性欲的横流无忌，国家物力被无端消耗于掌权者的挥霍中，民众对正义与善的追求被毁灭于掌权者的伪善中，对民族复兴的希望被熄灭于掌权者的荒淫中，这难道不是中国近百年“国耻”背后的更深的耻辱？■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王彦君）

选拔第三梯队的有关回忆

○ 李 锐

1975年5月，我从关了八年单间的秦城监狱放出来，仍回到流放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劳改。1978年最后一两个月，处境好转，允许我到合肥医院治病。安子文同我的境况相似，放出来后，也回到原来的流放地，也在这个医院里面。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了解我这个人。我们两个人在医院各住一个单间，天天闲聊，回忆往事，议论国情，还下围棋。他跟耀邦是亲家。他跟我讲，他会很快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找耀邦解决我的问题。

1979年1月4日，我从安徽结束流放，回到北京。安子文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对我非常照顾，曾想让我去当教育长。

但是，我对水电的感情太深，还是愿意回到水电部工作，担任副部长。1982年我已经65岁，准备从水电部退下来。在办正式手续之前，陈云就让大秘书王玉清给我捎话，派我去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不愿意去，因为知道党内高层人事的复杂，退下来就不想干了。随即陈云写了封短信给我——“李锐同志：你为什么不能‘能上能下’，定要当副部长？先做工作后再说嘛。”这样，我就没办法再推了。

组织部新建青年干部局，工作就是培养和选拔党的高层接班人。陈云要掌握这个局，他在中央开会时讲过：组织部我还得管几年。延安时，他在中央当组织部长时间很长。

我和陈云有一些交往。东北解放时，他负责接管沈阳，此时我当他的政治秘书。这是中国共产党接管的第一座大城市，问题非常复杂，除日常工作，向中央写报告等文字工作外，还主管外事和看报纸大样。住在北京饭店准备去西柏坡开中央全会时，他谈到想去上海，我说您一定会留在中央管财经，那我就回湖南了。我留在北京时，就到旧书店为他买了一大箱财经方面的书籍，尤其资料性的大书。1950年他还给黄克诚写信，要调我回京，黄克诚根本没告知我。在沈阳时，我们一起参观过丰满水电站。后来让我管水电，也是陈云安排的。

1982年3月我到组织部报到，当时部长是宋任穷。后来部长是陈野苹，我担任常务副部长，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队的选拔等工作，李志民接替我当了青干局局长。第三梯队这个名词不一定妥当，就是后备干部。但是这件事本身在历史上是必要的，是站得住脚的。

我一到组织部，就参加两项重要工作，一是选拔第三梯队，二是清理省部级班子，全国几乎跑遍了。我大声疾呼干部必须“四化”，德才兼备，起用一代新人。我特别注意干部知识化问题。1956年胡乔木嘱我给《人民日报》写社论，我写了一篇《干部必须学习自然科学》，当时虽然发表了，但实际上没起多大作用。大跃进中，全国还是砍树大炼钢铁。这一次中央终于下决心把知识化、专业化列入选拔干部的标准。

我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组，组十二大班子。在京西宾馆住了四五个月，拟定十二大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名单，当年这项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人事小组组长是胡耀邦，他很少来参加会，难有两个人的单独接触。日常的负责人是余秋里。余秋里原来是能源委员会主任，我当过副主任，他很了解我。我在小组还负责编《简报》，向中央汇报会议讨论人事选择的情况。所以跟余秋里联系最多，可说无话不谈，但是重要的事情还是耀邦管。

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严重老化，青黄不接，文化偏低。省级领导干部平均66岁，最初提名的十二届中央委员比十一届年龄还大，因为十一届中委有一部分是文革中上来的工农干部，年龄比较轻。否定文革，文革中起家的人不能留在

中央委员会里面了。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恢复工作，年龄又比较大。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66人，有大学学历的仅53人，占15.8%。省级领导班子成员有大学学历的仅占18%。初中学历以下的占46%。十二大人事小组最后决定，每个省再推荐两名学历高年纪轻的干部。当时，有大学学历，年龄不超过四十几岁，文革中没有问题，又做到副局级或县委书记的干部非常少。甘肃当时推荐了39岁的胡锦涛和49岁的陈光毅，都进了中央候补委员名单。

那年我已经65岁，离66岁不能新进中央委员的规定差一岁。帅大姐、章蕴大姐提名我进中央委员会，章蕴是十二大人事小组成员，帅孟奇不是，但是她在党内威望很高。十二大上，原水利部的李伯宁不同意我进中委，要以水利电力部代表团的名义反对。童大林也在那个代表团，他说，你对李锐有意见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们的意见。

十二大选出了一大批比较年轻的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胡耀邦要我准备推荐其中二三十个人，跟中央的老领导同志见面。让我先将这二三十人的简历写出来，印好后交给他。当时只有李鹏向我要简历看一看。因为当年刘澜波提拔李当部长时，电力部的老人有不同意见。那天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会，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都出席了，由耀邦主持会议，我当介绍员。可惜我没有经验，广电部门不知此事，电视上没有播出过这个重要的场面。

十二大前后选拔的第三梯队，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总共选了10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在青干局工作的崔武年写过一本书《我的83个月》，回忆了整个过程。后来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当选的中央领导人，大部分都从这1000人中产生，现在还有约600人在位。

江泽民是周建南向我推荐的。延安整风后期有个抢救运动，共抢救了15000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这是我1949年到湖南后，从国民党戴笠的二把手《唐纵日记》中发现的）。我跟周建南都被抢救，是关在保安处的监狱里认识的，后来成为好朋友。他当过机械工业部部长，我管水电，工作上联系很多。他当部长的时候，江泽民是外事局副局长。周建南后来担任进出口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把江泽民提为副主任。周建南是交通大学毕业的，他告诉我，江泽民也是交通大学的。当年交通大学是全国最难考的大学，高中毕业我不敢考交大。十二大后，江泽民当了电子工业部的部长。上海换班子时，我向耀邦推荐江泽民当市长。后来钟沛璋告诉我，他和江泽民当年都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读书时，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江是党员。南京收复后，蒋介石解散了这个大学，学生按院系关系，分配到有关学校，江学电机的，因此分配到交通大学。

耀邦对四化标准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文革中的三种人绝对排除。胡耀邦15岁参加革命，比我大一岁半，只上过一年初中，打AB团他几乎被杀掉。在延安他被称为读书读得最多的人，被毛泽东提拔到军委总政组织部当部长。当年在中央邓小平管青年团，耀邦曾长期是青年团负责人。胡耀邦发起真理标准讨论，解决"两个凡是"问题，是党内头脑最清醒的人。一个人在非常复杂、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能保持头脑清醒、敢作敢为，真正做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好传统：以史为鉴，除开经历与品德即胆识外，知识最重要。而知识同读书有关。他的文化程度是自学来的。陆定一讲过，耀邦是个大知识分子，确有根据。

陈云有一个思想：在人事上，还是我们的子弟可靠。耀邦是不赞成的，他曾经想通过一个关于干部子弟应当遵守的规则决定，没有成功，此事我直接经历了。当时组织部为中央代拟了一个《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草稿。我主持了两次干部子女座谈会征求意见，其中1984年3月3日的座谈会邀请陈云的儿子陈元、陈毅的儿子陈昊苏、博古的儿子秦刚、耿飚的儿子耿志远、孔原的儿子孔丹、崔月犁的儿子张小彬、于光远的女儿于小红、邓拓的儿子邓壮、王其梅的儿子王昌为、史立德的儿子史元、李大钊的外孙女李虹等参加。他们提出，干部子女和其他人应当一样对待，一样受党纪的约束，不赞成专门发一个针对干部子女的文件。我当时谈到曾国藩的家书，他的子女后代都很有出息。因为我从小就读过曾国藩的家书，曾国藩的后代有我的好朋友。日本人占领了长沙，没有占领湘乡，

打下一架美国飞机；飞行员降落在湘乡，发现了故居，就进去参观。曾国藩的后代有八个男女，都会讲英语。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也讲到这件事。邓力群在书记处会议上反对这个决定。这个文件就没发成。

我在中组部工作时，就经历过中央领导人推荐自己的子弟进入高层。1983年的一天，北京市委段君毅、陈希同到组织部，找到陈野苹和我，说王震推荐一个元老的儿子当北京市委副书记，征求我们的意见。当时陈野苹不讲话，我看出他不愿意。听段君毅和陈希同的口气，他们也不是很愿意，但是怕得罪人。见到这个情况，我就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慢一点？他们两个人很高兴走了。那次就没有安排这位元老的儿子当市委副书记。后来差额选举党代会代表时，他没被选上，就离开北京市到其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去了。

关于整党，当时我也负责参与。1983年整党的班子在京西宾馆住了几个月。那个时候负责人是宋任穷。整党就是查清文革时中央各部委、各个省的领导班子的情况，清出那些在文革时表现不好的人，老年的、中年的都在内。记得广西的情况特别复杂、严重。

1984年9月，“第三梯队”的工作尚未结束，部里突然接到让我从中组部退下来的批示。事后是习仲勋告诉我的。陈云接到三封告我状的信，即邓力群、我的前妻范元甄和部里一干部母亲的朋友。陈云在邓力群的信上批示了：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据说拟安排我去经委当个顾问。

中组部新任部长是乔石，他主持开部务会正式宣布做结论：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几次要求退下来。决定让我下来，通知全党，我离休仍留在部里。事后，习仲勋找我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次，我才知道这些内情。

耀邦下台以后，跟我有过几次长谈，他告诉我，他原来以为我是陈云的人，所以一直与我保持距离，后来才发现我是一个按自己的思想做事的人，不是一个跟线的人。其实从陈云传话让我去中组部，到我离开中组部，我在中组部期间，跟陈云只见过一次面，他说了让我“顶住”两个字，还说上海的班子不要动。

当时选拔第三梯队是现行干部体制的一次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改良。过去延安整风时将“革命”与“改良”对立起来，把“改良”视为“反革命”，具体说就是认为胡适那一批人的主张是“反革命”。我在大学读书时就订《独立评论》，知道胡适的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改良”与“改革”在英语中是一个词。现在应当继续改革。要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实现权为民所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应停顿。

中国要实行宪政很不容易。我赞成周有光的观点：“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到民权统治；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作者李锐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责任编辑　丁　东）

2015年出书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①文学及小说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游记、通讯等；历史、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②社科、人文、历史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③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行政、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和学术专著；**④美术类书稿：**画册、书法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08-8708　　传真：010－65735038
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文馨、王双、牛萍萍(编辑)
约稿详情、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zuojiaba.com
投稿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8号朗廷大厦A座515　编辑中心收(邮编：100024)

代写个人传记、回忆录

● 专业作家为您代写个人传记、回忆录等作品；● 只要您口述就行了，其余交给我们来做；● 作品以图书、光盘、摄影集、视频等形式发行；● 咨询热线：400-608-8708　　邮箱：bookzj@126.com

★咨询即有精美新书赠送(有限量)！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动乱年代的采访

○　邓伟志

侥幸存在的《农村青年》

文革是“革”文化的“命”，不用说，也就是“革”文化的载体——刊物的“命”。到1966年年底，除了《红旗》等几家刊物外，大批的刊物都先后停刊。有一份叫《农村青年》的刊物，居然办到1967年底，发行量高达30万份。

《农村青年》怎么会如此幸运？它原名《农村知识青年》，文革前由上海办的。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后，第一书记柯庆施认为，未来是属于青年的，要有战略眼光，提出提高档次，由华东局宣传部来办。把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陈晓东调来任《农村青年》编辑部主任，把《大众日报》理论部主任郭嘉复调来任《农村青年》副主任。重要稿子还要报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征农和副部长吴建审阅。

文革开始，草木皆兵。也许是读者对象比较诚实的缘故，没有人来造《农村青年》的反。毛泽东提出“中央局不可夺权”。有的中央局夺了权，没几天又悄悄地还了权。文革前华东局机关管收发的只有一个人，接访的也只有一人，上面还有个组长，总共三个人。文革开始，整个机关几乎倾巢而动搞信访，编出二十多个接待站还忙不过来。在属于“不可夺权”单位领导下的《农村青年》，便得以多活了一阵。

文革前，华东局从未挂过牌子，很少有人知道华东局的组、宣、农、纪等部门在高安路19号。文革中高安路19号被人晓得后，我们连夜把别处的篱笆搬来，把《农村青年》的小黄楼与宣传部的大楼隔开，再搬开花园另一角的篱笆当大门，从衡山路进出。这样，《农村青年》编辑部便成为“世外桃源”。19号有来自华东各地的人进进出出，人山人海，小黄楼万籁俱寂，平安无事。当时部领导无法到原来的办公室办公，可是，无“公”好办也要办。吴建副部长天天来衡山路《农村青年》上班。

时势能牵着人的鼻子走。在“造反”空气弥漫的时候，华东局的干部坐不住了。有一天，吴部长又按惯例来《农村青年》。一进门，不再是“早上好”，而是“打倒吴建”，以示与吴建划清界限。吴建似乎也预料有这么一天，听到“打倒”自己也只不过收敛了往日的笑容，很平静地站着听完口号声以后，又到往日的位子上坐下看报。

造反是要花费精力的。《农村青年》谁来办？为了做到造反、办刊两不误，成立了一个以周挺南为组长的“生产组”。我也忝为组员。当时正流行“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我对同事们说：“你抓革命，我促生产。”

险些因为把沙溪与方巷作比较而惹祸

文革前江苏有两个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典型：一个是太仓县沙溪公社洪泾大队，一个是邗江县方巷公社方巷大队。前者是叶群抓的点，后者是上将张爱萍抓的点。在宣传上，有关方面明显抬高叶群的点，压低张爱萍的点。下面了解情况的人有议论。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说：“沙溪顾阿桃那样画图背书是图腾。”

我先去了方巷。这里气氛热烈。男女老幼都能说一些毛主席语录，儿童团长对毛著熟得超过她的年龄，滔滔不绝。方巷群众做好事的现象很普遍，助人为乐成风。张爱萍在这里很多工作都是亲自动手。群众称赞他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在方巷我多处看见张爱萍亲自在泥墙上用石灰写的毛主席语录，亲自给社员上课，自己出钱买树苗植树。方巷是把学毛著同学文化相

结合，张爱萍亲自编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识千字》，小小的72开本，牛皮纸封面，装帧极为简单。

接着，我又去了洪泾。“五一六通知”下达不久，林豆豆在《人民日报》以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题为《向阳花开》的长篇通讯，介绍洪泾大队沈玉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迹。沈玉英是初中毕业的女青年，患有截瘫，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每天“狠斗‘私’字一闪念”，都记在日记里。这样的人正是《农村青年》当时应当宣传的对象。1966年仲秋周挺南便带了我去采访。

毛泽东接见顾阿桃

1965年叶群、林豆豆母女都住在沈玉英家附近，著名的顾阿桃也在这个公社。本来叶、林母女都用化名，农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对叶、林说：“你们真像是母女俩。”叶群也很机灵，马上把豆豆拉过来，说：“我是喜欢这个小战士。”没有不透风的墙，在1966年四清结束前，他们都公开了身份。

叶群树的典型顾阿桃不是青年，不是我们采访对象，我只见过顾阿桃一次。见她时，她向我讲了1966年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情况。我现在脑子里所记的，同有些报刊上所写的不太一样。我记得的是，顾向叶群主动提出：“我要见您‘小官人’（太仓土话，小官人指丈夫）。”叶群说：“他忙！”顾阿桃说：“见不到你小官人我就不走。”叶群只好把她领到家里，见了林彪。顾见叶群家里只有两个箱子，问叶：“你们冬天的衣服呢？”顾的意思是，两个箱子是装不下棉衣的。叶群说：“冬天的衣服还没发哩！”顾据此说林彪生活简朴。文革后，在文章里看到，叶带顾见林的屋子是警卫室。

我去了好几次洪泾。通过对沈玉英的了解，一方面感到沈玉英确实不容易，已经瘫到了胸部，还那么坚强。另一方面也隐隐约约觉得林豆豆的文章多少有点拔高。就在这时候，沙溪有人给《人民日报》写信，指出林文有失实之处。结果，回信的不是林豆豆，而是工作队里的一名空军军官。沈玉英把这封信给我看了。回信人检讨了自己工作不深入，不细致。回信人的书法很好。看完了信，我产生了异样的感觉：文章究竟是谁写的？年纪轻轻就由人代笔，好不好？即使不是你写的，署了林豆豆的名字，出了事你怎么不出来说一句，却要别人代为检讨？这点小事都不出来担当，像话吗？我本来对他们一家都很敬重，知道了这类事，开始打了一点点折扣。

因为之前去过方巷采访，深感洪泾在普及、在学文化这两点上不如方巷。我便给张爱萍写了信，赞扬和支持方巷把学毛著同学文化相结合的做法。张爱萍回信指教我如何当好记者。他是用毛笔在红色竖格的信纸上写的，每行第一个字都高出格子之上。接着，我又写了“内参”，有一点赞方巷、贬洪泾的意思。我拿给一位信得过的领导先看。他第二天对我说，把我写的内参和张爱萍给我的回信烧了。这时已有人议论上边“打倒张爱萍”了，我还不知道。领导这样做是怕我惹祸，完全是出于对我的保护。

“一月革命”前后到杭州采访全国劳模扑了空

1966年底，从报上看到杭州近郊有位全国劳模，又是全国人大代表，人不错。我向领导提出：“我就近跑一趟吧！”领导同意。我元旦一过就一个人去了。

到杭州，靠朋友小周夫人的面子住进大华饭店，小周夫人是饭店翻译人员。这饭店一般不对外，只有领导人才能住。他们告诉我：饭店餐厅屏闭，任何收音机在大厅里都接收不到广播。在这种高级地方，我不敢破费，住工作人员房间，吃

职工食堂。

住下后，我兴致勃勃地去采访全国劳模。哪知风云突变，劳模挨斗了。原因是浙江在一两个月前揪斗省委书记江华时，江华在劳模这里藏了一天。保护首长，这在过去是爱党行动，模范行为，可如今就是"保皇派"了。公社造反派没让我见劳模，还好没怀疑我是特务。在我提议下，他们带我看了制茶工艺流程。让我开了眼界。只记得茶农在热锅里搓、揉茶叶时，手心烫得绯红，很辛苦。

采访不到劳模，也不想马上回沪抓革命，我又在大华多住了几天。在这几天里，见闻颇丰。

一是听说江华的夫人自杀了，让人震惊。接着又看到几张丑化她死的漫画，看了让人冒火，让人落泪。江华也是华东局书记。我知道，江华夫人是省法院的领导，外柔内刚，风骨峭峻，怎么突然自杀了呢？她是受到什么样的折磨，才走这绝路的？

二是听说新华社浙江分社领导自己把手指剁掉了，说是决心不再写了，免得再被人捕风捉影，含垢忍辱挨批斗。

三是在大华草坪上看王芳挨斗。大华归副省长王芳管。多年来，中央首长住大华全由老公安王芳安排。来的都是头，不管谁来大华，王芳都精心照顾。如今把头儿分成了"红与黑"。他关心"黑"的就是罪，关心"红"的只字不提。"黑"的夸王芳就是"勾结"，红的赞王芳被扔在一边。批斗会只有几十个人，我这局外人站在最外圈，只听外圈的人讲："跳得最高的是王芳最爱保护的。"我听了这话如五雷轰顶。残酷斗争莫不是人际关系的搅绊机、粉碎机？暗暗思考：是不是因为先有了"关系密切的就是'保皇'的"逻辑，才导致为了撇清保皇，"关系密切的"就是斗得最狠的惨像。后来，随着文革"斗、批、改"的推行，不断地看到"亲者狠"，看一次想一次王芳。

四是站在马路上看美术学院教师游街。美院离大华比较近，他们游街要路过大华。大画家们都穿着蟒袍，戴着乌纱帽。马路旁边看热闹的人会指指点点讲出大画家的名字。我的家乡萧县是著名的书画之乡，我尚能知道浙美几个画家的名字，但是毕竟不曾谋面，都不认识。看大画家游街，又好气，又好笑。从文革后的观点看，当时的"笑"是不对的，是幼稚可笑的。大画家们在游街时，他们彼此之间也有相视而笑的。他们不是京剧演员，也没做过三品、五品大官，谁穿过那玩意儿呢？如今忽然成了"王侯将相"，被人批为"保皇派"，这难道不让人流露出"苦恼人的笑"吗？不过我想起一件事，马上收敛了笑容。浙江美院老院长刘开渠是我表舅，早已调北京了。如果不调走，会不会也……看游街的人当中，有人说，"上海搞了'一月革命'。杭州是紧跟上海搞夺权"。

第五件事更离奇了。一天晚上，一位美女来到我房间，自我介绍说："我是大华的小会计。"我想起，好像在职工食堂见过面，我说："见过，见过。"她说："我看你和张翻译（即小周夫人）很熟，又是记者，人和气，所以敢来请教。"她继续自我介绍："因为我会跳舞。中央首长住大华，我都要陪中央首长跳舞。现在他们叫我交代与'黑帮'的关系，揭发黑帮的黑话，还不许我回家，叫我全部交代。我除了毛主席没见过，会跳舞的中央领导都见过。跳舞时就讲些客套话，谁跟我们这号人讲黑话！我真不知道哪些该交代，哪些不该交代，只好向你请教。"她紧皱双眉，一副可怜的样子。我劝她别难过，请她慢慢讲一下她自己是怎么考虑的。她讲了很多，我帮他出了些点子，叫她只讲已打倒的，对没打倒的绝对不能提。尽管我对当时的"打倒"已经有了一点想法，希望不以一眚掩大德，但也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想法，更是"不足与外人道也"的想法。她说，那么多舞伴，她苦就苦在不知道谁被打倒，谁没被打倒。她提到陈伯达，个子矮，不会跳，很难看，还不讲卫生，讲话也听不懂。我提醒她："陈伯达你千万不能讲。他正红着哩！"

会计游街回来给刚生出的儿子起名"文游"

听说安徽合肥郊区的杏花村大队的会计学习毛主席著作做好事，乐于助人。1967年初秋，我们急忙赶到了那里。举目一望，碧水萦回，天光云影，庭草碧绿，心情顿觉舒畅。这让我马上想起孟子的一句话："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江淮风光就是好啊！想不到一跟社队领导

邓伟志

交谈，方知情况变了，刚才的兴致一扫而光。

这会计大概是说了句对中央领导不十分尊重的话。什么话？公社领导没明讲，我们也不便问，因为“防扩散”。在我们到杏花村的前几天，被拉出去游过街了。听了介绍，我真不知说什么才好。昨天是标兵，今天变成了“敌人”，转速是何等之快哟！我默默地在心里背诵古诗中的又一句话：“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会计游街回来以后，他妻子生了个大胖儿子。给儿子起什么名字？会计灵机一动，就叫“文游”吧！文化大革命中游街之意也。

在英雄李文忠的部队和家乡

1967年8月6011部队李文忠在江西“支左”时，忽见一群红卫兵在赣江落水，他奋不顾身，跳下去救人，接连救上来5人，自己已累得四肢无力，面色仓白，又看见还有一名红卫兵在水里挣扎，他再去救时，自己牺牲了。李文忠所属的6011部队原来在山东，李文忠的家乡也在山东，《农村青年》便派我与冯德印去山东采写李文忠在山东的表现。我们先见了魏伯亭军长，后见孙好贞师长。孙师长拿起枪能打敌人，拿起笔能写文章。他讲了不少故事给我听。那时候国家还很贫困，他想招待我吃水果，市面上的比较贵。身处苹果之乡的他，自费到苹果园买苹果给我吃。

离开师部后，我接着又到潍县李文忠的村上。众口一词，都夸奖李文忠参军前也很优秀，勤劳，刻苦，肯帮人忙。这个村因李文忠而出名，来学习的人很多。地区派一位刚刚解放出来的地委老宣传部的王副部长搞接待。王部长很内行。当时在由谁宣讲李文忠的问题上，有的建议由李文忠的妻子去，有的建议由李文忠的父母去，众说纷纭。王部长出面分析，很有分寸，大家就听他的。李文忠有个女儿，名字是李文忠起的，叫“阿华”。本意是“爱我中华”。可是，有个邻居有点文化，也是村干部，硬是说：阿华是阿尔巴尼亚与中华。王部长吩咐，不要随意发挥，原来是什么就说什么。

一天黄昏，我在与王部长两个人在田野里走时，他讲了个能把人吓掉魂的故事：潍坊的红卫兵、造反派把干部装在麻袋里往海里扔。他和几个干部也被装在麻袋里了，也运到了海边，但是尚有几个人没被扔到海里，他是幸存者之一。这让他得以活着在这里跟我说话。

就在我准备提笔整理李文忠参军前的模范事迹时，《农村青年》来电话，说机关分成两派了，杂志不能办下去了。再办，就被说成“抓生产，压革命”了。

我听了很伤心。两派的人都比我能干，都对我很爱护，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呢？我再一想，他们是因为“抓革命”抓出来的矛盾，我前一段时间没介入，回到机关我入哪个派呢？茫然，怅然。能不能不入派呢？

可是，在1967年那种环境下，生产也撇不开“革命”。我外出组稿、写稿，也是“左”得出奇，做的错事多，好事少。我说林豆豆写沈玉英“拔高”。其实，在我写的报道里，也有拔高，也有“穿靴戴帽”。当时社会上对我们这种人有个温和的讥讽：“戴眼睛，夹皮包，会总结，会拔高”。■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丁　东）

致本刊作者

至2015年12月，《炎黄春秋》仍有一部分作者的稿费无法寄出，主要原因是作者的信息不完整，请至今还未收到稿费的作者看到此信息后速与财务肖林女士联系。

联系电话：010-68525374。

炎黄春秋杂志社

朱启平先生二三事

○ 张　刃

1945年9月2日，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发回一篇现场报道，详细描述了日本签降的历史性一幕，最后写道，签字后“看表是9点18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寇制造九一八事变，随即侵占东北。1933年日本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是9点18分。14年过去了，侵略者竟然也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天网恢恢，天理昭彰！……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消息见报后，读者由此记住了朱启平的名字，那篇通讯也成为新闻报道经典。

之后朱启平命运如何？这里略述朱先生二三事，以飨读者。

朱启平

一

先父张高峰与朱启平先生曾同为大公报记者。1949年以后，随着抗战时期的老大公报人陆续调离，朱先生作为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与仍在北京大公报的我父亲成为记者中不多的老友之一。孰料，1957年，朱启平不幸“落网”，次年即被送北大荒“劳动改造”。1961年，我父亲也被“驱离”大公报，下放黑龙江了。从此，两位朋友天各一方。

朱启平生于1915年，原名朱祥麟，祖籍浙江海盐。1933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改读新闻，1940年秋加入重庆大公报。1944年作为大公报特派员，随美军太平洋舰队采访。抗战胜利后奉派赴美国，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兼驻联合国记者，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精彩通讯。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代表团由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大将梅津美治郎率领，在密苏里号甲板上签署降书

朱先生的《落日》是经典之作没有疑义。但他在1945年所写的长达万字的通讯《日本投降是临时休战》，更应重视。如果说，前者可以作为新闻报道的范文入选专业课本，那么，后者则可以作为现场报告经典列为国际问题教材。因为，朱启平用投降之初日本各地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以敏锐观察、精辟分析，向世界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警告——日本人没有悔过，他们随时准备再战！

怀着爱国报国情怀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他的两个弟弟随迁台湾时，他1948年底携全家回到了大陆。朱先生夫人孙探微回忆：“1948年底，看到国内即将结束内战，和平建设时期即将到来，启

平和我商量去向。他有工作经验，我也有工作能力，完全可以自食其力在纽约生活下去。我们还有共同的强烈愿望：要回祖国，为深受战争苦难的老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在百废待兴的祖国建设中投入自己的一份力量。至于放弃美国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回国过长期艰苦的日子，我们俩毫不动摇地一致认为是值得的！”

就这样，他们抱着不到两岁的儿子，乘船远涉重洋，于1949年1月回到香港。不久，朱启平即赴北京。7月12日，周恩来邀请新闻界友人聚餐，听取他们对如何办报发表意见。据《周恩来年谱》所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这张名单所列，均属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精英，其中大公报有四位，朱启平居首。

1951年5月16日，香港大公报发表朱启平署名，5月2日寄自北京的通讯，详细描述了北京五一劳动节游行的情景，其中写到“最壮大的市民队伍进场”，“口号渐渐简化到一个：‘毛主席万岁！’60万人都在呼喊着这亲爱的名字，为他祝福。队伍到主席台前，都走得慢了，用尽生平气力在欢呼鼓掌，有小旗的挥小旗，拿花的摇花，‘毛主席万岁！万岁！’狂了，狂了，多少人不知道自己在流泪。这样的人民对领袖的热爱，我们的历史上有吗？谁说中国人不会发狂！”

朱启平不会想到，这种“发狂”会演变成“疯狂”，以致殃及自身。那之后不久，他主动请缨奔赴朝鲜战场，冒着生命危险采访报道，坚持到停战谈判才回国。

二

朱启平这样的优秀记者怎么会在1957年“呛水”呢？

作为一名记者，朱启平一向恪守“说真话，不打诳”的职业信条。对于虚假的“新闻”更是深恶痛绝。他曾遇到这样一件事：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1948年曾被蒋介石裹挟，一度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却始终与当局有所不合。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他即与之分道扬镳，赴法国重操本

落日

記日本簽字投降的一幕

本報特派員朱啓平

簽字場所

《落日》(局部)

业，其间，美国方面也曾以高薪延聘，他未接受，于1951年3月回到大陆。朱启平采访后，如实报导翁向往新中国，宁可放弃美、法的高薪聘留，愿为祖国建设贡献所长。不料刊出时，却被“上头”擅加改动，说翁是在国外“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归国的，而共产党则不究既往，宽宏大量地予以收留云云。朱启平说，这么一改，完全背离了事实，也违反了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更是对这位爱国老科学家人格的侮辱。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当初选择回国的切身感受？但就因为这些意见，他便被说成是“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新闻政策”，也由此埋下“祸根”。

1957年中共整风之际，朱启平身为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虽由北京大公报代管，却非其编制内员工，原本可以完全不介入运动。是一次“意外”的谈话，彻底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那位谈话者，就是时任北京大公报中共党组书记兼总编辑的袁毓明。

袁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54年才调入大公报。作为大公报整风领导小组组长，他要动员属下参加鸣放，便以个别谈心的方式听取朱启平的意见。盛情难却，朱启平坦诚提出“报纸应更多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袁深以为然，鼓励他写成小字报张贴出来。朱启平胸怀坦荡，一心为办好报纸，便依袁所嘱照办了。很快，

袁毓明成为“大公报的‘纳吉’”，头号“右派”，朱启平则成为袁“集团”的一员，同样打入“另册”。

1957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和大公报同时刊登长篇报道，点名批判朱启平。两报的报道内容相同，只是详略有别，标题稍异。人民日报排在第二版中间，标题横排两行：“复辟旧大公报的又一路大军被击溃，朱启平的反党办报纲领破产”；大公报则刊于二版右上角显著位置，标题直排两行：“提出反动办报纲领向党猖狂进攻，朱启平是复辟旧大公报的悍将”。

报道开头就说，朱启平在鸣放期间“非常活跃”，“要推翻党对北京大公报的领导”，“篡改大公报的办报方向”。罪名显然莫须有。朱启平不过是一名记者，又非中共党员，如何能够“推翻”强大的中共对一份全国性大报的领导呢？报道抓住其“反党办报纲领”做文章：

“……朱启平公开提出了一个办报纲领。他要求办一张所谓‘人民群众的报纸’，一张‘民间报纸’。这样一张报纸‘最重要的’是‘报道人民内部矛盾的事’，企图把大公报变成反党工具。他认为，‘这样一张报纸，要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如果因此而发生纠纷，甚至可以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朱启平要求对记者‘全部信任’（实际上即无条件的信任）。而记者的任务则是‘深入民间’，寻找矛盾。在国际宣传方面，他认为，我们的报纸‘缺乏新见解新事物’，主张登载‘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朱启平恶毒地把党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污蔑人民日报不是人民的报纸，他叫嚣说：‘有一天共产党会消灭，人民日报必须也改为人民群众的报纸，其它报纸更不必论。’”

这篇报道转述的朱启平“反动言论”，就是他应袁毓明之请提的意见，又依袁的建议写成小字报内部张贴。由此说成他“公开提出”的“办报纲领”，显然是欲加之罪了。

报道还指，朱启平极力活动，要把子冈、徐盈请回大公报，作为他“企图复辟旧大公报反动政治方向”的证据。然而，徐盈、子冈均为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且早已脱离报界，即使二人回来，何以就是复辟旧大公报呢？

对朱启平的批判，“新账旧账一起算”，指其“曾经长期担任旧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并大力吹嘘‘马歇尔计划’”云云。如此，更把他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三十多年后，朱启平回忆那段岁月时说：“不识时务，迷信报纸为人民的喉舌；执笔在手，以为最先考虑的该是国家的富强，人民的福利。还要独立思考，说真话，个人的成败利钝是次要的。正因此，遭遇厄运，几至家破人亡。一生中最能工作的二十年，在垃圾堆中挣扎，侥幸活下来。这也好，使迄无建树有了借口。”（《中国当代新闻文学选》第二卷，香港新亚洲文化基金会，1989年）

三

朱启平在北大荒“劳动改造”的情景，与他同时“发配”的吴永良先生有详细记述，说他骨瘦如柴，甚至托人给夫人带回了唯一值得纪念的手表，准备客死他乡了。两年后，朱启平是怎样脱离苦海的呢？据说是当时各地亟需教英语的人才，找到大公报，答复说，这样的人倒是有一个，在北大荒。因此才调他回来，捡了一条命。

朱启平这样描写他离开北大荒时到澡堂的一幕：“脱了衣服刚要下池子，池里七八个人都盯着看我。我有什么好看？洗澡不是谁都脱光衣服吗？人家瞧得紧，我不由得也看看自己，究竟有什么可看的？啊！原来我是个骷髅架子，人家没有见过这样真正皮包骨的人！我的胳膊，可以用大拇指食指圈起来；我的大腿，两只手可以箍起来。回到北京，亲友见了，簌簌落泪。”

在张家口外语学院，朱启平“感谢学校救了我一命。如果我再在北大荒劳改下去，不出半年，也许就要死在那里。过去两年中，我就亲眼看见好几个在我身旁劳动的年纪大些的人，先后倒在地上，再没起来。”他兢兢业业教授英语，度过了相对平静的几年，还摘了“右派帽子”，但工资降了四级。

文革乍起，朱启平再次被“新账旧账一起算”，并且遭到造反派的毒打。他的小儿子开宇后来回忆说：“1967年，有一天爸爸突然跑回家，身上鞭痕累累，说是接连几天被殴打，再不逃走极可能被打死。他连夜写了一篇陈述在学校如何被打的材料，让我藏起来，说一旦他被人找到抓走，要我赶紧将材料送中南海上诉，或许可救他一命。幸而那时学校里两派内斗激烈，没来抓他，让他幸免于难。”再

以后，经过下干校，“斗批改”，朱启平到迁至洛阳的学校继续教书。

1978年，浩劫过后，百废待兴。负责港澳台事务的廖承志点名朱启平重返香港大公报工作。对人一向体恤入微的廖公，还将孙探微也从中国建设杂志社调去香港大公报做英文版的编辑工作。朱启平夫妇两地分居20年终于团圆。孙探微对朱启平说：“我打破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的记录，还超过她两年！”

重返新闻岗位，朱启平牢记离开北京前，廖公在病床上对他的嘱咐：“你们去香港工作、办报，不能搞极左。”很快进入角色，再创佳作。

重庆《大公报》编辑部：自右至左为孔昭恺、赵思源、贺善徽、朱启平

1979年，作为记者团的一员，朱启平随华国锋访欧。在法国科隆贝，他瞻仰了反法西斯英雄戴高乐将军之墓，触景生情，写了一篇通讯《伟大的平凡》，描写戴高乐将军埋葬于普通村民坟场，“真正是只占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里”、“墓石是最普通的石头，多半是用来镶马路边的”，真正的伟人不会高高在上，更没有特权，而是一辈子置身于民众之中，身后也把自己放在与人民平等地位。戴高乐将军“来得光明，去得清白，永远是法国的骄傲。”此文刊出后引起读者极大反响，对于国人破除个人崇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北京的老友、大公报名记者子冈写信给朱启平说：“我读了不止十遍。你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晚年的朱启平，对于亚洲及世界大势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新闻敏感。1982年8月间，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否认当年侵略罪行，朱启平迅即作出强烈反应，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从《烽火当年，血海深仇》回顾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到《追忆日本投降前后》讲述战争同时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结束于《中日应当友好合作》，呼吁中日两国人民合力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表示，中国人民绝不畏宿敌的猖狂，“天塌不下来，大家把心一横，较量到底，最后再来一次‘八一五’而已”。我父亲读后说，启平的爱国之心，一如三十多年前。他的血还是热的。

四

1985年，70岁的朱先生退休了，他给我父亲写信说：“结束了七年夜生活，恢复了早上起来，晚上睡觉的常人日子，身体和精神都好一些。家务事里里外外，都是自己做，并无人帮忙。加上看看书报，写写信，一天时间占去不少。我还注重运动，天天步行十多二十里，约两小时。心情宽松，斗争会、学习班、劳改、抄家，今天不知明天事，谁都可以来踏上一只脚，等等，都成了过去。虽然人在香港，既无发财的本领，也没有这个念头，平平淡淡，逍遥自在。老了，稍有自知之明，也就这样打发晚年了。”

朱先生退休后，几次到内地旅游，饱览大好河山的同时，想得最多的还是人间风云。1988年春，朱启平夫妇游览三峡，重新踏上抗战时他曾经采访过的三斗坪，也就是设计中的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朱夫人孙探微回忆说：“启平认为，应该立即在长江上游植树造林，保护植被，修水利。至于大型工程，则应等到真正清除了贪污浪费之风时才能施工，不然会给老百姓造成极大的损失。”基于此，他撰写了近万字的《三峡工程纵横谈》，分列19个小题，以“武原”的笔名，连续发表于香港文汇报。他从社会风气、干部素质的角度提出了工程可能面临的问题，提出“为大坝万全计，在人的素质得到提高之前，党风与社会风气恢复到50年代初期之前，三峡工程是不能匆忙上马的。”他甚至主张，“三峡工程兴建与否，留待21世纪或者更后的子孙去解决。”今天看，年逾古稀的朱启平先生为国为民，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有先见之明。

从三峡归来，朱启平北上访友，6月，与吕德润先生一起到天津，看望卧病的我父亲。谈话中，朱

先生还提到了1987年两次去台湾探亲的情况。

朱启平的三弟朱书麟，是台湾电力公司前总经理，四弟朱炳麟是台湾监察院秘书长。兄弟数十年未通音讯，晚年才得团聚。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朱启平仍不忘体察民生。他要求去参观菜市，说从菜市可看出食品供应情况、市民的购买力及实际生活水平；他询问小学教员的工资待遇，说其生活待遇高低反映当局对教育、对未来的精神与物质建设重视与否。我父亲听了笑道："老兄探亲也不忘本行。"

1989年4月，我父亲不幸病逝。朱先生接获讣闻，即写信给我："惊悉令尊逝世，忝为老友，震悼殊深！……去年夏天德润和我曾专程到津会见令尊，聚谈颇欢。三十多年不见，并不形成隔膜。他当时健康欠佳，但精神很好，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总以为会逐渐康复，不料遽尔弃世。他一生执笔，不知写了多少精彩文章，敬业乐业，数十年如一日，自为识者所欷歔 。得读邵象文，足见公道自在人心。令尊一生笔耕，丰硕成果，是客观存在。过去长时间的遭受，他很看得开，足见他的豁达……"

后来我准备整理父亲的遗稿，朱先生来信嘱我："内容力求丰富，言之有物。"这使我想到他的一篇文章《文字是第二位的》。朱先生说："写稿，你是根据看到的、听到的、体会到的、深有所感的，以尽可能简练清顺的文字，宣泄纸上，很难说要根据什么规章才能动笔……当记者，最要紧的，是尽心为读者提供最好、最真诚的服务，不说假话，不炫耀自己，始终不渝。要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文字水平，究其极，是第二位的……一颗炽热的为读者服务的心是第一位的，文字水平，包括写特写，自然越高越好，但是是第二位的。""作为记者，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最后一句，是朱先生品格与情怀的真实写照，也成为我做新闻工作的信条，恪守至今。

1993年11月12日，杰出报人朱启平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安然去世，终年78岁。家人将他葬在风景秀丽的加利福尼亚州半月湾旁的山区墓地，那里可以远眺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彼岸是他的故国家园。■

（作者为《工人日报》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丁　东）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
400-610-0896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盒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2第2460530号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3第2461278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3第2461279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5100295号

我的父亲马建民

○　老　鬼

一、对孩子冷酷

马建民

父亲有个习惯，喜欢在朋友面前揭露批判自己的孩子。不只是对我，对哥哥姐姐也都这样。他总爱向外人介绍自己孩子的各种毛病，好像要特别表现一下他不溺爱娇惯孩子。

在农村老家，大家都呵护我，没挨过打。可在父亲身边却屡屡挨打。母亲1951年5月3日的日记里也记载：说我顽皮粗野，姑姑把我惯得很不像话，于是她和父亲狠狠打过我两回。父亲抽耳光是抡圆了胳膊抽，打屁股的手也很重。

我小学4年级11岁时，一次家里去看表演。本来说好让我去，后来又不让我去了。父母走出门后，我在保姆面前哭了。父亲可能忘了什么东西，返回家来拿。看见我哭，上来就猛抽我一耳光。还有一年春节，二叔带着女儿来北京过年。大年初一吃饭时，可能是我迫不及待，抢先动了筷子。父亲发怒，当着全家面，抬手抽了我一个嘴巴。50多年后的2014年春节，见到了二叔的女儿，她还记得这次抽我脸，认为父亲对孩子太粗暴。

所以，我对父亲亲热不起来。他对我没感情，我对他也没感情。叫“爸爸”非常勉强，尽量不叫他。平常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害怕至极。一到寒暑假，父母嫌我在家淘气，总要送我回河北农村老家。在奶奶姑姑那里才能尽情享受到亲情的温馨。所以每次从老家回到北京都大哭一场。怀念老家的亲人，他们真诚关心我，待见我。老家农村吃的，住的，卫生条件都土里土气，远不如父母家好，但老家人是用全部心意对待我，把我当回事。不像在北京家中，跟寄人篱下一样，被忽视，被冷遇。

自上华北小学住宿后，周六放学回家，除母亲和哥哥姐姐外，不记得父亲接过我。学校开家长会，他从来不去。总让在全国供销总社看大门的姑父代表他参加。困难时期，回家吃饭也要交粮票，还吃不饱，有时候母亲会偷偷给我点吃的。父亲从来没有，并给保姆下死命令，不交粮票不给饭吃。记忆中，父亲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初一时，他曾送给我两根深绿色的绘图铅笔。平时他从不给我东西，这两根绘图铅笔竟让我感激得眼泪差点流出来，立刻就把自己刚买的一本《中国分省地图册》交给母亲，托母亲转送给他。但这种事很罕见。往往一顿训斥，一顿瞪眼，就把我对他少有的一点感激之情转化为痛恨。

1963年底，我很想在初中毕业前入团，就写了个申请书。在交给班团支书时，用小刀割破左手中指，将血洒在申请书上。之后没去卫生室包扎，把手放进左裤口袋，回到家后血把左裤腿都浸透了。不料父母得知我是为申请入团，割破手指，都大发雷霆。父亲说只有旧社会闯江湖的那些人才爱动刀子，写血书，越骂越生气，开始抽我耳光，并用大皮鞋踢我。我万万没想到为申请入团表决心竟会这么挨打。当年十分区根据地有个开明绅士为表抗战到底的决心曾把小手指头剁下来亲手交给父亲，他还表扬过这人。很多革命烈士都在狱中写过血书，何错之有？我这么做也不是干坏事，他凭什么拳打脚踢我？

当时我16岁，挨打时首次愤怒地瞪着他，一声不吭。打完后，回到自己的屋当即把父母的合

影照片撕成碎片。还不解气，我决定给周总理写信，因为父亲的委任状上是周总理签名。流着泪控诉了父亲对我的拳打脚踢，说他在家里实行法西斯专政，是个暴君，根本不配当大学校长！

父亲从那以后再没打过我，可跟我感情上的隔膜更深了。1965年，父亲去山西长治地区四清，发给他一个军棉袄。1966年他回北京后，母亲开始说要把军棉袄给我。我高兴极了。那时候，中学生最梦寐以求的衣服就是军装。可最后，父亲却送给了朋友的孩子。理由是给我穿，会助长我的特殊化思想，容易有高人一等的意识——难道送给朋友的小孩穿军棉袄，他就不特殊化了吗？父亲明明知道我喜欢军装却故意不给我，自然令我对他心生怨恨。

文革开始后他受到批判，处境不好，我无动于衷，甚至有些幸灾乐祸。认为他官气十足，在家里称王称霸，该炮轰炮轰他了。后来北京红卫兵有一小股去越南打仗的风气。我也动了心，并在1967年4月打砸抢了自己家，抢了几百元钱，企图一去不复返地上前线抗美援越，宁肯战死疆场，也不再回这个家。当时真的想“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了。因为对这个家一点不留恋，感觉不到一点点温暖。甚至后来还派同学去北师大贴他的大字报，揭露他把邓拓的题词挂在房上，在家里烧毁了很多材料，毁灭罪证等……我这么干是多年来对父亲极度不满的总爆发。

父亲自然愤怒。我下乡内蒙古后，被兵团打成现行反革命，他不理不睬。多亏母亲帮我才脱离了被专政的苦海。

1976年初，我从内蒙古调到大同。在北京住了一段，来到大同后发现自己写的下乡经历手稿丢失，马上猜到是父亲偷走了。写信向他索要，并警告他不要烧毁，否则一切后果由他负责。他的回答是跟我断绝一切关系。当时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他生怕我写东西连累了他。不但偷走我的书稿，还跟我断绝来往，并还写信给大同的高万章叔叔，批评他对我太好，不利于我成长……结果，在草原后期结识的女友随之离我而去。在陌生的大同矿山机械厂，那段举目无亲，无家可归的日子，永远刻骨铭心。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在母亲劝说下，父亲与我恢复了来往，他万万没想到我能考上北大，看我像看怪物一样。一次闲聊时，趁他高兴，我对他说：你要对我好，我绝不会在文革中打砸抢你。他听后勃然大怒，反问：我们从小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帮你摘帽子，给你调回内地，哪点对你不好了？你打砸抢我，我还照样给你生活费。你有良心没有？说你是“内奸”、“白眼狼”一点不冤枉！忘恩负义，过河就拆桥……

不久，因为抓魏京生的问题，民主墙的问题，我跟他争辩起来，父亲再次跟我断绝关系。姐夫当时给我介绍了个文化部的女翻译，他逼姐夫告诉那女翻译，我是个危险分子，劝她不要与我来往。在北大上学期间，一到寒暑假时，外地和北京同学全回家了。32楼学生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人，饱尝了“丧家之犬”的滋味。

晚年，父亲跟我的关系缓和一些。逢年过节，他会把人家送给他的吃不了的糕点杂粮等，送给我一些，尽管有的都发了霉，长了毛，也是老人家的一片心意。但平时我和他仍然来往不多，刻意保持距离。因为接近他多了，待他热情一点，他就怀疑对他别有所图，想求他办事，会突然变脸。

二、父亲的历史

1985年8月30日父亲去世。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没掉一滴眼泪，只戴了会儿黑纱，告别式结束后，立刻摘掉。

目睹参加遗体告别的那么多人都为他哭泣，让我震惊和困惑不解。如此冷酷无情的人，怎么还有人为他流泪？尤其是那么多当年北师大的学生，都对“马校长”赞不绝口，有的甚至失声痛哭。这才明白，我只了解父亲在家中的情况，他工作的情况，在单位的情况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直到父亲去世30年后的现在，仔细看了他的简历，才对他有些大概的了解。

他1911年6月1日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故城村一个贫农家庭。他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为了让孩子有出息，从1925年到1927年，全家省吃俭用供他上了深泽县城厢小学。

1926年底在深泽县上高小时，经教师王肇兴

介绍参加了共青团。

1927年入保定同仁中学，因为好给老师提些难题，还在墙报上张贴过对现实不满的文章，于1929年5月被学校开除。

1929年下半年父亲又到保定景仁中学读书，寒假时正赶上保定第二师范学生闹学运，他在全校大会上讲话声援二师，又被景仁中学开除。

1930年他随同保定市委书记魏十篇去河南浚县教书，并转入共产党。后来，他以保定特委特派员身份来到宛平县工作。公开职业是小学老师，发展过数位党员。其中就有后来帮我调到大同的高万章叔叔。1976年春我在大同见到高叔叔时，他已六十多岁，称父亲一口一个“马老师”，毕恭毕敬。

“七七事变”后，父亲回到老家河北省深泽县，从事抗日活动，曾担任安国县委书记，霸县县长，第一联合县县长，十分区专署秘书主任，十分区抗联主任。

《霸州人民革命史》记载了父亲反对靳国梁叛变的一段往事。县大队靳国梁叛变，扣押马建民等县里领导。马建民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以民族气节教育叛变人员中的郭凤来，促其幡然悔悟，悬崖勒马。叛徒靳国梁只带10多个亲信叛变投敌。马建民劝服叛变部队放弃叛变归队的事情，至今还在霸县流传。

另外，马建民巧施战术，化险为夷的冯家村突围战，距今已有48年，仍为当年参战者津津乐道，群众也赞不绝口。

三、实事求是

尽管文革后，父亲调到社科院，离开了北师大，但父亲百年时，北师大仍然召开了马建民百年座谈会。多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都讲话，说父亲为人老实厚道，没有架子。有位老师还说：当年他结婚后没房子，父亲就把他中午休息的一个单元房让给了他，令他十分感动。

为纪念父亲百年，北师大还专门给他出了本小册子《稳健务实的公仆马建民同志》，介绍了他的一生。现摘引书中的一些描述：

马建民是个少言寡语之人，更少长篇大论。由他主持的会议上，几乎没说过浮夸话。他要说就说大实话，言简意赅，句句在理。比如1959年10月24日，在常委会上讨论工作时，针对有人高谈阔论，他脱口而出：“不要吹牛，力戒浮夸，否则起反作用。”这正是彭德怀被罢免后不久，彭德怀夫人，校党委副书记浦安修刚刚检讨了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和彭德怀的认识，余音犹在。

马建民主张大胆使用右派。在学校会议上，他曾多次提醒大家说：“我校现有56名右派，很有潜力。理科右派能不能教课？我们忙乱不堪，他们却无事可做。”他又举了数学家、一级教授、师大原副校长傅种孙为例说：“傅种孙可否教课？有人怕他教得好，盖过党员，会影响党的威信。这样顾虑对不对？”

他还说：“朱启贤可以教逻辑，李庭骏可以教化学……他们比刚毕业的新教师好得多。”

1961年8月23日在常委会上，马建民提议让陈景磐做中国教育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湘做外国教育史教研室主任，并说就是挂名也可以。他实在不忍让这两位著名学者被闲置不用。

1962年7月学校党委开始研究为一批右派分子摘帽。马建民每次都积极推动。他曾说：“傅种孙一心想把师大搞好，可以摘，也有影响，尤其在数学界有大影响。”

后来，学校多次为政治运动受到批判的师生员工甄别，马建民都很积极。

对曾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学生，马建民说：“学生被批判为白专的，这次留校干部也可以留下几个。这样影响好……要善于与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否则容易僵化。过去念书多的不是白专。”

1965年下半年，马建民带队到山西四清。当评选四清先进分子时，有人将上海女同学能多日不洗头发，不洗澡，甚至生了虱子也作为先进事迹上报。马建民纠正说：我们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应该是思想上的三同，更靠近他们，而不是与他们的不讲卫生三同。

天文系是北师大唯一的非师范系。1967年夏，该系同学也与其他师范专业一样分配了，严重浪费了人才。天文系老师向马建民反映了这个问题。马建民说：“我陪你们去找科学院的秘书长秦力生同志，他是我的老战友。”于是陪同天文系同志找到了秦力生，对方马上表示：“今后我

马建民晚年搜集整理中国农民起义资料

们接收北师大的天文系毕业生。”问题得以圆满解决。现在很多当年毕业生都成了我国各天文台的骨干和专家。

1959年，北师大党委宣传部长张刚因为给肃反中遭到错误批判的同志赔礼道歉，而受到党内处分。马建民仍一如既往，对张刚很信任，支持她的工作。现在，张刚已经是耄耋老者，回忆起这段往事，仍很激动。

上世纪60年代，家中的保姆，是抗战时期的堡垒户，多次掩护八路军，可土改时仍被划为富农，解放后境况很差。马建民就将她接到家，一方面帮自己料理家务，一方面解决了堡垒户的生活困难。

一次马建民去青岛开会数日。其间，正赶上爱人杨沫心脏病发作。蒋秘书立即从学校派车送她看病。当马建民从青岛回来时，感谢之余还追问派车付钱了没有。直到问明情况，补交了车费。

困难时期，学校按规定分给马建民一些生物园地自产的农产品。他表示不要：“我要和广大教职工一样的待遇。”那时，他也营养不良，腿部浮肿。

小册子上写的有些事，我头一次听说。真没料到父亲在北师大的口碑那么好。难怪他去世后，那么多人给他送行，有人还哇哇痛哭。

四、淡泊名利地位

据秘书蒋雪娇回忆：1958年11月21日，马建民第一天来北师大上班。为迎接他，自己提前10分钟到了办公室，见马校长已经提着暖水瓶去打水。蒋秘书说：“有工友打开水。”他说：“我好手好脚的，干嘛要人伺候。”

当天晚上党委会结束后，蒋秘书通知司机班来车送他。他说：“我是骑车来的，还骑车回去。”

母亲在1951年10月19日日记中也说：父亲兼了新闻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后，秘书处长告诉他有一辆车可供他上下班和工作使用，但他表示还是骑自行车方便。到北师大后，蒋秘书说学校也为他配了车，仍旧谢绝。只有去上级单位或外单位开会才用，平常总骑车上下班。那年参加师大女附中的庆典活动，他也骑自行车去。他曾对老战友说：“骑车可以节省汽油，又可以锻炼身体。”无论严冬酷暑、刮风下雨，他都在北京拥挤的自行车群中上下班。

当年在十分区根据地，父亲的名气远比母亲大，雄县、霸县、文安一带很多老百姓都知道马建民。母亲的小说和电影《青春之歌》发表和上映后，轰动全国，母亲的名气压倒了父亲。当有人询问父亲，《青春之歌》里面的江华是否是他时，他总微笑着说：“不是，不是，那是艺术作品，是集中了几个人的事迹于一身的。”那时候，各界人士，包括记者、演员、大学生纷至沓来，或采访或拜见或邀请母亲参加活动。父亲力劝母亲：一律不要接受采访和外出讲话。但母亲没有接受。以后所有邀请采访母亲的活动，父亲概不参加。他没有因为母亲出名，而挤在母亲身边，跟着去出头露面。

天津聚集了很多冀中工作过的老干部。1960年代初，百花文艺出版社曾来信约请父亲撰写回忆录。他平静地对蒋秘书说“你就以我的口吻写一封谢绝信吧。”

据秘书蒋雪姣回忆，马建民家的生活非常平民化，屋内陈设简单普通。保姆曾对她说，马校长每天只给她一元钱买菜。

家里所有孩子都说他小气抠门。他和母亲的钱分得清清楚楚。家里手纸从来不买，都让母亲买。母亲经常埋怨他吝啬，跟葛朗台一样。保姆患病，求他预支一个月工资也不给。我在内蒙古草原上，被专政多年，衣服褴褛，写信请他给买

件涤卡上衣。他回信一笔笔算账，说他负担很重，实在没力量给我买涤卡衣服。连队里很多平民子弟都穿上了涤卡衣服，我却穿不上。

可是，他对外人却挺大方。老战友，深泽老乡武光在文革中被新疆造反派定为走资派和叛徒，处境凄惨，1967年秋在好心人帮助下，逃到北京，躲在航空学院。因停发工资，生活极其困难。父亲曾冒着危险两次去北航看望武光，并送钱给武光。后来这成为父亲的一大罪状，被迫一次次检讨认罪。抠门的父亲能为战友慷慨解囊，让我万万没有想到。

他给保定的一个老部下，不知名的小干部又寄钱又寄东西，令家人无法理解。

他工资很大部分是买书，然后一一送给老战友，高叔叔就经常收到父亲寄去的书。

父亲对当官也不那么热衷。上世纪50年代曾要调他到山东省当文教书记。他竟婉拒，不想离开北京。结果就调到北师大当副校长。文革后，一提起这事他就沾沾自喜，认为自己躲过一劫。他心有余悸地对母亲说文革中各省的文教书记哪个有好下场，全被打倒，有的还丢了性命！我要去了，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他到北师大后，最初曾主持全面工作，后被中宣部调去的程今吾取代，他坦然接受。北师大的教职员工比较同情他，感觉他有点受排挤，因此文革初期还一度把他结合进革委会。直到江青说深泽有个叛徒窝，他才被从革委会里揪出来。

他不喜欢摆谱，不显山露水。解放初期，单位给家里派了警卫员，他主动退掉，认为和平年代不需要。我填表时，出身不让我填革命干部，非让我填革命职员。我没听他的，因为同学们都填革干，没有填革命职员的。回深泽老家时，他低调不张扬，从不惊动县里。老家亲戚受了欺负，向他诉苦，他绝不利用河北省里的关系报复对方。

五、他是农民的儿子

父亲在家里一切他说了算。父道尊严很重，感情粗硬，缺少小资情调，过日子极端节俭。保姆买菜要记账，周周要向他报账。墩布条都快掉光了，也不扔，把我的破裤子撕成条绑上再用。所有家具都又破又旧，舍不得买新的。个人卫生也不大讲究，很少洗澡。他有保存资料的好习惯。家里收到的所有信件、请柬、各种说明书、文艺表演节目单等全都留着，连我在托儿所的体检表，中学的成绩单都没扔掉。

逢年过节，他会抽根烟，喝点葡萄酒，平时烟酒不沾。也不爱运动，从不锻炼，特别反对哥哥练武术，认为不像个读书人，野蛮。喜欢看历史书，文革靠边站后，他醉心搜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资料。抄写的材料有一麻袋。以后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当党委书记，业余时间依旧干这事，干得特别投入。可惜大方向没搞准，花了许多年，付出了很大精力，最后也没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他来自农村，有很多农村朋友。最值一提的是他帮助雄县农民王新翻案。1985年春，当得知上过《吕正操回忆录》，抗战时期就把自己土地捐出的开明绅士王新解放后仍被定成地主，判处死缓，1960年饿死狱中后，他非常震惊和惋惜，开始为王新写信呼吁，还四处奔走找人。同年8月因心脏病突发，骤然去世，没有完成。此后母亲继续为这人呼吁，经过老战友刘秉彦的过问，最终给平了反。

他迷信73、84没有病，阎王爷也要招你走的说法。1984年春节，他73岁了，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曾流着泪给每个孩子200元钱，希望大家帮他度过这个坎儿。从小到大，这是他第一次过

1964年底，作者最后一次与父亲马建民的合影

年给孩子红包，我感动得几乎一夜没睡觉。当时200元是很大的一笔钱。

六、父亲的恩惠

在兵团，我能最终摘掉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是靠他的关系，才把母亲的信递交到总理办公室；我能离开内蒙古兵团，也是靠他的关系，大同的高万章叔叔全力帮忙；而前女友韦小立能分到北京也是靠他铁道部的关系高万秋叔叔；他去世后，北师大也是看在他的面子，给母亲分了房子，让我一直住到现在……所以不管怎么说，人生几个关键大事上，都沾了父亲的好处。岁月悠悠，别人可能都忘了，我却无法忘记。一想起这些心情就异常复杂，百感交集。所以，近两年来，一直琢磨着给父亲写篇文章。

有人说：对自己亲人都不好的人，不会对外人好。可父亲的表现却证明这个说法不成立，不是事实。他对孩子冷冷冰冰，一毛不拔，可是他对外人却特别好，真诚相待，谦虚礼貌。因此1985年他去世后，才有那么多人为他送行。据我所知，很多老干部都这样。自己孩子的事不管，却管别人家孩子的事。对自己的亲人冷冷淡淡，对外人却热情似火。

父亲为何在外面慈祥和蔼，彬彬有礼，在家里却这么专断粗暴，冷酷无情呢？私下，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在单位，在大街上，在商店，对所有人都笑脸相迎，哪怕是对看门的、送煤的、居委会的等地位比他低很多的人，也极客气。那些被他这么对待的人自然很感动，我却觉得他这谦卑相是装扮出来的，很可怜，亦很虚伪。由于他在单位上、社会上处处谦让，经常带着假面具，压抑自己，身心疲惫，不胜重负，所以回家后才摘下假面具，不再伪装，经常拿家人撒气。久而久之，父亲跟家人的关系都不好，越发对外人好。他或许觉得，对孩子好，孩子不感谢他，以为是应该的。而对外人好，外人会对他敬重和感激涕零。他从家里得不到温暖，从外人那里能得到。所以对外人热，对家人冷。

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生活凶险，很多干部在外面夹着尾巴做人，极度压抑，回到家就把孩子当成了出气筒，滥施暴力。这种在外面一个面孔，在家里一个面孔的干部绝不止我父亲一个。何况当时全社会都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儿女情长”成为贬义词。对同志和群众热情关心会受到表扬，而对老婆孩子热情关心非但没人表扬，还会给人以觉悟不高的印象。更何况，战争年代，女同志为防备敌人发现，在地道里捂死亲生小孩的举动依旧被广泛宣传和大力赞扬，以至于走到极端，似乎对自己孩子越冷酷越革命……

几十年后的现在，似乎理解了父亲为何对我割破手指表决心那么反感。由于抗战期间那位雄县开明绅士剁下自己小手指送给父亲，虽然得到首长好评（吕正操、旷伏兆的回忆录中均提过此事），但父亲内心深处却受了刺激，不赞成这种自残行为，所以才对我割破手指的举动那么气愤。

父亲在家中唯我独尊，专横霸道，狠狠打我不对；我年轻气盛，睚眦必报，贴大字报狠狠揭发他也过分。现在，父亲已经走了30年，岁月冲淡了过去的所有伤痕。每年清明我会到八宝山去看看他，擦拭一下他骨灰盒上面的灰尘。■

（作者为作家，本名马波）

（责任编辑　丁　东）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合订本为简装（上、下册）两册，定价140元。另：

2012年合订本为简装（上、下册）两册，定价120元；2013年合订本为简装（上、下册）两册，定价120元。

咨询电话：010-68532048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通过以下方式购买。

淘　宝　网：http://yhcqwd.taobao.com/

支付宝账号：13611159388

微　信　号：yhcqwx

邮政汇款：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政编码：102488

联系人：崔秀岭　　电话：010—60342528

手　　机：13611159388

一个农民与人民公社的较量

○　陈大斌

这位农民叫刘庆兰。他是安徽省原宿县褚栏公社(现宿州市褚兰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却有一番极不平凡的经历。正是这番经历让他的命运与安徽的"责任田"的历史紧紧连在了一起。

1961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在全省农村推行"责任田",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主持起草省委文件《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这是"责任田"最早的名称——引者注)的意见》时,特意在文件里突出写明刘庆兰的重要作用。文件的开头这样写道:"一、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文件列出三条理由,其首要一条就是:"宿县一位老农的建议。"文件说,"他向我们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种,统一分配,不然不少社员混工,没有责任心,生产搞不好"。

一个老农民的建议写进了省委文件,成为推行一项重大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是罕见的。从这里也可看到这位"宿县老农"的实践对安徽实行责任田起到了多么重要的推动作用。

"宿县老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刘庆兰是一个老年农民,却也是一个敢做敢为的血性汉子。

褚栏是宿县最北的一个公社,沿着皖苏两省边界有一列东西走向的低矮山丘,其中有一座叫虎山,海拔只有150多米,刘庆兰所在的小王庄就在虎山脚下。虎山上乱石荒草丛中杂有一片片的零星的"鸡窝土",土层很薄,又没有水源,只有在多灾之年,有些少地无地之人才上山开垦这些小片山荒种些小杂粮。

刘庆兰出生于当地农家。他勤劳能干,发家致富的梦想火热,除种地外,还经营磨芝麻香油等副业。在有些人看来,他不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但又举不出早年间他有什么不良表现。乡亲们知道的只是他年轻时曾在旧军队里当了几年兵,但回村几十年就一直种地为生,只是社会阅历比一般人广。他说,"我这个人经过了三个朝代——清朝、民国、新中国,当过日本的亡国奴,旧社会啥滋味都尝过。我知道只有共产党掌天下,才有庄稼人过的日子。"

离开集体,私自上山开荒,自食其力,这是刘庆兰传奇故事的核心内容。这也正是有些人说他"不务正业"、"品质不好"的根据。从农业合作化兴起之后,加入集体经济组织还是想个人发家致富,成了评价每个农民是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顽固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甚至是一个好人或坏人、敌人的主要根据。刘庆兰从旧社会走来,年过半百时迎来新中国的阳光。经过对比,他看到新中国社会安定、万象更新,是一个有奔头的好世道,他的心上升起勤劳致富的希望。这是一个热爱新中国,劳动生产积极,精明能干,有个性,有着强烈发家梦想的农民。对新出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心存疑虑。这是很正常的。

1956年,冯楼村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的土地、牲畜、大农具都归公了。刘庆兰被群众运动裹胁进了高级社,但是实现了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合作社的弊端暴露出来:他自己亲手喂养的膘肥体壮的牲畜,交给合作社后日见瘦弱;许多农户把积攒的肥料拼命往自留地里拉,社里的庄稼淹没在草丛里却没人去锄,收到场上的粮食有人往自己家里偷。刘庆兰提意见不被接受,干部们反说他"多管闲事"。他深感失望,逐渐看清了这样的"大呼隆",不是种庄稼的正道。他更感到自己入了高级社,失去了土地,赤手空拳,一无所有,有力气没处使。完全受制于合作社,有志难酬。合作化彻底堵死了他勤劳致富的道路。于是他横下心来,另寻出路,毅然决然离开家庭及高级社,独自一人上虎山开荒去

了。家人及一些乡亲为他担心，他却信心满满，说我就不信离了合作社就能饿死！

他的次子刘志立怎么也上了山？刘志立说：“我原来在蚌埠一家制革厂当工人，因染上肺结核病被辞退了。高级社时回村当了会计，不下田干重活。1958年‘大跃进’中我被派往水利工地，白天黑夜干挖土抬土等重活，肺结核病迅速恶化，身体很快垮了。当时社员吃大食堂，有人说‘队里不能养这样的闲人，要是再不下地干活，大食堂就不给他饭吃’。好心的干部指点我：‘上山跟你大大（即父亲）去吧，给你大大当个帮手，也省了俺队干部的一份心思。’我无路可走，就这样被‘逼上梁山’。”

虎山不是世外桃源。刘庆兰刚上山就有人说他是对抗合作化，上山“单干”去了！要求把他弄下山来。但合作社的干部并不太看重这件事，就推说他已过60岁（按当地民间算法，这年他虚岁60），不算社员了，合作社管不了他。“大跃进”、公社化一起，农村形势更“左”，刘庆兰开荒也有了收获，有些人眼红起来，说大小队干部受了刘家的好处，包庇纵容他。但社队干部们还是没有强制他下山，只是提出让他给队里交点粮食，堵住众人的嘴。刘庆兰欣然接受。交了粮食继续在山上“单干”。说到底，若没有当地社队的宽容，也难有刘庆兰在虎山上的传奇经历。

虎山上的奇迹

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在荒山上开荒种地，自食其力，日子必定是非常艰辛的。我没能亲见刘庆兰老人在山上的生活。所幸当年与其父一起山上劳作的刘志立还健在，他带着我们上了虎山，察看当年开荒的现场，向我们讲述他们父子俩的艰苦经历。

刘志立说，我上山时我父亲夜间还住在山下家里，天天早出晚归，中午饭带着馍馍和一壶凉水在山上吃，日子过得又累又苦。我上山后就决心在山上搭个住处，安营扎寨。我们就地取材，用石块石板垒墙，再从山下拉了些秫秸和麦秸铺上顶，盖起了两间小窝棚，就在山上安下了家。但山上没水，就每天下山去挑，挑一趟来去要跑上六里山路。下雨天就用盆子接雨水吃，下雪天就铲雪化水吃用。我们还把一盘小石磨拉上山，下雨天不能下地，我就抱磨棍一转一转地推，把粮食磨成面，麸皮留着喂鸡。我们还养着一大群鸡、几只羊。

刘志立说，那十几亩地，全是一抓钩一抓钩地刨出来的。开垦荒地主要用冬季农闲时间。冬天里天短夜长，有月亮的夜间也干。山上风大天寒，手冻肿了，脚冻裂了，也不停工。夜间刨地，獾子、黄鼠狼在我面前窜跳。那几年我们爷俩只有这些小动物来作伴了。

头两年，刘庆兰凭一双手养活了自己。1958年父子协力，开荒地达到十亩，收获自给有余，并能拿出一些粮食交给生产队。刘志立的肺结核病也因在山上空气清新，劳逸适度，又有饱饭吃，一两年后不治自愈，身体日益强壮。1961年5月中共宿县县委的调查材料详细记录了1958年后，刘庆兰父子在山上垦荒的收获情况及向集体上交粮物的具体数字：

1958年：开荒种地十亩，收获粮食2184斤，扣除口粮种子1400斤外，向生产队交粮734斤，另外还有12元卖菜钱。

1959年：开荒地增加到15亩，收获粮食2400斤，交给大队粮食900斤，棉花60斤；

1960年：开荒地增加到16亩，收获粮食3000斤，交大队粮食1473斤，棉花65斤，芝麻17斤，还有现金60元，羊一只；

1961年：开荒地增加到17亩，预计可收获粮食3000斤。

刘家父子在荒山上取得这样好的收成，可谓是一个奇迹！当然，这项奇迹的意义远远不只是收获这些粮食。不管刘庆兰父子是否意识得到，其实他们在虎山上的做法正是一种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雏形：虽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却拥有土地使用、生产、经营及产品处置等方面的自主权，从根本上避免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大呼隆”劳动，“大锅饭”平均主义分配的弊端，刘家父子可以使用的土地有限，但他们有了完全的自主权，个人、家庭的生产主动性得到充分发挥，生产上便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种生产经营方式与后来安徽全省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责任田”大体相同。所以不少学者都说宿县虎山是安徽“责任田”的滥觞之地；“宿县老

农”刘庆兰是“责任田”的开创者。刘庆兰在虎山上的实践告诉所有的人，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是废止“大呼隆”，让农民直接经营土地。

一场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大竞赛

刘庆兰父子的艰苦劳作及创造，终于引起全社会的关注。1960年深秋时节，褚栏公社党委副书记周立德等来到北部社队检查秋收秋种，上了虎山。过去，他曾听说有人反映刘庆兰在山上“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今天实地一看，刘庆兰父子在荒山上经酷暑寒冬，风餐露宿，艰辛劳作，用自己的双手开垦出十多亩地，而且每块地都种得精细，各种庄稼都管理得很好。对比一下山下的生产队，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心说，这样自食其力，为社会创造财富，怎么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周立德把在虎山上的见闻报告了在公社驻点的省委纠正“五风”的工作组组长、省水利厅厅长孙韵和。孙韵和上虎山拜访刘庆兰。刘家父子的辛劳让孙韵和深受感动，他说先不管刘老汉的行为是什么“主义”，在这全省深陷粮食危机的严重时刻，这一对老弱父子却能在荒山上种出这么多粮食，这就是一件发人深思的大事！之后，他又将此情况报告了在宿县地区调研的安徽省副省长张祚荫。几天后，张祚荫专程上了虎山，看了刘庆兰开出的地，种的庄稼，喂的猪和鸡，一番深谈后连声称赞。刘庆兰也敞开心扉向张副省长进言：种地务庄稼本来就只能一家一户干，不能像现在这样大呼隆！他建议：快把地分给各户种吧！再这样“呼隆”下去，恐怕有一天连省长你也得挨饿！几句话说得张祚荫心上火辣辣的。

1961年2月初，曾希圣辞去所兼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从济南回安徽。这时，他对自己所犯错误及“左”的危害已有了认识，此番回来决心“戴罪立功”，解决安徽的严重问题。在回合肥的火车上，张祚荫向他讲了宿县老农刘庆兰的事。曾希圣听得心上腾起波澜。近年来，从安徽到山东，再从山东回到安徽，他看到农业问题十分严重，日思夜想如何走出危局。他也曾几次想到“包产到户”，但毛泽东划的那条红线横在眼前，他不敢越雷池一步。今天，宿县这位老农的行动给他的思想、感情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活生生的现实说明，只要人有主动性、积极性，哪怕是在荒山上，用最原始的生产工具，也能从土中刨出粮食！徒有“一大二公”虚名而无群众积极性的“大呼隆”，有良田沃野也搞不好生产，甚至要饿死人！在这样一个陷入危局苦苦寻找出路而不可得的严重关头，刘庆兰这个典型来到他的面前，简直就是天神相助，为他指点迷津：只要像这位老人这么干，农业生产便可迅速走出危局！这是一个经营体制问题！刘庆兰的实践让曾希圣对现行农村农业经营体制弊端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增添了越过红线去实行包产到户的勇气。于是，1961年的春天，安徽“责任田”横空出世。

其实，不管刘庆兰是有意还是无意，自他1956年登上虎山时开始，就摆开了一个大擂台，向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展开了一场大较量！五年较量的结果已经判明：自主、自觉劳动的老弱病汉赛倒了兵强马壮“大呼隆”伙干的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刘庆兰老人的故事有着深刻发人深省的内涵，当年曾希圣从这里受到激发和启示；今天，我们重温这个故事，仍然感叹不已。

结　局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1962年秋冬间，刘庆兰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当地公社下令刘家父子下山归入集体。刘庆兰坚持不下山，他说，我已是一个老迈之人，当不了社员，干不了活了。我开的地，栽下的树，全交给生产队！就让我在山上看着这些田地树木吧！公社还算宽容，收了他开的地和种植的树木，但没有逼他立即下山。可文化大革命一起，刘庆兰父子又被卷入批判斗争的漩涡，被加上“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的罪名被打倒，反复批斗。因为刘庆兰与被污为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刘少奇都姓刘，年纪也相仿。造反派说“二刘”是一对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难兄难弟”，把他们“捆在一起”批判，每开会批刘少奇，则一定揪上刘庆兰“陪斗”。一个国家主席，一个草芥小民，却被加上同样罪名，这是全国少见的一例。

但不管如何批斗，刘庆兰坚持不下山，他厌

张春桥其人

○　李海文

《张春桥狱中家书》在香港面世以后，有人被张对女儿、后代的爱而感动，认为他是一个有人性的人，充满了爱心。有些人不知道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当看到社会中的不公，误以为再发动一次文革就可以解决问题，称赞张春桥以文革思想逻辑对时政的评说，甚至集会纪念张，为他招魂。如何认识张春桥，再度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一篇文章，不可能说尽张春桥的方方面面。本文只想选取与其家庭和经历相关的视角，来透视张春桥到底是一个高蹈理想的殉道者，还是一个充满心机的实用主义者？是一个充满爱心的谆谆长者，还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弄权政客？

一

上海1967年1月，1968年4月两次发生“炮打张春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张春桥妻子文静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文静生于1916年，原名李淑芳、笔名李若文，比张春桥大一岁。1933年加入共青团，后失去组织关系。1942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在党校学习后于1943年春分配至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干事。当时张春桥也在此任干事。两人相识、相恋。当年12月8日在日军扫荡中文静被俘，经不起酷刑，半年后投敌、叛变，编入日军“宣传班”任班长，编写《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弃暗投明》《玩火自焚》等文章和节目，鼓吹“中日亲善”，并亲自讲演、演出。还参加日军的“反共同盟”，与日军中西少尉一起秘密外出散发反共传单，策反劝降其他被俘的共产党干部。[注1] 1945年6月日本投降前夕，李淑芳无处可藏，来到晋察冀投奔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他收留了李淑芳，给她改名为文静。[注2]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9月初，张春桥随报社一起进入张家口，此时编辑部恢复部长制，张任部长，将文静安排在编辑部资料科任编辑。因为李淑芳被俘、叛变在晋察冀不是秘密，很多干部都知道。但是，知道昔日的李淑芳就是今天的文静的人相对少一些。1945年12月15日他在填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制履历表》时，对爱人文静加了一个小注：

已否结婚：未。爱人姓名：文静。是否党员：是（注二）

他（她）过去负何职务：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干事

现在何处负何职务：日报社资料科编辑

（注二）是1943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1943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已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目前是个别关

恶“大呼隆”，也厌恶当时流行的胡批乱斗。他对儿子说：“我死也要死在这虎山上。我要看个水落石出，我就不信叫众人挨饿的‘大呼隆’法子能长久！”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位倔强的老人活到了这一天，终于看到了“水落石出”：1981年春天，当地实行“包干到户”，“责任田”真的又回来了！刘庆兰感叹道：闹腾了二十多年，现在总算明白过来了，把地交给农民种，这才是搞农业的正道啊！

这年秋后，刘庆兰患了重病，但仍坚持住在山上，弥留之际才被抬下山。在山下自家老屋里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与世长辞，享年83岁。根据刘庆兰的意愿，刘家把他葬在虎山之旁。

虎山肃穆无语，却脉脉有情。它见证了人世间这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责任编辑　冯立三）

系）。[注3]

他有意不写文静何时、何地参加共产党，因为到党校学习的人并不都是党员。更不写文静叛变的事实，却含糊地写“她的组织问题”，“据称”“现正解决中（目前是个别关系）”。

1947年9月21日，他填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干部调查表》时，仍然写道：

爱人的家庭情况：文静本人则是学生，17岁开始参加C.Y（共青团的代称），中间失掉过关系。1942年来解放区，在分局党校学习，后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干事。1943年反扫荡被俘。1945年6月逃出后，至今尚未恢复关系。

关于文静的历史问题，已由“被俘”增加了“逃出”。

文静的历史污点仍是张春桥的心病，在张的努力下，夫妻俩终于离开了晋察冀干部集中的华北，到了上海。1949年5月，张春桥刚到上海立足未稳，填写《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干部履历表》时写道：

“文静（李若文）现在石家庄日报任编辑，是党员，曾被俘，尚未恢复关系。”

张春桥到上海之前任石家庄日报社长，安排文静任石家庄日报任编辑并不困难。此时文静由“李淑芳”改为“李若文”，政治身份已经被他明确为“是党员”了。

1959年张春桥填写《干部履历表》时写道：

文静：党员，上海新华社记者。[注4]

1950年6月起，张春桥任新华通讯社华东分社社长、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委宣传副部长。上海分社曾经向上海市委宣传部打报告提升文静为副社长，宣传部部长杨西光将报告转到上海市委，但是没有被批准。[注5]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曾在晋察冀工作，担任过石家庄市长，是张春桥的老领导。文静的历史问题让上海市委、华东局更多的干部知道了。1959年1月张春桥进入上海市委常委，不久将文静从新华社分社调到市委办公厅，避免出头露面，又通过做调研、编简报掌握全局情况。

文革中捉叛徒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文静坐卧不安。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要长住北京，临走前对文静说：“你还（是）可以好好工作，有事可以写信给我。”给文静吃了一颗定心丸。

文静干部履历表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张春桥任革委会主任。1971年上海市委成立，张春桥任第一书记。一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张在上海当了10年的第一把手。文静先后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材料组（后改为市革委会材料组、专案办）、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络组（后改为调查研究组）工作，管过专案，抓过全市动态。她虽然没有职务，却是实际负责人，享受着相当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甚至连有的不发给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文件，由徐景贤提出，张春桥同意，也发给她。[注6]文静在康平路市委大院盛气凌人，马天水、徐景贤有事都要同她商量。[注7]

九大以后开展整党运动，其中一项内容是把有确凿证据的叛徒、特务清除出党。文静惴惴不安。张春桥要她请假休息，不参加运动。[注8]表面上文静不再担任任何工作，称病在家。实际上秉承张的旨意，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照旧将文件由专人送到家里。文静仍然过问联络组的工作，经常把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找到家里出谋划策。王洪文在主持上海市委工作时期，也常常到文静家里去，商量事宜。黄涛、朱永嘉、何秀文等人为了讨好张春桥，常常把自己起草、经张春桥批示的发言稿送给文静，请她“审阅”、“指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10月14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来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后，才停发文静的文件。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等人的主要攻击对象。由于毛泽东的表态，虽然张春桥过关了，但他知道今后还有风险。9月28日，他给文静写信说了些一语双关的话：

如果发生问题，一切从简，不要惊动什么人。弟弟们可以通知一声，但是，要他们不要到上海来，此事，应由佩英(注：张的妹妹)通知。[注9]

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垮台。1972年底，张回上海在兴国饭店和文静生活在一起，做了安排。

1973年十大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再次出手。在九大前后，周恩来曾三次写报告要求审查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注10]这在当时是唯一能打击或停止张工作的正当理由。但是他的报告石沉大海。所以张春桥敢明白地告诉文静："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文静的历史问题)打倒我。"[注11]

周恩来另辟蹊径，1973年9月陪法国总统访问上海，邓颖超同行。晚上到康平路市委领导的家串门，但是独独不进文静的家门。这个动作吓得文静心脏病发作，住了医院。

消息迅速传到北京，张春桥决定与文静离婚，托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的机会转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离婚的决定。王洪文说："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这个消息不必对外宣布。要考虑到影响。"[注12]从此张春桥再也没有回过上海。文静也从未到过北京。但是，孩子们可以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张春桥通过孩子们和文静保持来往。1976年10月当王秀珍电话找不到张春桥时，10月8日一大早向文静打听消息。[注13]可见，文静与张春桥的联系之密切。

文静不搬出康平路，明着说是对孩子们好。其实，张春桥是怕文静搬出去，落到别人手中对他不利。1969年2月，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去世。姚蓬子是叛徒，又当过国民党特务，如何安置姚文元的母亲成了难题。张春桥亲自找姚文元妻子金英谈话，说："还是把母亲接来，住在一起好，免得住在外面，被人家揪住更不好。"[注14]张春桥对文静的爱护姚文元心知肚明。1975年6月，姚文元回上海，王秀珍又问起"离婚"这件事，姚说："文静的历史不成问题了。"同年8、9月间，王洪文在中央受到批评回到上海，还单独宴请文静。[注15]

1976年5月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镇压下去后，张春桥给徐景贤写信要徐为他在上海找个"伴"。经过寻找、物色，10月6日徐景贤将一位女士的资料发到北京。人算不如天算，这天晚上张春桥被隔离审查。[注16]

二

张春桥的另一个心病是自己的党籍问题。1967年5月，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学的政工干部和政治教师陈美痕、徐嘉然、陈效宗、严中、熊自强等6名共产党员，在外调"七二一"大学党委书记时发现张春桥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宋振鼎亲自介绍张春桥参加。宋振鼎(化名吴成志)与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4、5月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发展了张春桥。后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同宋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立即解散。当然也就不承认这个组织任何成员的党籍，也包括吴仲超没有见过的张春桥。[注17]

这个组织是哪年成立的？张春桥认为是1936年成立的。1950年10月，他在填写《华东军政委人事局制职员简历表》时写道：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党年月：

1936年4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

1938年8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1939(年)2月转正。

1955年审干时，宋说此组织是1937年4、5月间成立。组织又去找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吴仲超回忆："我于1936年2月出狱到上海，不久和宋振鼎同志(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厅长)认识，当时都在找党的关系，我到1936年下半年经张执一才与党取得联系……"[注18]

张春桥看到吴仲超的证明不得不改口承认是1937年的4、5月间。在中国共产党内，1937年7月7日之前入党的是内战时期干部，之后入党的是抗战时期干部。1937年张春桥只有20岁，为了追求进步，参加了一个上级共产党不承认的党组织，并不是严重问题。但建国后审干认定张是1938年8月加入共产党。对此他一直耿

耿于怀。早在1938年1月，张春桥从济南到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就四处奔走，找到原来在上海工作过的同志，找到原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时任陕北公学专职教师周扬。然而，他们因在上海不认识张春桥而无法做证。所以张春桥一直没有解决组织问题。他弟弟张秋桥在当年3月入党，到了山东分局。这样张春桥才不得不于1938年8月入党。建国后张仍然坚持自己是内战的干部，把入党时间定在1937年4、5月间。他一方面主张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一方面为延伸自己的革命资历颇费心思。晚年给女儿写信，仍然要在自己的资历上添油加醋。

在1992年12月29日的信中回忆他与毛主席第一次谈话说："1939年初，我在陕北公学当宣传科长，他到学校做报告，事先向我调查学生的思想情况。谈了些什么，一点也不记得。当时他写了一些字，这张题词，我带到敌后，在一次扫荡中被日本人抢走了。"[注19]

当时陕北公学的校长是成仿吾，1928年入党，从德文直译《共产党宣言》，1934年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是党内有名的翻译家、理论家。副校长、党委书记是李维汉，1922年入党，1925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李维汉回忆：陕北公学于1937年9月1日开始上课，到10月学员已经有五个队，共约600人。学员不仅有小学生、也有像张春桥这样的初中毕业生，还有大学生、留学生。学期一般是3个月。11月1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学校设教务处、生活指导委员会（相当政治部）、总支委。学员分为队、分队、班。队相当于连，是教育单位，又是自治单位，每队约100到120人，由队长、指导员、助理员、副队长、队学生分会主任等组成队的领导小组，负责全队的工作。班是学习单位，每班有8－10人，文化水平有高有低，搭配编班。班长、副班长由学员选举产生。[注20]当时的队长、指导员都是由长征干部或内战时期的干部担任，副队长以下的干部由学员选举。

张春桥只是一般学员，留校也只是干事而已。

查阅李维汉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一书，1938年4月中央决定在陕西旬邑县看花宫成立陕北公学分校，由李维汉任分校校长率大部学员于5月30日离开延安迁到旬邑县看花宫。成仿吾留总校主持工作。政治部宣传科长是申光。[注21]

李维汉回忆是从1979年开始，由他口述史实，并提供调查线索，然后由协助整理的同志根据他谈话的基本内容和搜集到的有关资料，并向知情人采访整理成文，再由李维汉亲自审阅，反复修改。1986年1月出版。帮助整理抗日战争时期的有王淇、吴良珂、宋金寿等8人。王淇曾是解放战争参加共产党，人民大学党史系的教师，后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室委，现年90岁。陕公办了不到4年时间，培养了11000多名学员。[注22]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陕公学习过的学员大都是六七十岁，活跃在全国各地、各行业。所以李维汉回忆申光是宣传科长，不仅是他个人回忆的孤证，也是王淇等同志调查的结果。

文革前张春桥在干部登记表中填的是：校刊编委会宣传部长。[注23]这是一个群众自治组织职务，不是行政职务。1939年12月，张春桥担任的是华北联合大学宣传科长。[注24]这年7月陕公和鲁艺、安吴堡青训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离开陕北到了敌后晋察冀边区。

毛泽东很关心陕北公学的工作，多次到学校做报告，并题词。张春桥在延安时也听过毛泽东的报告。他和毛泽东没有单独交谈的机会，更不会得到题词。所以他在信中说"谈了些什么，一点也不记得"。至于那张题词，他说："我带到敌后，在一次扫荡中被日本人抢走了。"张春桥为了维护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形象，不惜编造历史。

三

按照共产党的审干标准，文静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张春桥的入党时间有疑点，但并不是假党员。文革是一个斗争哲学大行其道的年代，这些都成了张春桥格外忌讳的政治软肋。为了回护这些软肋，张春桥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968年4月，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4月12日，市革委会组织组有两个人看了文静的档案，同时说了几句怀疑张春桥的历史的话。张春桥大为恼火，在他的指使下，由徐景贤到组织组取走了文静的全部档案，密封在市革委会档案室。同时，王洪文派金祖敏彻底改组了市委组织

张春桥晚年和女儿张维维合影

组，把那两个人调离，设专案折磨8年之久。注25

1967年1月，上海师大近2000人举行反对张春桥的示威游行，然后调查张春桥、姚蓬子的历史，整理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过去写的文章。张春桥把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大多数负责人打成反革命分子。1967年9月4日，对2500名师生搜查、抄家，不仅翻箱倒柜，还捅破天花板，掘地3尺，折腾了13个小时。同时派记者现场采访，派专人验收，结果一无所获。张春桥大失所望，训斥："对政治材料不够重视"，要好好"吸取这个教训"。他很快领悟到材料都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要毁掉这批材料，必须整垮、整死这批同志。1970年11月，张春桥以研究政史系大批判为名召开座谈会，在会上大骂反对他的人是"豺狼虎豹"，要对他们"用椎子"，"动刀子"。并宣称："中央已经把杀人权交给我们了"，"什么红卫兵小将犯错误，这次该杀的就要杀"。在他的指使下，制造"三分钟抓一个反革命"的样板，将大批群众干部抓起来，两幢教工宿舍改为监狱一样的隔离室。重点人员关进潮湿阴暗的地下室，睡在水泥地上，有了病不准治疗。大搞逼供信，在小小隔离室装上高音喇叭，半夜三更突然播放逼供书，播放这些被关人员亲属的泣不成声的讲话录音，将人逼疯、跳楼，身亡后，被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注26

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学陈美痕、徐嘉然、陈效宗、严中、熊自强等6名共产党员1967年5月在外调时发现张春桥于1936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委员会"。他们认为像张春桥这样的人在中央文革工作会对党造成巨大的危害，7月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分别上报党中央、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在附件列出参加这个组织的名单，其中就有张春桥。于是他们被扣上"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窃取国家机密"等罪名。1967年底张春桥批示："怎么坏人揪坏人？"于是他们成为坏人。从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整风，每次运动都要把他们大整一通，一次比一次厉害，持续8年之久。

公安局曾成立一个30年代文艺黑线专案组。张春桥怕查到自己头上，下令把这个专案组的办案人员和材料全部并入市革委会专案组，由他和王少庸控制。半年后以"旧公安人员不可靠"，全部赶出专案组。一个人曾接待过交通部外调人员，按规定为他们转了一封介绍信。因外调接触到江青1934年被捕情况。王少庸下令将材料追回，将交通部的两名外调人员及这位公安和他一起工作的两位公安统统抓起来，打成五一六分子。解放初期，公安局接管一批敌伪档案和30年代的报刊。江青说公安局有她的"特别档案"。张春桥立即指使当时负责公检法的空四军第一政委王维国，集中1000人，到公安局翻箱倒柜，"清理档案"拿走涉及江青的资料50余册，查封30年代的书刊15000册，拿走张春桥、张春桥父亲、姚蓬子材料一大批。张春桥说："看档案要有控制"，"敌伪档案不一定可靠"，"登报的不一定是叛徒"。张春桥以"防扩散"为名，下令凡涉及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一不准外传，二不准扩散，三不准登记，四不准办签发手续。以"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材料"的罪名，将档案处两名处长、两名干部押送到北京长期关押，将处长王学纯折磨得下肢瘫痪，有病不让治。在场的医护人员看不下去，提出抗议。他们竟然将人抬出病房，把她拖进冰冷的房间，连续数小时逼供。将王学纯迫害致死。

张春桥直接指使王维国捏造了17件所谓"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侦察控制"的假案，把原上海市委两位书记和97名公安干警打成反革

命。一个处250多人，有137人以“侦察控制无产阶级司令部”罪名被关押，51人打成反革命。1969年初，张春桥说公安干警“反动、顽固、狡猾”，对他们就是“要突出一个狠字”，鼓吹“打人是觉悟高的表现”，“假的要当真的打”，“要像摘葡萄那样一串一串摘”。在公安系统大搞白色恐怖，刑讯逼供，大搞“疲劳战”、“车轮战”、“火线学习班”、“大兵团作战”、“夜开花”、“开刀间”，用冷水浇，热水烫，反绑吊打，直到木棍打断，铜条打弯，用“跪凳角”、“耍猴子”、“火烧胡子眉毛”、“抽筋”、“剥皮”、“坐地老虎凳”、“假枪毙”等三四十种法西斯式的刑罚。市公安局院内拷打声、惨叫声不断，周围居民都听不下去。

整人手段如此残忍，令人不寒而栗。

四

张春桥的家书会让人误认为他仅是舞文弄墨的文人，热衷于思想理论，其实，他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充满了暴力和血腥。限于篇幅，我仅举胡永年一个例子。

文革初期，上海足球队队员胡永年造反，被张春桥看中。1967年1月，全市掀起第一次反张春桥的高潮，张春桥指使胡永年四处镇压。胡永年调动人马，把在南京路刷反对张春桥大字报的红卫兵强行拖入体委大楼，进行围攻、辱骂，并拍下照片，用武力威胁他们将大字报撕下来。张春桥吹捧胡永年为：“我们的胡司令！”“我们的大炮！”1967年6月，市体委革委会成立时，张春桥亲自将原上报担任革委会主任的人拿掉，让胡永年担任上海体育革委会的主任，后来张春桥点名让胡担任市革委会委员、市文教组核心成员、市保卫组副组长，亲自委托他抓上海的“社会治安”，甚至将胡评为全市先进个人。1968年4月第二次炮打张春桥时，投桃报李，胡永年立即到体委的基层单位拍着胸脯叫喊：“张春桥我就是要死保，保定了。”他带人看地形，策划武斗方案。

1967年至1968年，胡永年在张春桥的指使下，在社会上到处插手，挑动武斗，大搞打砸抢。他把工人群众成批地捉进体委大楼，强迫他们脱去鞋袜，跪在地上，或绑在长凳、乒乓台上，胡永年带头用鞭子抽，木棍、铁棒毒打，用大刀的刀背砍劈，甚至放狼狗咬，将人打死。1968年1月胡永年召开体委系统大会，在会上，他说：“气氛不够”，带头毒打干部，许多没有任何问题的干部，有的被打成鼻青脸肿，有的被打得口腔破裂，牙齿掉了好几个，有的当场大腿被打断，有的被打倒，还跳上背部继续用脚踩，还不能看病，有的回家不久就死了。之后，体委系统打人更加肆无忌惮。他经常说这个单位的当权派不老实，要“清醒清醒”。胡永年召开现场会，他督战、动手对一名干部审讯，一边打耳光，一边要他回答问题，让他举起两手，稍微垂下来，胡永年就用烟头烫，用大头针扎。从傍晚到第二天早上，整整折磨了十几个小时。在他的现场示范后，体委系统的逼供信更加猖獗。

1969年春节体委系统揭露、批判胡永年的罪恶行径，张春桥、王洪文立即通过马、徐、王派人将这场斗争压下去。后来在“一打三反”中群众再次揭露胡永年的罪行，王秀珍却说：“上海的几个司令，胡永年还是比较好的，不要搞了吧！”再次包庇下来。

1974年毛泽东指示解放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并分配工作。张春桥极力阻止，同时下令要给一批因表现不好而被群众反下去的老造反派“落实政策”。马、徐、王按照张春桥旨意让胡永年当体委副主任，重新提上来。

张春桥授意要把胡永年拉入党内，对他的严重问题，采取“不要内查外调，不要接触本人，从现有材料中找出结论”的办法。这件事由于遭到体委系统广大党员的强烈反对，未能得逞。1975年徐景贤找胡永年密谈，当面给党票，说：“祝你早日入党”。王秀珍向胡交底：“你们这些人的组织问题，要通过在中央工作的上海领导，你们可不要着急呀。”

以上所举，不过是张春桥在台上期间的几个侧面而已。就这也足以看到他的人格并非表里如一，施政更无人性可言。后人读书，切不要被他书信集中营造的家庭温情、“革命理念”一叶障目，而忽视张春桥真实、丑陋、残酷、血腥的一面。■

注释：本文注释详见本刊网站。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丁　东）

为民请命的李景福

○ 余习广

一

李景福是四川荥经人。1957年他16岁，考入四川雅安师范学校。班主任找他谈话："学校要组织鸣放大会，班上准备让你在大会发言。"当时他很高兴，认为老师给了自己展示的机会。在鸣放会上，面对一千多名师生，他讲了几个问题：

一、我认为毛主席有个人崇拜。刚解放时，朱毛并称，四处可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现在只能挂毛主席的画像。原来可喊朱总司令万岁，现在只能喊毛主席万岁。过去宣传中国革命胜利，是无数革命先烈牺牲的结果，而今这一切都归功于毛主席领导的英明。毛主席提倡不用伟人名字命名街道、工厂，现在整个时代，命名为毛泽东时代。

二、常言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宣传只听说打胜仗，没听说过打败仗。宣传中只说好的，不说坏的，不实事求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三、现在的等级差别仍然存在。两首儿歌十分说明问题。一首是："成都到雅安，马路宽又宽，要想找军官，去到苍坪山，一要金牌子，二要大盘盘。"一首是："嫁工人，票子长，嫁农民，晒太阳，嫁干部，守空房。"

四、有些人不懂法律，执法有偏差，有些地方，发生人命，却无人过问。某某并无血债，镇反中被镇压了，不合政策。某某受诬告，被判刑七年。后来查实，被告者被释放，诬告的人却没受到处理。我叔父被判刑五年，刑期应从被关之日算起，但后来却硬要从逮捕之日算，半年就白关。

五、有人对工作不负责。荥经中学校长不顾主要工作，要老师陪他下棋，整夜不睡，造成老师上课无精打采。有人编顺口溜："唐校长，真稀奇，简直是个象棋迷，一天啥事不过问，一心只管下象棋。"某电厂，从不检修电路，电线在地上无人过问，我舅母无意中触到了电线，触电而死。

他发言45分钟，听众不时发出笑声。第三天鸣放结束，学校组织反击，对他进行批斗，大字报像雪片飞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一顶顶戴在头上，大会小会要他交待动机目的，深挖反动根源。班主任怕他自杀，白天黑夜都有人监视。其他人都像避瘟疫一样避开他。他感到极度悲哀，没想到45分钟发言，成为几十年苦难的开始。他受到的处分是：内控右派。

1958年全民动员打麻雀。捡到死鸟的学生就去请功。他没捡到一只，班主任说他思想有问题，抵制运动。接下来大炼钢铁、芦山修路、荥经烧炭。他人小力弱，不敢叫一声苦，尽最大努力也完不成任务，受到批判。无论他如何努力，总是受批判的典型。他开始产生怀疑。

二

统购统销后，粮食紧张。荥经县长陈彦荣提出"征购粮是否多了一点？"被打成右派。李景福很难过。

人民公社实行"三化"，公社为团，管理区为营，耕作队为连，小组为排，把农民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出工收工，凭连长哨子吹。上面叫种啥子，干部就让农民种啥子，农民失去生产和人身自由。

荥经是大炼钢铁的重点县。1958年10月统计，全县投入"大办钢铁"的社员占农业总劳动力38%。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被毁掉大半，方圆几十里砍伐一空，县财政花费20多万元，仅炼出6斤2两海绵铁。

1958年秋收，靠妇女、老人和娃儿收割，庄稼收不回来，许多烂在地里。浮夸虚报放"卫

星”，国家加大征购任务，食堂日渐紧张，吃饭定量，饭里加干红苕藤、玉米芯磨的粉。次年春节，食堂将谷面掺上蔬菜或野菜，搅成面糊糊汤，一天两顿，一人一汤瓢。许多食堂断粮，大饥荒就此拉开序幕。

1959年11月的一天，学校通知他家里出事，他连夜赶到家，家里房子已经拆得一干二净，只剩个露天坝。隔壁叔叔家的房子还在。叔叔饿得一身浮肿，告诉他：你妈饿死了一个星期了。临死时问她是不是给你发个电报，她却摇头说：“不要让龙生儿回来跟着受罪。”

叔叔告诉他：粮食都交了国家征购粮。人们饿得到处找吃的，吃鹅香草、牛楂口、绿耳菲、苣麻叶、蕨鸡根、蕨鸡苔、枇杷叶、树皮、泥巴。干部不准社员私自开伙。凡家里冒烟，就是“破坏公共食堂”、“反对三面红旗”，民兵冲进屋，连砸带打、罚跪、吊打、捆绑。好多人全家死绝。村上人饿死四分之一，还在继续死人。

李景福母亲终年55岁。他趴在坟头哭了半天。回雅安经过公社时，赶上反“瞒产私分”大会，正批斗一个干部。他说农民没粮食吃。主持人喝令他跪下，积极分子冲上去拳打脚踢，要他承认是造谣。那人被打倒在地，仍坚持说：“我说的是实话。”李景福极为佩服。

三

1960年8月，李景福中专毕业，背着记大过，延长两年试用期的处分，分配到宝兴县深山中的大溪小学教书。公社撤销了学校伙食团，不准私人开伙，必须到社属食堂吃饭。食堂人员克扣口粮，他很快患上浮肿病。学生大多饿得走不动路。一天，全校只到了5个人，他班上只来了一个学生。学校决定请学生回来读书。他吃力地走了三十多里山路，也喊不回一个学生。

在大溪小学半年，李景福怕饿死在这里。听说新疆招工，那边有牛羊肉吃。放假后，他踏上去新疆的路。走到兰州，剩的钱不够盘缠，只好返回四川。从广元下火车，遇到联防民兵，他没有介绍信，被抓进收容所。这里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最厉害的是不给饭吃。管理人员尽力克扣，“盲流”饿得皮包骨头、枯瘦如柴。李景福感

李景福出狱后照片

到自己将死在这里。好在第11天成都多宝寺收容总站来接人，他才死里逃生。

遣返回荥经，死人高潮过去了，但灾情还很严重。李景福开始了解荥经惨案详情，思考造成灾难的原因。

1958年冬起，荥经农民挨饿。1959年上半年政策调整，略有转机。庐山会议后，县委第一书记姚青提出“颗粒归仓”、“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死了九十九，红旗不丢手”。1959年全县粮食总产2500万斤，比上年减少3113万斤。姚青仍大吹“大丰收”，县委按总产一亿斤上报。结果，征购在1958年849万斤基础上翻番还要多，为2693万斤原粮，是实产的107.72%。全县粮食实际产量，不够交征购任务，死亡之因不言而喻。

姚青部署，实行“四边”（边黄熟、边收割、边整理、边入库）和“四就”（就地入库、就地保管、就地加工、就地供应——实际无供应）；大搞管理区间交叉收割，突击交粮，造成“下手狠，搞彻底，征干净”的局面。国家征购粮入库后，地方不得动用。全县人口饿死一半，粮仓存陈粮和新征粮共计2000多万斤。

荥经“反瞒产私分十二级台风”，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凡报产不达指标者，皆被批斗、毒打、劳改。青龙公社桂苑管理区书记季天荣，因

报产不达标，遭受批斗、毒打，饿死于劳改队。全县食堂断粮，大多数农民浮肿、干瘦，妇女子宫下垂、闭经，小儿疳积。当年荥经实际人口9.6万，1962年，继任县委书记阎桂芳在会议上说，荥经饿死5万人。史载人口减少43.7%。上千屋场和村庄灭绝人烟。县委文件称：死亡高峰期，街头、路上、河边、山坡、家户，到处可见枯瘦如柴的死尸，无力掩埋，扔进山洞、红薯窖、河滩。至今，众多荥经人不知当年亲人葬身所在，而无祖可祭。

李景福家住城关，公社化改名红色卫星人民公社，下分青仁、同心、新南、蔬菜四个耕作区，所属16个耕作队，19个公共食堂，6000多人。1959年冬开始，人口大量死亡，一直延续到1962年春荒。后解散食堂，实行生产自救，允许社员开荒度灾，情况好转。但当年冬天开展反“资本主义道路”、反“私开乱占”运动，农民粮食被搜刮一空。年底再发饥荒，持续到1963年春。1959年9月到1960年11月，城关公社减少213户，1643人。到1960年12月，死1800多人。

李景福妻为原城关公社社员。岳父4兄弟，分了4家，各家夫妻都有两个娃儿。饥荒中，大人找到的食物先让孩子，自己舍不得吃。结果8个大人都饿死，8个娃儿活下来。

四

李景福回到荥经，开始思考：造成这么大的灾难，还在高唱“三面红旗”，这是为什么？荥经死这么多人，中央知道吗？他决定，与其饿死，不如为民请命，为追求真理去死。

他开始动手写《二十四条哲学纲要》和《论腐朽》两篇文章，对“大跃进”以来的国策进行系统分析，对干部“五风”进行揭露。他发出疾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和平年代大量人口饿死，要改弦易辙，取消人民公社，分田分地，让农民单干。

他当时借住在表兄家阁楼上。一天，公安人员上门抓赌。看到《二十四条哲学纲要》和《论腐朽》，便将他抓走，关了几天又放出来，成为公安机关监管对象。

他想去省城发声。没粮票，要用粮食换；换粮票要大队开证明；外出要公社开证明，他开不出来。同学陈宗海家中6口人，饿死5口，只剩他自己。陈手很巧，会雕公章。李景福找来两块肥皂，让他帮着雕了个大队公章，盖了三张证明。李景福去换粮票。第一次换到5斤，第二次又去换，人家说公章是假的。粮票没换成。1962年5月21日，他炒了3斤豌豆背在身上，离开荥经。走到雅安时，已经天黑。22日买票到了成都，背的豌豆吃完。在盐市口下车后，到商店买了笔墨纸砚，走到盐市口，纸铺在地下，一口气写了3张大字报。

一张是五言诗：“堂堂成都地，活活饿死人。天下这样大，不能容一人”。

一张是长诗“求死颂”：“人生自古谁无一死，生生死死是自然法则。生死意义各有不同，有的有声，有的无声无息。我不甘寂寞而悄悄死去，就变成一个戴罪的奴隶。要问我有多大罪恶，只不过说了平凡真理。千百万人因饥饿死去，是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亿万人已成为奴隶，还说什么人民的权力！我要将真理公诸于世，统治者就害怕得要死。”

“我定要坚持人间正义，他们或许要将我枪毙。死，有什么可怕，只要能死得有代价。大丈夫虽不能流芳千古，也当要扬名于天下。愿将头颅抛在大庭广众里，愿以热血写就光辉史诗。愿用生命捍卫真理与正义，我愿为人民牺牲一切。”

一张是七言顺口溜，题目是“请求枪决早投胎”。

他先是在盐市口写，围观的人多起来。他担心没写完就招来警察，于是赶紧收拾好，转到青年路继续写。写完正是下班时候，围观者越来越多。他顾不得找地方贴，就地朗诵起来，大声痛诉荥经惨案的真相。

赶来的警察驱散围观人群，说李景福是神经病。关进了收容所。

李景福在成都被关了三天，雅安来接人，又关了三天，被送回荥经收容所。收容所在官田坝兰院子，李景福被关进间大屋。一天两顿只有一点米粒子的稀粥，关了两天，人都饿晕了。他怕自己饿死在这里，心想：干脆闹大点，杀身成仁，名垂青史。他天天在牢房高唱《国际歌》和《国歌》，高喊“打倒法西斯！”“人民公社饿死人！”“三面红旗杀死人民！”他认为，这样就会死得轰轰烈

烈。但无论他如何吼叫，没人理睬。

好心人将他的情况告诉了陈宗海，陈也饿得全身浮肿，吃力地走三里多路，端来一钵稀粥，一口口喂到被捆绑的李景福口里。

人身失去自由，思想不能失去自由。李景福认定，大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大炼钢铁劳民伤财，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官吏虚报浮夸，违法乱纪，农民比奴隶还惨，哪里有心干活。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搞一平二调；生产队干不干、干多干少都一样，谁还会积极干活？生产的粮食不属自己，农民失去积极性。没有粮食，只有饿死人。救国救民，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

他苦思冥想，想到从“耕者有其田，包产到户”开局。

当时他饿得病病歪歪，提出要看病。第二天，姓洪的看守押着他，到医院开了些药，打了一针葡萄糖。隔天，又遵医嘱押到医院打针，他的精神稍好一点。回来路过县委大院门口，见县委副书记乔长玄正在走廊上。李景福认定这是机会，一下子抓住乔长玄的衣角大叫：“你们讲不讲道理，若是认定我揭露饥荒有罪，要杀要剐，就弄我出来正式宣判。你们得让人民知道我是怎样死的，为什么而死。不能将我关在收容所里，把我饿死。”

乔长玄惊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给县公安局打电话。公安局派来汤股长，把他押回收容所。姓洪的看守将他一顿毒打。

三天后，汤股长来审讯，李景福寸步不让，双方谈成僵局。最后将他放回生产队。

6月13日，李景福到陈宗海家住下，又奋笔疾书写了两篇文章。

一篇是《我的政治要求和主张》，内容十四条：

一、实行集体耕种，将土地划归每户管理，分片包干负责。

二、将集体管理的土地，承包给私人，定产量征粮。在保足生产和农民口粮情况下，上交国家，若不足时，根据水灾或旱灾情况酌情减免。超过的粮食为私人所有。

三、种植按生产队统一要求。大型农具、种子，由生产队掌管，种下后，按人头平均分配管理。不同土地不同定产，每年重新划分一次。

四、允许社员占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收获归为己有，允许喂养家禽家畜。

五、开放农贸市场，允许农民将多余的产品，在市场自由买卖。

六、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将大量劳动力投入农业第一线。给人民以休养生息，农村一律免除农业税一年。

七、鼓励开荒，对生开荒地，免税三年。

八、发放粮贷、牛贷、农贷，使农村恢复生产。

九、赈济灾荒，扶持老弱，国家应保证其生存。

十、惩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私吃、私占、损公肥私。

十一、严禁违法乱纪，打人骂人，非法刑讯逼供。

十二、保障公民在宪法中享有的各种自由，鼓励人民对国家提出好的建议。

十三、开放言论自由，使人能真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十四、严禁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对于虚报浮夸者应当严惩。

另一篇是《难道我就该死么?》叙述了自己为国为民舒危解难，却被关在荥经收容所的原因和经过。

两篇文章共4000字左右，每篇抄了11份。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他走上大街，将文章张贴在县委、县政府、公安局、法院外、街头等处。警察又把他抓到公安局，关进看守所。第二天，他高唱《国际歌》，大喊“为正义去死！”第三天，管理员把他带进审讯室，告诉他：从明天起给你加粮，每日吃一斤，不许再乱吼。宣布对他拘留，管理员劝李景福：“别认为只有你才想到如何改进制度，你说的许多东西共产党早就想到了。拿一个文件去学学。”说着给了本刚下发的《四川省农村工作试行条例六十条》。他仔细读起来，其中许多条文，与他提出的十四条不谋而合。有些条文他认为不切实际，就在空白处写改进意见。1962年10月，雅安公安处通知荥经公安局，对李景福实行逮捕。12月中旬，他被押到法院。法庭宣布审理李景福现行反革命一案。起诉书称：李景福的“十四条政治要求和主张”，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1963年1月14日，宣布判处

反革命犯李景福有期徒刑十年，送雅安监狱。

五

文革刚开始，雅安监狱抓“三家村黑爪牙”，他被打成“五家店”的头，批斗60天。他不得不写检讨提纲，内容如下：

一、我以机械唯物论代替辩证唯物论，变相呼应了苏修的“三和一少”。我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就应当有全民党，全民国家。

二、我以庸俗进化论代替辩证唯物主义。我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否认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宣传了历史循环的唯心论。

三、我以“合二而一”反对“一分为二”。认为人类应当和平共处，认为一切斗争都是恶，政治运动是整人的运动。附和了苏修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

四、我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认为博爱是人类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比正确。否定阶级斗争，尤其是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同情一切运动中挨整的人。

五、我以自由主义观点，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一切专政，都会产生奴役压迫，都是对自由的妨害。我认为社会主义既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专政还有什么作用。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宣扬了无政府主义观点。

六、我主张仁者爱人，反对斗争哲学。常以《石壕吏》《长恨歌》等讽刺现实。

七、我常以“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否定一切战争，混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

八、以个人主义否定共产主义。认为个人主义是社会基础，一切人都站在自己立场看问题。

九、我常以“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和“汉高祖杀韩信”来借古讽今。为彭德怀等歌功颂德，喊冤鸣不平。

十、我认为《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不过是提醒人们注意某些教训的杂文。如果行得端、坐得正，人家并没指名道姓骂谁，怎么会认为是骂你呢。对他们的批判，是堵塞言路。

李景福先后在名山农场、苗溪茶场服刑，期满后留场就业。直到1985年，终获平反，回到荥经。考虑到他当年为农民生存发声，被安排到县财政局工作。他虽然是一个生活在基层的小人物，但他的某些观点却堪称时代的先知，在当代中国史上留下了醒目的一笔。■

（责任编辑　丁　东）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炎黄春秋》杂志合订本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全套5册）　杜导正　廖盖隆 主编

《重大决策幕后》《血荐轩辕》《历史谜案揭秘》《名流写真》《政坛高层动态》　175元　邮费 14元

购书热线：010-68532048

传真：010-68522852　电子信箱：yhcqfxb01@126.com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邮局汇款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收款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银行汇款　开户名：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账　号：01090324900120109064325　开户行：北京银行复兴支行

（更多图书请见本刊内页图书目录）

波兰转型面面观

——乌耶次、里廷斯基一席谈

○ 秦　晖　　金　雁

2014年7月23日我们在华沙议会大厦旁的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乌耶次和里廷斯基。他们二人早年都是华沙大学学生。两人原来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乌耶次出身于波兰东北部波德拉谢省农村中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学生时代经历就很坎坷，很晚才进入华沙大学物理系。里廷斯基出身于一个犹太人革命家庭，6岁那年就在国庆节上被安排给当时的波共领袖贝鲁特献花而上了电影。后来他成为共青团员，虽然比乌耶次小6岁，却与后者几乎同时进入华沙大学。1976年9月，他与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库隆、米奇尼克等创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最初的理念就是工人阶级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后来从“社会主义民主”走向了社会民主主义，成为西方社会民主党类型的群体。该组织从1970年代开始就成为“智库”，为遭到镇压的工人及其家属提供经济、法律和医疗帮助。争取民主、捍卫人权的共同底线使乌耶次和里廷斯基站到了一起。1968年三月事件后，两人都坐过大牢。里廷斯基提前出狱后无法再走学院之路，成为一个工人，当了计算机程序员。乌耶次离开大学后在国营半导体厂当了工人，后来几次遭解雇。在离开大学多年后又考上了华沙理工大学研究生，37岁时毕业成为工程师，剧变前已经干到实验室主任。

在1968年学潮时就相识的两人成为患难之友，但是两人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同，常常一见面就争论。“诤友”关系维持几十年，在那一代人中传为美谈。

乌耶次与里廷斯基都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独立自治工会运动，当时他们也的确是工人并在企业工作，但同时也是知识分子。1977年两人合作主编了民间刊物《工人》，对团结工会的筹办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也因而成为1980年“团结”的创始成员。1989年波兰终于迎来了“圆桌会议”。在1989-1993年的“团派政府”时期，乌耶次与里廷斯基都在议会与政府中工作过。乌耶次在第一次团派执政时是国会农业与农村发展委员会主席，第二次团派执政时进入政府任农业部国务秘书，为波兰农业的转轨做了不少工作。此后乌耶次仍在政府和议会中相当活跃，但已很少参加政党角逐，而是热心于农业问题。他说自己出身于农民，在城里大半辈子仍然保存了农民感情。里廷斯基先后担任过国会社会政策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为时不长。他几次讲，“掌权的手没有干净的”。尽管他讲的那些议会政治中勾心斗角之事在我们听来根本无法与别种政治下的不择手段相比，但他仍然受不了“政治的肮脏”，他更愿意作为旁观者自由地说话。这些年他发表了很多政论和时评，出了好几本书，如《波兰农民党的抗争（1945-1947）》、《团结工会模式：问题与提问》、《皇帝的新衣：主义的社会工程学》等，在波兰知识界有相当的影响。

如今，乌耶次和里廷斯基都已经是七旬左右的老人，除了共和国总统顾问这一虚职外，实际已经从政坛退出。但两位仍然思维敏捷，说话语速极快，似乎有很多内容想向我们传递。他们说，“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没有先例，我们愿意与任何人分享我们的经验”。有趣的是，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谈话中就几度当着我们的面争论起来。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和他们谈话涉及的内容很多，现选择其中的两三个问题与读者分享，我们的提问简称“问”，乌耶次简称“乌”，里廷斯基简称“里”。

秦晖采访乌耶次和里廷斯基

关于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

问：今年83岁的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舆论中评价似乎并不高，俄文网站曾以“世界的英雄，俄罗斯的弃儿”为题来形容他。更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西方在苏联培养的“第五纵队”，是为了从内部摧毁苏联。波兰人是怎么看待戈尔巴乔夫的？

乌：对戈尔巴乔夫的评议历来因其所处立场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被当做“内部殖民地”的卫星国，自然会在习惯了帝国思维的国人面前丢分。对我们来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是提高集体勇气、终结“囚禁心理”的信号，“民主化”是我们迈开政治体制改革道路的开端，只有他松绑了，我们的改革才得以启动。

苏联一直拥有对东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和控制权，导致50-60年代东欧的改革夭折。苏联对东欧政策的变化使我们可以不再重蹈1956年匈牙利人和1968年捷克人的覆辙，可以迅速大胆地干了。平心而论，波兰的民主化过程是不能忽略戈尔巴乔夫的功劳的，如果1985年在苏联上台的是另一个人，团结工会可能最后被血泊所淹没。

里：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改革派早就意识到，共产主义是“挑在苏联的刺刀上送来的”，在苏联钳制下，“使波兰选择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受到很大的限制”，苏联人“就像斧头一样悬挂在波党及其领导集团的头上”，杜布切克的遭遇时刻提醒波共领导人，对我们所允许的界限在哪里？拉科夫斯基承认，接受苏联模式是波党惨败的主要原因。苏联人一直强调是他们在援助波兰，可实际上波苏贸易协定具有不平等性质，据专家估算多年来波兰向苏联多支付30多亿卢布，加上利息数额达42亿卢布。这些信息的披露，加深了党内领导层对苏联的疏离和反感情绪，所以在波兰也发生过拆毁苏军纪念碑的行动。

在80年代末波兰团结工会罢工的时候，波共领导人像过去一样找到苏联人请求帮助，戈尔巴乔夫说，你们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吧，不用再向克里姆林宫请示汇报了。戈尔巴乔夫当时想把波兰作为一个实验室，可以通过波兰的先行试验摸索来观察，为苏联的改革积累经验。他想通过非暴力的办法解决社会主义的弊病，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引进资本主义，他只是想给社会松绑带来一定的自由，他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修复苏联僵化的体系，戈尔巴乔夫把自己的改革定性为“民主改革”，但是他并没有想到在党内利益集团的强大势力面前，拿什么来保证他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幸好他没有被苏联的保守派暗杀掉，如果是那样，历史就将改写，就不会有波兰今天的局面了。

乌：其实我们从事后的眼光看，戈尔巴乔夫仍然是共产党的思维模式，他说，我原来对共产主义是有信心的，我相信通过对这个体制的修补，能够完善它，挽救它，可以保持一个“控制下的真正联邦”，可是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太大。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他想通过改良这种制度而保存它，起码说明他知道苏联需要改革，靠专制打压、靠舆论控制那一套已经玩不转了，毕竟时代不同了。他是共产党领导层里唯一想努力改变极权状态的人物。他自信开放苏联社会他仍能把握住权力和控制改革的进程，自

信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能够经得住合法性考验的,他认为东欧“芬兰化”是一种保证西部安全更有效而不丧失道义形象的一种手段,但实际上只要不拧紧螺丝帽就控制不住了。苏共就像一台年久失修的机器早就运转不灵了。

共产党改革家自信凡是给人民好处的人会得到拥戴,从来没有想到民众会把对共产党多年积累下来的怨气撒在给他们松绑的人身上。戈尔巴乔夫感到很意外、很惊讶,他是苏联领导人当中少有的“放权派”,但是却要为前几任的暴政买单,很快在民众挑战统治者权威的不断激进紧逼下和民主派占领道德制高点状态下,他便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能力。说戈尔巴乔夫毁了苏联是不对的,毁了苏联的是在这个体制下造成的民族、经济和社会问题。原有的意识形态在他上台的时候已经失去吸引力,只不过靠强硬的专政手段硬捂住罢了。没有哪个民族永远不过民主转型这个坎,这是世界潮流。

在东欧没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叛徒,就连最传统的左派也是如此。只不过认为他的性格当中有飘忽不定的特质且做决定显得冒失,在国内的改革起步太晚,改革的资源又储备不足,缺乏处理各种政治事务的智慧,比如对待民族问题拿不出有效的策略。波兰民族梦寐以求的“去苏联化”的前提是要莫斯科改变思维方式,戈尔巴乔夫是苏共领导中唯一做到在对外政策中放弃使用武力的人。

里:俄国人由于在转轨过程中又经历帝国解体的混乱,付出的代价比我们大,对铁腕下的安定产生怀念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从这种心理自然就会觉得心慈手软的戈尔巴乔夫不适合领导国家。不过,这和戈尔巴乔夫是“叛徒”根本不是一回事。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俄国的问卷调查,说戈尔巴乔夫是“好人”的占多数,但说他作为国家统治者不够格的也是多数。这完全是两个维度的问题,好人不一定善于治国,但不善治国的都是坏人吗?我就自认不善于治国,民主政治不那么血腥残暴,但也是要玩手腕的!我干不了,我要想竞选总统,得票肯定比戈尔巴乔夫还少,但这能说明我是个坏人吗?再假设他们相信我有这本事,愣把我选上了,后来一看我真不行,不行就把我选下来嘛,也不会认定我是“叛徒”吧。

波兰统一工人党为什么要搞市场改革?

问:团结工会的政治主张和经济方针,在执政前后发生了哪些重大改变?

里:我们两个从70年代就参加了团结工会的全部过程。团结工会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用循序渐进的社会组织的方式改变制度。一开始它并不是政治组织,也没有政治行动,我们不反对政府,甚至也没有反苏联。这并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是在保护人权的基础上成立的。我们起初的想法很简单,只是为了工人免遭迫害,仅仅要求工人自治,也就是回到19世纪工人运动初期的建立自由工会的轨道上来,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实际上是在重复一百多年前西欧工人面对资方所做的事情,后来发展成有广泛动员能力的组织。印度的甘地主义以及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不合作主张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乌:在波兰,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机是团结工会,但团结工会就其本质来说,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并不排斥,因为国有制的大工业是我们存在的平台。一直到90年代初华沙工人仍然反对私有化。团结工会的初衷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当时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建设性的反对派”,我们只不过要求给工人福利、给工会权利,反对那种“党政工”一体化的“假工会”,认为它只不过是党的领导下的一级行政机构,根本不可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

团结工会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团结工会在波兰起到了一个铁锚和雨伞的作用,“铁锚”具有的定心力使改革的方向向民主化发展,“雨伞”的作用是保护个体工人免遭迫害,很快团结工会就发展到1000万人,每个单位、每个工厂都有团结工会。我们在斗争中学习民主。团结工会是一种开放、真实、信任、多元与所有人分享目标的社会自卫组织。我们的口号是“条条大路通民主”,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称放弃暴力,每个人都签名承诺并留下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在充斥谎言的社会里,我们要建立一套新的规则,坚持以理性和对话的方式解决矛盾。

里:的确,最先搞经济改革的并不是我们,而是统一工人党。苏式计划经济的体制的晃动和

自我转型始于80年代后期，波兰市场化是统一工人党搞起来的。在经济下行、福利包袱沉重的压力下，统一工人党政府搞了一些市场改革，就像智利的皮诺切特一样，想以经济自由作为保持政权的一种手段。在政治领域不放松的情况下，在经济方面先开了口子。雅鲁泽尔斯基在1987年的时候就强调，“市场不仅不会与计划经济发生矛盾，而且能帮助计划经济消除缺点和纰漏”，要把市场“当做实现社会公正原则手段的组成部分”。所以说，对公有制经济体制的最早“撼动”是波共。他们意识到冷战的生态环境特别不适应处于东西方夹缝中的东欧小国。

每一届统一工人党政府都说自己是波兰历史上最好的时候，但实际上政府的自我感觉与社会认同总是相反，官方与民间存在巨大的裂缝。纳粹占领时期地下组织的活动经验在苏式模式的钳制下同样能够发挥作用，萨米兹达特（地下刊物）已成为百姓生活当中的“第二文化”，即便是在体制内也有很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双重人格”者。

乌：在1989年以前，波兰的私营中小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已经达到28.6%，统治者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让人们忙着去发财，不要反对执政党，诱导人们以赚钱发财抵消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大家都去埋头过自己的小日子。统治者认为，原来的政治模式加上市场因素，就可以维持一党专政。

我们与经互会（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跨国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经济链条到1985年以后就开始松弛，与欧盟的经济往来增多，同年波兰与经互会的贸易额是34.8%，与欧盟的贸易额是32.1%，几乎持平。到1990年与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降到23.2%，与欧盟的贸易达到44.3%，“卢布区”解体已经在意料之中了，虽然“经互会”正式解散是在剧变以后，但是把这个摊子蹬散的并不是团结工会，而是统一工人党政府。政府在财政捉襟见肘的状况下希望通过向市场开放推卸掉一些责任。

里：一直到圆桌会议的时候，党内保守势力仍然有很多人说，波兰不需要政治和解的圆桌，“波兰需要一张摆满了丰盛大餐的圆桌”，这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有把经济搞好，使社会注意力转向，追求消费品和社会庸俗化是抵御“泛政治化”的有效手段，把人们的政治诉求引向经济领域，人们低头满足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追求，这样老百姓不会有怨言，我们就具有了合法性。

原来在一切都被统管起来得时候，人们对市场很陌生，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在统一工人党的宣传下，于是到处出现背着旅行袋、开着客货两用车倒腾买卖的人，600万的产业工人大军，在岗人数不足400万。是统一工人党帮助民众克服了对市场的恐惧，使人民的观念发生了改变。

“休克疗法”的得与失

问：当时的反对派以团结工会为主，体现成员利益共同体的工会对市场经济没有多少诉求。反而是当时的统一工人党对工人的要求提出“不找市长找市场”，用权力推动市场化。像拉科夫斯基政府、梅斯内尔政府都是想让大家接受市场经济，甚至想让格但斯克造船厂这样的大型国企破产。所以，当时统一工人党并不认为国企是一党专政的支柱，恰恰相反，他们急于卸责任以保权力，是推动市场化的。但是当时的团结工会反对派抵制这种做法，就要让政府背上包袱如牛负重，对权力无限的政府就是要无限问责，问到他负不起无限责任，也就没法坚持无限权力了。宪政民主体制是有限政府，权力有限，责任当然也必须有限，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必然的。但是如果对权力有限的政府仍然习惯于无限问责，那怎么搞市场经济？因此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剧变后团结工会领导层是如何接受市场经济去搞私有化的？团结工会是如何完成思想转变的？巴尔采罗维奇（团派政府副总理、财政部长，经济学家，波兰“休克疗法”设计者）“一揽子改革计划”是如何实施的？有些人认为“休克疗法”就像夏天的黑啤，对波兰人是先苦后甘的好东西。团结工会的尴尬在于，既要代表工人的利益，又要贯彻市场化的经济政策，这二者的关系是如何处理的呢？

里：你讲的这些道理是对的。当权者坚持垄断权力，不承认人民的这种权利，说你们只能由我代表，我会赐予你们需要的一切。既然如此，人民当然就有理由向你索要一切，因为你和人民

之间没有契约。既然你权力无限，责任为什么要有限？

但是1989年以后就不同了，现在不是争取提诉求的权利，而是已经争取到这种权利，我们据此提出具体诉求。而这些具体诉求社会各方不可能是一样的，甚至工人中也不是一样的。比如盈利企业的工人会支持股份制私有化，亏损企业的工人只要求增加国家补贴，他要那一钱不值的股份干啥？所以1990年后虽然还是有不少罢工，政府也不会镇压，但罢工多是企业性的，个别是行业性的。得到全社会支持的大罢工确实没有了。

过去对无限政府可以追究无限责任，现在对有限的民主政府就只能要求有限责任。这道理不难懂，但实际上不管用。因为工人利益受损失他就要抗议，他不管你有限责任还是无限责任。

所以，建立新制度的难度要大于摆脱旧制度，在政治方面我们已经取得成果，但经济方面仍是老观念，在经济上的创新精神要弱于争取政治民主化的主动性。至于我们是如何从反对市场走向选择市场的道路，1990年之后也就是团结工会上台的时候，我们知道，光有民主的信念是无法管理一个4000万人口的国家的，谁也不能替我们建设未来，只能靠我们自己，因此我们需要转变理念。

马佐维耶茨基（团派政府首任总理）政府初期还是主张从国家福利方面来进行改善，他在制定计划期间想找一些主张社会福利方面的经济学家来政府做官，但他们当中谁都不想承担责任——谁都明白国家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了。于是马佐维耶茨基的同事就劝说他，改走市场经济的路子。就是在这样的无奈条件下，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向市场。当时哈佛的经济学家萨克斯说，波兰必须采取快速转轨，不能慢慢走，巴尔采罗维奇提出的方案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只能采用了。当时的形势不可能坐下来分析哪种办法更好，那时没现成的“治国良方”，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且旧体制留下的漏洞是巨大的，国家这艘大船不管向左还是向右，首先必须坚决堵住漏洞不是？堵不住漏洞船都沉了，还有什么左右可言？

乌：当时波兰的经济的确非常糟糕，通胀率达到3位数，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我们的小企业，经互会瘫痪，原来的分工协作和上下游链条全部中断，原料找不到，产品卖不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关系都不存在了。只有彻底的经济改革才能挽救我们，这就是马佐维耶夫茨基政府副总理巴尔采罗维奇的“休克疗法”出台的背景。它虽然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改革措施，但取得了显著“疗效”。其后波兰经历过许多政府，既有左的也有右的，但是一个共同点就是支持这个改革方向。

里：可以说，没有人会喜欢“休克疗法”，但是又不得不去这样做。巴尔采罗维奇提供了经济转轨途径，但是他的很多预言都是错的。巴尔采罗维奇说，改革之中那些经济结构陈旧的地区失业率将一度达到40%，结果那些“锈区”（高污染低效益的老旧工业区或“夕阳产业”区，大量企业面临“关停并转”）一度失业率会达到80%。他预测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条件下仍然具有活力，结果预言落空。但是他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决定，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情。不恰当的做法并不是当时犯的，而是事后犯的。其实巴尔采罗维奇的改革比较简单，第一是兹罗提和美元的自由兑换，一步到位狂跌一阵后就稳定了，这对吸引外资很有效。有人说资本项目完全放开可能导致资本外逃和金融风险。但波兰当时金融其实已经崩溃，还说什么放开后“可能崩溃”？而且当时市场化刚起步，资本非常匮乏，外资存量很小，基本只有进来多少的问题，无所谓外逃问题。所以那时这样做正是个机会，如果那时不做，现在做的风险就大了。第二是不再提高煤炭的价格，减少国企补贴，煤矿亏本就减薪、裁员乃至破产。第三是紧缩银根，尤其给美元存贷款比较高的利息。这些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他觉得办工厂应该盈利，亏损你就别办。你现在可以批评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什么的，可是当时国家实在是没能力补贴了，不这样又能怎么办？他的改革的有效性就在于很快把通胀给压下去了，1990年1月份通胀率是80%，2月份就下降到25%，3月份就降到10%了。巴尔采罗维奇治理通胀还是有效的。有人把美元存在银行里，过了一年收入了3倍。在这个基础上，1995年的兹罗提改革对抑制通胀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问:你提到的不恰当的做法是以后犯的,具体是指什么?

里:他们的主要错误是没有考虑到团结工会的作用,巴尔采罗维奇说:“要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把一切都推给市场。但是工厂有工会,他们控制着话语权,要搞经济改革就要把工会看成伙伴关系,因为必须要和工厂谈判,先做工会的思想工作,工人的思想通了就不会阻挠改革,不去挖掘团结工会的潜在能力,调动他们来说服工人。但是他们没有时间考虑这一点,没有让工会领导层转弯,结果在经济改革中工会没有发挥任何正面作用,于是他们就开始发挥负面的作用,开始与自己的政府斗争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团结工会反对团结工会政府。

其实团结工会对私有化存在着矛盾心理,一方面我们已经意识到要降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另一方面却对公有制的制造业管理模式有依赖心理,天平向哪边与政府的态度是有关系的。政府快速展开的经济政策使工人们抵触情绪加大,反对低工资、反对下岗、反对私有化企业,这时团结工会觉得巴尔采罗维奇的改革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团结工会已经耗尽了它的历史潜能,影响已经不大了,它已经变成一个小的保守的工会了。

金雁在波兰议会两院和总统办公厅楼前

乌:对市场经济的批评主要来自社会主义者和宗教保守派。分歧的各方并没有构成对民主制度的致命威胁。这个体制有能力经得起质疑,也有能力自我纠错。

问:对立面消失后,团结工会的多元局面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分裂,私有化以后工会的力量如何体现?

里:这要看在哪个阶段?政府希望工会成为私有化的合作伙伴,可以协助私有化的进程。劳动部长雅兹古拉曾一度被人们视为英雄,他说同意私有化的每一个人都会收到比较大的股份,这个方案没有最后履行,苏霍茨卡(团派政府第四任总理)政府、以及其后的左派政府实行了股份,但是没有让他们成为合作者。

乌:其实这些股份正是波兰最大的错误。私有化企业的工人收到了15%的股份,在私有化的企业中上下层得到了一样的股份,然后以经济赎买的方式说服他们继续私有化。但是那些失业者就没有得到股份,绩效好的企业收到的利益就大,而破产企业的工人什么也没有得到,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问题。波兰曾有两首讽刺团结工会搞私有化的歌曲,一首是《永远不要相信电工》,另一首是《瓦文萨,我的一亿元钱到哪儿去了》。如果用私有化得到的钱投入社会保障中去,就会好得多,但是我们没有那样做。1993年的那场做法是有钱的人得到了好处,没有钱的人什么也没有,这样差距越来越大,工人们感觉到,我们不是白白斗争了吗?

问:波兰实现民主已经25年了,25年来波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们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遗憾的是什么?从今天的角度回顾,怎么才能做得更好,使波兰的现状可以比今天更理想。

乌:任何改变都会有赢家也有输家,关于私有化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答案,有人说取得很大的成功,有人说完全不成功。就老年人而言,波兰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思维方式的国家,希望政府多一点福利多管一些事情,需要更多的安全感,人们对平等的追求有时会抵消对自由的诉求,年轻人则更希望自由度大一点。我个人认为第一种说法要好一点,我们要在不到10年的过程中走完人家几百年的历程,出错是难免的,市

场经济有它的正反两面结果。

从客观的角度看，尤其是和前苏联国家以及华约国家相比，我们的发展是最快的，所有的生活质量参数都有明显提高。旧体制下的政治生态已经失去土壤，社会的活力迸发出来。在波兰发生最大变化的是农村，以前脏乱差野蛮的农村变成了充满活力文明的农村，已经与城市相差无几，在这里我完全是一种客观的描述。农村发生变化有很多因素，首先地方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入盟后受到欧盟的支持，使用这些资金的方式完全是透明公开的。

里：在波兰私有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谁都在谈这个话题。目前波兰有一股很强的批评私有化的潮流，说私有化是完全错误的，把国家的资产贱卖掉了。也有人说，外国资本控制了波兰的经济，我不同意这种说法，除此之外难道有别的选择吗？但是有些企业的私有化的确做得不好，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污染企业，像铜矿之类的企业。一有什么政治变化，每次改变政府都会引起争议，至今政府都没有一个正确的处理方案。

乌：在波兰比较失败的是司法改革。波兰曾是欧洲第一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五·三宪章曾是我们的骄傲。而现在我们的法律非常糟糕，缺乏专业性，监察机构不透明，这还不是指政治的影响。我们在政治干预法律方面进行重要改革，让检察院和政府脱离，法院不再听命于政府，政府不能告诉法院怎么做，但是司法独立并不成功。还有做得不好的是医疗改革，我个人觉得有一定改善，但是不尽如人意，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从个人角度谈自己的感觉。波兰的教育改革做得很好，教育投资大幅度提高，1989年只有7%的大学生，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20%，科研经费增加。中小学的水平也在提高，但遗憾的是公民教育失缺，不教如何着手建设社会，不教人们道德行为，只是从获取知识方面入手，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以为教会知识就可以解决所有的思想道德问题。

总体而言，打个比方，如果1989年对波兰经济进行考试，它可能算是最糟糕的学生，现在波兰称得上是最好的学生，它是欧洲的第六大经济实体。80%的波兰人支持加入欧盟，这是欧盟成员国入盟时出现的最高的支持率。2007–2013年波兰从欧盟中期预算中获得910亿欧元的援助，民调显示70%的波兰人对自己的生活表示满意。

问：有资料显示，波兰人均购买力1992–2002年增长达216%，从4994美元增长到10800美元，其增幅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2002-2012年又向前迈了一个台阶。

里：1989年之后人们的创业精神激发出来，到处都是背包客，人们知道大锅饭已经打破，自己不创业就没有钱，我是来自乌克兰边境一个叫海乌姆的小城市的人，那里的人们在一个大广场上售货，也有人搞批发，然后再去零售。波兰人为什么具有创业精神？统一工人党时期没有集体化，一直是个体农户这个特点也让我们具有创业精神，经常有人出国购买货物到波兰出售，也有很多中国人到这边做买卖，现在波兰有150万–300万小企业，不论任何时候他们一直很活跃，这样的小企业容易适应形势的变化。

问：我们中国也有“船小好掉头”的说法。

里：对，这也是我们没有遭受欧债危机太大影响的一个原因。

乌：在波兰由于有团结工会，尽管私有化受到抱怨，但我们确实没有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那种严重的腐败现象。有的企业破产了，有的企业改制了。华沙钢厂以前有1万人，改制以后人员减少，产钢的吨数也下降了，但由于品种优质化，产值增加了10倍。团结工会希望政府保护这些企业。实际上让企业适应市场非常重要，民主化以前我在华沙的一家半导体工厂工作，有5000工人，因为它无法适应市场，竞争不过台湾和日本的企业，只好让其破产，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厂址已经变成了一个商业广场。工人没退休的都转入商业领域，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终结了。完成了自己使命的团结工会必须要学会适应新形势，它本来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多元大联盟，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民主。在专制对手消失以后，分裂在所难免，也是正常的，一代人有一代人使命。■

（作者秦晖系清华大学教授，金雁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丁　东）

共同富裕是怎么为法西斯所利用的

○ 蒋德海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理念。但在上世纪30年代，这个美好的理念，成为纳粹欺骗和蛊惑人心的口号，并以此为基础，瓦解和粉碎了德国从康德、洪堡等思想家逐步建立起来的法治国家理念，最终将德国人民绑架到了法西斯的战车之上，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一、要共同富裕还是要不受奴役？

20世纪初的世界发达国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进行艰难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及其引发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使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面临巨大的动荡，经过一战和经济上陷入大萧条，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政治、经济和法律危机，世界为不确定性所笼罩。在这充满战争与革命、死亡与仇恨的恐怖深渊之中，经历战败耻辱和面临巨额赔偿的德国人生活尤为艰难。国家怎么办，社会向哪里去？执政14年的魏玛共和国虽然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号，但政府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相反，民主政治的无序化，导致街头冲突频发，政府没有权威，失业严重，人们食不果腹。对所有的政党来说，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而成立不久的纳粹经过武力夺权的失败后，转而关注民生。他们迎合民众强国富民的愿望，为老百姓描绘了一幅共同富裕的图画，这是纳粹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获得公众广泛支持的主要原因。

纳粹的25条党纲中，就包含了某些共同富裕的色彩。如第13条：“对所有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第14条：公众要“参与大企业的分红”，第15条“大规模扩建养老院”，第16条“立即将大百货公司充公，廉价租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在国家和各邦区在收购货物时特别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第17条“废除地租，制止一切土地投机倒把，”第20条“免费教育”等等。[注1]这些规定都或多或少地包含共富的理念，对失去工作，或工作稳定的基层群众有很大的吸引力。

此外，纳粹要打造的“民众共同体”具有平等和共富的特征，他们用它来反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强调它是消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阶层之间的对立并超越地位的障碍和以地位的差异缔造国家意志的统一。希特勒把它吹嘘为“一切有效工作的共同体，这意味着所有生活利害关系的统一。”[注2]希特勒一再声称，纳粹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而是“大众的政党”。[注3]这个大众的政党就如同大家的家，“对于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冲锋队成了一个替代性的第二家庭，制服连同上面的徽章给予了其成员以尊严。”[注4]纳粹还通过“劳工战线”组织，打破阶级区分，营造社会平等的氛围，吸引了大量的基层群众，据统计，支持者中，“40%的纳粹选民是工人，纳粹党员中40%也是工人，在冲锋队中这个比例增高至60%，在纳粹党卫军无阶级的种族精英中，也有相当多的工人代表。”[注5]纳粹争取群众的方式不仅是提高福利，而且通过增强民众的翻身解放意识来促进公众的认同。希特勒在1933年演讲时强调，“我们努力按照人的内在价值来衡量人。我们不看其外表，不看其表面，努力忘掉区分人的出身、等级、职业、财产、教育、知识、资本等东西。”“我们要进行建设，不是为了一个等级或阶级，而为了整个民族。”[注6]为了体现平等，纳粹让“团体内富人子弟和工人子弟，不分社会出身，不分家庭贫富，同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做一样的工作。”并经常举办象征性的聚餐活动，搞“一锅饭日”，不分贫富和职业，全体德意志人同吃一锅饭。[注7]

纳粹还通过福利运动来广泛地促进公众的共同富裕感。在1931年的“冬季援助”活动中，纳粹通过购买全国深海捕捞量的35%，为居民大量提供鲜鱼；在圣诞节给孩子们送来了他们的父母买不起的礼物；在“冬季援助”活动，数量大得惊人的物资

被运往全国,包括衣物、煤炭、木柴和土豆。宣传部长戈培尔甚至能够列举出免费向食不果腹、缺少娱乐的穷人分发的数亿公斤土豆和3734752张剧场门票和电影票,[注8]对穷人有求必应,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照顾、体贴他们。此外,不管什么人,只要加入纳粹的行列,便能保证天天吃饱肚皮,从此不再失业。纳粹甚至“开起了客栈,让其失业人员可以安睡饱餐,当这种安排扩展到其他人员后,就相当于为纳粹真正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做了广告。”[注9]所有这些,对当时的普通公众来说,无异有巨大的吸引力。纳粹还向失业者承诺,上台后保证复兴德国经济,消除经济危机的失业现象“我给你们以新的信心和新的希望”,保证每个人都有工作和面包,[注10]向穷人提供衣食住行。“到20年代末,许多年轻人——其中某些人是共产党员——出于其他原因也加入进来,作为失业者,他们能在这儿拿到军饷和吃的东西。”[注11]当时的德国,大多数普通德国人生活穷困,1931年,德国已经有了500多万失业者,相当于全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纳粹的承诺及其所作所为有巨大的吸引力,也是纳粹能够获得大量工人、失业者、农民与中产阶级的支持并取得政权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让人民过得好,在纳粹执政前还带有宣传和竞选的成分,那么在纳粹执政后不少东西则确实成为现实。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失业人数超过600万。上任后短短几年,德国一路跃进为成为当时的经济强国,不仅摆脱了战败国的地位,收回了大量主权,而且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仅仅三年,德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0%,国民的失业率从30%以上降到零,这个之前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国家被改造成了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

不仅如此,纳粹还通过各种社会政策促进社会的共富感受。在社会领域,“纳粹政权推出住房政策,即扩大公房建造规模,从1933年到1938年,每年大约有30万幢住宅交付使用。在分配住房时,同纳粹生育政策相配套,规定多子女家庭拥有优先权”。纳粹还推出了“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社会救济措施,强化群众的“民族公共体意义”,通过救济行为,在救济者和救援者之中唤起一种强大的共同意识。

所有这些,说纳粹兑现了竞选时所说的为德国人民实现了共同富裕的承诺没有人会怀疑。同时,随着长达1000公里高速公路的建成,各种经济奇迹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国力迅猛增强,大大提升了德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归属理念。1935年1月13日,萨尔州举行了未来归属问题的全民公决,结果以90.8%的高票率,决定回归德国。纳粹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柏林获得了1936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然而,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功,恰恰以民主的破坏为前提。对于纳粹来说,经济上的富足则是实现其法西斯的手段。除了被取缔的那些政党的忠实追随者外,大部分德国人民对反对党和工会的消失并不反对,甚至很赞成。1933年,经济的成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但正是在这一年,希特勒把大量反对党成员打入监狱,还变本加厉,取消所有的反对党,甚至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德国是一党制国家。

要富裕还是要不受奴役?对于当时的德国人来说,问题也许没有这样明显。当时仅仅是要吃饱饭,要一份工作而已。但当有人能够给你工作,并能让你尝到富裕的甜头,却要你付出自由的时候,很多人同意了。“许多德国人对新任的当权者高声喝彩,对专制政府的反抗者穷追猛打。”[注12]于是,德国人“开始时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最终都成为法西斯主义或者纳粹分子。这个运动的领袖们如此,下层的徒众们就更是如此。”[注13]但当大多数德国人最终同意选择走向奴役的时候,德国人民就失去了对于自己命运的支配权。

纳粹德国就是这样一步步绑架人民,并使第三帝国走向灭亡的。

二、纳粹践踏民主法治的特点

纳粹上台后,即采取各种手段推进法西斯独裁。为此,首先要破坏民主,并用法西斯独裁替代法治,纳粹在这方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 公然散布弥天大谎欺骗公众和世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明确提出,赢得公众支持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不断重复最简单的、最狂热的思想。[注14]纳粹的种族主义是不人道的。但既要反犹又要让老百姓相信,就只能用欺骗宣传改变民众的价值观。比如,老百姓一般不知道大屠

杀。即使他们知道一点也不相信，认为是犹太人的谣言。老百姓渴望社会公平，纳粹也宣传公平，但却缺乏把宣传和事实分开来的能力，因此看不到纳粹的“公平”是在攻击人的基本价值和所含的权利。1938年11月10日，发生了犹太会堂纵火案，一群孩子从被砸的犹太人糖果店搬运糖果，警察和成人在旁边看着。没有人认为这是在犯罪，人民无从听说穆勒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为了保证欺骗成功，纳粹强调的都是一些非理性的品格，诸如忠诚、爱国主义等，并把喜欢思考的知识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有危害性的阶层，这给那些不愿思考的人提供了一个不思考的借口。大多数德国人认同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完全可以放弃维护个人权利，而个人无足轻重，因而对他人的苦难漠然置之，甚至参与迫害。同时，纳粹在宣传和灌输时，不惜在切断信息来源的情况下撒下弥天大谎，让公众无从选择，只有盲从。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就来源于纳粹的创造。这种公然背离理性和良知的宣传具有极大的迷惑性。柏林被攻陷时，甚至一些孩子都勇敢地抵抗苏军。

2. 用文化清洗排斥政治上的反对派。1933年4月7日，即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两个多月后，纳粹党执掌的政府就通过《重设公职人员法》，在德国大学校园内开展了一场驱逐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清洗运动”。这场“文化清洗运动”是纳粹主义“文化同质性要求”的真实体现，也是对犹太少数民族大迫害的第一个信号。当成千上万的知识精英从纳粹德国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中被驱逐出去时，也就意味着德国社会中的民主诉求及其对政府权力制约力量的瓦解。1933—1945年，包括原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整个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里，共有50万犹太难民被迫流亡海外，其中包括12000名文化知识精英。遭受驱逐的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科学家达2400多人，他们当中有1400多人选择了流亡，其中的1090人流亡到了美国。在这些被美国高校接纳的科学精英中，有300多人是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注15]。如果有民主的机制，他们无疑是一支强大的约束和抵制纳粹的社会力量。

3. 用政治欺诈和阴谋取缔反对派。当时的德国议会中，纳粹党占有34%的席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二大党占20%的席位，第三大党德国共产党占17%的席位。纳粹上台后迫切希望实行魏玛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授权法》，该法规定总理可以不通过议会即可自行制定规章来取代法律法规。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两大左翼政党坚决反对启动该法。要想得到议会2/3多数通过，希特勒就必须破除共产党的阻力。为此，纳粹不惜制造了1933年的国会纵火案，并以此大力宣传德国共产党正在准备发动革命。国会纵火案发生的当天，希特勒就宣称“这是共产党发动革命的信号”，并立即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次日，希特勒在普鲁士新闻公报的电台上发表讲话，称“这种纵火行为是德国布尔什维克进行的最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行为”。其后，纳粹声称这是共产国际策划的，解散了德国共产党，并在强行通过《授权法》后的一个月内取缔了所有非纳粹党派，建立起纳粹独裁政权。

4. 垄断报纸媒体，剥夺其他党派的言论空间，实现意识形态的“一体化”。纳粹通过经济、行政等手段剥夺对手的发言权，甚至实施暴力和暗杀，对反对派施以政治恐怖统治。1933年10月，纳粹颁布了《报刊法》，规定只有纯日耳曼血统的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才可以取得编辑和记者的任职资格。那些不是纳粹党或不愿意成为纳粹党的编辑和记者，则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大肆诛戮。1934年4月，纳粹当局借口报社投资方老板是犹太人，将连续发行了230年的报纸《伏斯日报》停刊，此后，其他报纸要么关门，要么委曲求全，但也只苟延残喘维持到1943年。其目的就是禁止其他政党发声。而媒体写什么样的新闻与评论，发表什么样的报道，都必须接受纳粹当局的命令，短短几年，报纸种类便减少将近一半，德国的媒体成了纳粹的宣传工具。

5. 把宣传和灌输作为纳粹的国家战略。通过向民众灌输和宣传假大空语言，剥夺公众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成为顺服工具。希特勒明确提出，“革命的根本问题”“不是夺取政权，而是教育人”[注16]把精神病人当作不必要的粮食消耗者杀光并称为“怜悯赐死”。甚至于堂而皇之地将限制剥夺人民自由权利的《授权法案》称之为“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把在集中营中进行的种种迫害行为界定为合法的“治安处分”。[注17]所有这些，都造成了思想

的极度贫乏和歇斯底里的狂热，人们完全失去了对社会正义和自由的思考，“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注18]

6. 用个人崇拜否认法治的法律权威。纳粹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建筑在极权主义与独裁统治基础之上的领袖原则。纳粹将德意志和雅利安种族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同时，又将雅利安种族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即是那种最优秀的有各种美德的上层人物，他们被认为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少数天才人物，是超人，是高于一切人群之上的领袖，是民族和国家的中流砥柱。群众对领袖人物必须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对领袖要忠诚，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作为领袖不仅要统帅一切，号令一切，指挥一切，而且领袖的任何言论都是时代的最强音，是指导国家和民族命运前途的最高指示和最高法律。

7. 用集体的人民否认个体的公民。人民是纳粹语言中最丰富的用语，但纳粹的人民是抽去个人面孔和特性的集体称呼，如“人民”、“敌人”、“人民群众”、“德国人”、“犹太人”、“日耳曼民族”、“犹太杂种”等等。在纳粹眼中，“人民”具有巨大的道义力量，但这个“人民”却与每个具体的德国人没有关系，把个人和人民分割开，个体必须为集体而自豪，而个人的自豪不是因为自己的创造，而是因为自己属于这个人民的集体。而人民中的个人是不能具有自我意识的。正是在纳粹政府的迷惑和威胁下，人的生活都受到了纳粹文化的改造，产生出一种“完美的团体意识”，个体必须对超级权力绝对屈从。

8.用暴力对付反对派。暴力是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手段，法西斯的极权主义就是通过暴力形成的。墨索里尼有句名言：“社会党人问我们的纲领是什么？我们的纲领就是砸碎社会党人的脑壳。”如果不使用暴力，不能对反对派形成政治恐怖，就无法得到权力，更没有办法维护权力。故在纳粹统治下，任何公民若不服从纳粹的准则，轻则丢饭碗，重则进监狱。暴力使纳粹的宣传既恐怖又理直气壮。

9. 法律成为纳粹破坏政党法治的帮凶。纳粹对社会的控制和垄断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建立起对宣传的垄断和对舆论的控制，还颁布各种立法加强这种控制和垄断。随着《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的出台，一切立法权归于纳粹政府，甚至政府颁布的法律可与宪法相抵触。议会权力功能完全消失。到1934年，纳粹连《授权法案》规定的内阁行政立法程序也不屑一顾，甚至自己制订的法律也弃之一旁，对法律予以随意变更和颠覆。同时，颁布大量特别法，从纳粹上台之初的《保护德意志人民紧急条例》，到《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都是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恶法。

10. 司法排斥宪政民主。纳粹认为宪政民主包含了一种堕落的资产阶级宪政主义，而其基本观点——民主、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见解自由——“与我们的德意志世界观相悖。”[注19]强调法官“不应受武断的判决或形式主义、抽象的法律稳定原则所囿，而是应当找到在法律中得以表达的、并由元首来代表的人民法律观的明确原则及其限制”。[注20]不少“忠诚”的纳粹法官在法律适用中又肆意使用法律解释，令纳粹司法制度的黑暗又添了一重。

纳粹反对政党法治的罪恶远不止于此。纳粹在法西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启动战争按钮，把德国和世界绑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车。

纳粹破坏民主法治是从取缔反对党开始，打着社会主义旗帜起家的。他们的“共富”口号，确实有极大的迷惑性。

民众过上富足的生活，是人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但这一权利的实现，不能以人民转让政治权利——自由和平等为前提。相反，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这种经济的发展和共同的富裕只有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才是真实的和可持续的。人民既有享受富裕生活和社会保障的权利，又有争取自己所要的富裕生活的权利。人民的富裕不是别人赐予的，而应是人民的自我选择，不能以放弃民主和自由为代价。人民有权选择自己所理想的富裕。不能认为只要让人民富裕就是民主，更不能因为人民要选择自己实现富裕的方式就要付出让渡政治权利的代价，甚至剥夺公众的政治权利。正如奥地利思想家米瑟斯所说：“如果将权力赋予多数人，让他们规定少数人可以想什么，可以谈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么，人类的一切进步都会就此中止。”[注21]当年的纳粹就是这么做的。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注释：本文注释详见本刊网站。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公管和政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王彦君）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书风法雨	朱幼棣	73.00	8.00
从延安一路走来　何方自述	南　翔	49.80	7.00
抄家	南　翔	35.00	6.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	46.00	7.00
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	秦　晖	58.00	7.00
儿子:你要活下去	[法]品雅特海	36.00	6.00
革命寻思录	林贤治	42.00	7.00
让思想飞——我所认识的耆老	徐庆全	48.00	7.00
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	雪　珥	45.00	6.00
顾准追思录	罗银胜编	68.00	9.00
墙上春秋　大字报的兴衰	罗平汉	29.00	7.00
我的八十五年　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8.00	7.00
平生六记	曾彦修	35.00	6.00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美]格雷弗·弗著　马维先译	89.00	9.00
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	张聿温	68.00	9.00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光　李晓江译	88.00	10.00
一本书的历史　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金冲及	38.00	7.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9.00
潜规则	吴　思	28.00	7.00
我们忏悔	王克明　宋小明	48.00	8.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于光远	36.00	7.00
牛棚杂忆	季羡林	38.00	7.00
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	张　化	39.00	7.00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邵燕祥	38.00	7.00
叶　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美　周锡瑞	58.00	8.00
一片冰心在玉壶　叶笃庄回忆录	叶笃庄	68.00	8.00
"四人帮"兴亡(全四卷)	叶永烈	198.00	20.00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李敦白口述　徐秀丽撰写	38.00	7.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　苏采青	98.00	10.00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解玺璋	38.00	7.00
独裁者手册	[美]布尔诺·德·梅斯奎塔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著	42.00	7.00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	[德]齐格弗里德·洛卡斯特　英格里德·宗塔格　著	59.00	9.00
大元帅斯大林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198.00	17.00
王明年谱	郭德宏	98.00	11.00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68.00	9.00
古拉格群岛第一岛	伍宇星编译	39.80	7.00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吴庆彤	36.00	6.00
民国人物过眼录	杨奎松	58.00	9.00
改革都有红利吗	雪　珥	38.00	7.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	25.00	7.00
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杨银禄	46.00	7.00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杨　瀚	35.00	6.00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陈徒手	32.00	6.00
勃列日涅夫时代	[俄]列·姆列钦	56.00	9.00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	冯筱才	38.00	7.00
思痛录	韦君宜	35.00	7.00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128.00	11.00
斯大林的战争	杰弗里·罗伯茨	69.00	10.00
国史札记(人物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42.00	7.00
回忆与研究(上下)	李维汉	75.00	12.00
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	刘维开	48.00	8.00
蒋介石与国共合战:1945–1949	蒋永敬　刘维开	48.00	8.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49.00	8.00
难忘的非常岁月	陈瑞生	26.00	7.00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内部发行)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280.00	12.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中、下)	陶菊隐	148.00	18.00
共同的底线	秦　晖	48.00	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78.00	9.00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88.00	12.00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	58.00	9.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黄道炫	48.00	8.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	48.00	8.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十册)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314.00	43.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Ⅰ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Ⅱ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图书介绍

《书风法雨》:几十年来,书坛怪象环生,审美成了炫丑、逆转与误导,刨书法传统之根,作践毁灭文化遗产,辱没先贤、颠覆正道,指鹿为马,还有欺世盗名。书法界的行政化与商业化,利益的诱惑与纠结,恶俗溃败之种种乱象,竟来自业内高层人士所为,几千年的中国书法,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碑帖身藏启示、经典开拓胸怀。作者对书法历史深入追思与剖析,直指关键——拒绝低俗的时流,浊重的时弊,浮华的时尚。坚守信仰,拨开迷雾,正本清源,还书法真实的面目。我们终究不能沉默,要直面历史,发出呼声,交出答卷。

这是作者朱幼棣继《后望书》《怅望山河》《大国医改》后又一部力作。值得一读!

《从延安一路走来　何方自述》:这是延安一代的暮年反思！作者曾在延安生活过,他亲历过"延安整风"、"反右倾"、"文革"等运动,是历史的当事人,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当年参加革命时怀抱的崇高理想就是为自由民主而奋斗,喊的口号中有"不自由,毋宁死!"唱的歌也是"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不惜任何的代价,甚到我们的头颅。"可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这个理想竟然渐渐地淡忘了。回头想想,越是奋斗,却离民主、自由、博爱、平等越远。难道是当年选的理想错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反动的),还是后来背叛了当年的理想(因为自由、民主、博爱、平等这些东西属于人类共同理想,不分什么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人到暮年了,难道这些问题不应该认真反思吗?"

作者长期担任张闻天的助手,是共和国早期外交风云的见证者。作者将一生与共产党共浮沉的经历,结合他与每个阶段的党史发展,从较全面的维度去观察、回顾、反思共产党的经验和教训。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人人出版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出版热线：010-58426176　57273434　57223540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录网址: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　自费出版网：www.51isbn.com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　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0012
新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218号明天生活馆2层201室

出书
年底优惠

新推出 出书套餐活动

1、15500元起套餐：

为了方便老师评审职称使用或者需要少量图书者，特推出评审职称优惠套餐（15500元起，赠送10本书）

标准如下：

大32开本（成品尺寸：145*210）；页码300页内，封面250克铜版纸，内文70克轻型纸。可自由选择纸张，费用按照每种纸的价格分别计算。

2、19000元起套餐：

本套餐含书号、排版、编审、封面设计、1000册书印刷费用，可上全国新华书店、网上书店发行。（另有升级版软精装套餐可供选择）

标准如下：

大32开本（成品尺寸：145*210）；封面250克铜版纸覆亚膜，内文70克轻型纸，每本书免费提供两个封面设计方案以供选择。

特别说明

老师给我们寄平信或挂号信的时候，请写上我们的电话。方便邮局通知我们领取，否则会有退信的现象发生。如果方便的话请在来信中写上老师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责编联系您。谢谢！

代理出版：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无书号出书价格：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3000元，300页印刷100本4000元(不含排版、设计与彩页费用）。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000元，300页印刷100本6000元（不含排版、设计与彩页费用）。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平民自传　百年家史

——三千元五十本起编印个人自传、百年家史、家谱族谱

一、平民自传：

新中国前三十年，斗争哲学至上，人生命运无常；等到海晏河清，人生却已近百年！曾几何时，只有名人政要才能著书立说，而今平民百姓也要树碑立传、无悔今生！

自传是人的生命史也是心灵史。写自传难吗？“翻检书信与日记，整理图片和影集，编写生平大事记，苦难辉煌重点写…”，家世亲友、故乡童年，拜师问学、事业家庭，成败得失、世道人心，排列组合、连缀成篇就是一部自传了。

二、百年家史：

家史是家族繁衍变迁的档案、兴衰起落的见证，当今社会碎片化移民，社会大分化、家族大迁徙，寻根祭祖、教育子孙急待编写“百年家史”。

我们倡导编写百年家史，百年五代、血脉至亲，脉络清晰、资料易寻。家族渊源、世系家庭，迁移分布、发展繁衍，人物故事、得失教训，艺文图表、文化传承，亲戚关系图、百年大事记，整合而成就是百年家史。

三、家谱族谱：

家谱、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迁徙传承，其目的是明世系、序长幼、辨亲疏。

鉴于城市家庭代数不多、资料有限，我们倡导编修实用型的房谱、支谱，十代以内，脉络清晰，主要记载世系图表、迁徙流变、人物传记、族规家训、艺文资料、文化传承等。

四、参考资料：

（一）赠阅资料：1、“中华姓氏树”彩页；2、“个人出书、家族出书报价、流程”彩页；3、写自传、编家史、修家谱提示；4、《家谱传记报》。

（二）邮购教材：1、《怎样写自传》；2、《怎样编家史》；3、《怎样修家谱》；3、姓氏寻根手册；4、家庭实用填谱手册等。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服务电话：010-68920114　62525116

参观咨询：北京海淀图书城（中关村创业大街）25号家谱传记楼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 www.grcsw.com　家族文化网 www.jzwhw.net

欢迎订阅2016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不增美
不溢恶
求实存真

以史为鉴
以史资治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老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资深的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每期定价：10.00元　　　全年定价120元

订阅方式

1、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82—507

2、直接向本社汇款邮购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　　话：（010）68532048　　传　　真：（010）68522852

3、淘宝网在线订阅：https://yhcqwd.taobao.com/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2016年第1期

李锐：选拔第三梯队的有关回忆

束星北的性格与追求

谁举荐的朱厚泽

朱启平先生二三事

张春桥其人

我的父亲马建民

ISSN 1003-1170
01>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10.00 元